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 到 澳大利亚

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澳大利亚】奥尔佳·霍拉克 著
高山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POSTS & TELECOM PRESS

作者奥尔佳·霍拉克，犹太人，1926年生于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二战期间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本书撷取了她的亲生经历：1944年8月，当纳粹德国的铁蹄入侵斯洛伐克时，奥尔佳刚刚17岁，严峻的形势逼迫她和她的家人四处藏匿，但还是落入纳粹的魔爪。从中转营到死亡营，从恐慌到恐惧，奥尔佳和母亲每日都在同死神作斗争。历经奥斯威辛、特拉西贝格、库尔茨巴赫、贝尔森集中营的磨难，奥尔佳被德国纳粹折磨的骨瘦如柴。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了她和她的囚友，就在那一天，奥尔佳的母亲离世。

精神和身体上的疾病让奥尔佳恢复得相当缓慢，她回到了老家布拉迪斯拉发和几位幸存的亲友团聚。在那里她遇到了另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约翰·霍拉克，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一起移居到澳大利亚开始新的生活。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一书蕴含着作者对生命、友情、意志、希望等富有哲理的思索，同时还有对苦难、歧视、贪婪、残暴等的剖析，情真意切，发人深省。



ISBN 978-7-115-22181-0



9 787115 221810 >

ISBN 978-7-115-22181-0

定价：20.00元

人民邮电出版社网址：
www.ptpress.com.cn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澳大利亚】奥尔佳·霍拉克 著

高山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 (澳) 霍拉克 (Horak, O.) 著；高山译. --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1

ISBN 978-7-115-22181-0

I. ①从… II. ①霍… ②高… III. ①霍拉克—回忆录 IV. ①K836.1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3294号

内 容 提 要

奥尔佳·霍拉克是一位斯洛伐克犹太人，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本书以第一人称的形式讲述了作者在集中营所遭受的磨难，以及战后的恬淡生活。书中蕴含着作者对生命、友情、意志、希望等富有哲理的思索，同时还有对苦难、歧视、贪婪、残暴等的剖析，情真意切，发人深省。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

◆ 著 [澳大利亚] 奥尔佳·霍拉克

译 高 山

责任编辑 郝宪明

执行编辑 何一枝

◆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崇文区夕照寺街14号

邮编 100061 电子函件 315@ptpress.com.cn

网址 <http://www.ptpress.com.cn>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5.5

字数：120千字

2010年1月第1版

印数：1-3 000册

201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9-7779 号

ISBN 978-7-115-22181-0

定价：20.00 元

读者服务热线：(010)67129931 印装质量热线：(010)67129223

反盗版热线：(010)67171154

献词



谨以此书在中国出版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5周年

谨以此书献给我尊敬的父亲雨果、母亲普罗斯卡和姐姐朱迪思

献给我永远深爱的丈夫约翰

献给我的女儿伊夫林和苏西

献给我的外孙克斯蒂、安东尼和乔纳森

感谢



将我在集中营及大屠杀中的经历记录下来已经是我多年的心愿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和其他集中营的幸存者们一样，总感觉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并将那段经历埋藏在心底。我认为，人活着，要向前看，要追求那些令我们憧憬和向往的未来。其实，活过之后，回过头来，才发现真正能让我们挥之不去的是那些不凡的经历和一直埋藏在我们心底的记忆，它们已经化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由于集中营及大屠杀，我的亲人——父母和姐姐死于德国纳粹的屠刀之下，还有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他们永远离我而去，留给我的只是与他们有关的记忆。不过，记忆是惨痛的，那惊慌失措的无助，那昏天黑地的恐惧，让我无法遗忘。因此，要我忘记集中营及大屠杀那场劫难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信把我在集中营及大屠杀中幸存的经历与记忆整理出来，从浅层次上能告诉读者，虽然我还活着，可经历过集中营及大屠杀的磨难，曾经活得那么艰难；从深层次上说，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将它们记

住，不至于让它们遗失，不让类似的劫难再重复、再发生。

为了把我在集中营及大屠杀的经历与记忆整理成书出版，我有幸得到许多人的热心帮助：简爱丝·彼温太太以极大的耐心帮我从日记中整理出素材，打印成书稿；优秀的社区工作者伊娃·恩琪尔介绍我结识了克林·塔兹教授和他的夫人桑德拉，他们鼓励我以集中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在公共场合介绍我的那些经历。对于他们的帮助，我要说声谢谢。

研究二战的专家保罗·奥西亚先生用了大量时间，从历史学家的视角，以他对集中营及大屠杀的了解，帮我修改书稿，他的友谊我将永远珍藏；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的布丽奇塔·多伊尔女士、卡米拉·多丽丝太太在编辑体例及本书的市场推销方面给予我及时的指导，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来自悉尼圣约之子会（犹太文化促进会）的欧尼·弗雷德兰德先生为本书的发行给予的支持与慷慨帮助。

奥尔佳·霍拉克

前言



随着时间的流淌，历史正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对集中营及大屠杀幸存者经历的整理变得十分紧迫。见证过那场浩劫的人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少了，我们的生活与那段历史的联系变得越来越淡薄。把它们记录下来不仅是为了下一代，更是为了我们的历史更加完整。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经历与记忆，但要让后来人理解，就得费点劲了。本书作者痛苦的经历与德国纳粹造成的浩劫紧密相连，作者的经历是我们了解集中营及大屠杀那场浩劫的重要渠道。它为历史学家、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劫难的历史真相。读过之后，相信广大读者的心中有了一个幸存者完整的形象，会让我们感受到浩劫本身就发生在“普通”的人类社会之中，而不是在遥远的其它星球。

每位幸存者都有自己的不幸，每位幸存者的经历各不相同。奥尔佳女士的痛苦经历记录了她在德国法西斯侵略斯洛伐克期间，她由少女转变为成熟女性的过程，书中的许多事件发生在她的青少年时代。奥尔佳女士的痛苦遭遇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少女来说是没有丝毫思想准备的，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她和她的家族身上，许多亲人遇害。一个经历过巨大浩劫的人就好像一座经历过地震的城市，虽然在废墟上可以建立新的房屋和生活，但内心曾经拥有的一些东西已经彻底地毁灭了，这就是奥尔佳的故事。

作为一名成长中的少女，奥尔佳在浩劫中对生存的渴望与追求给人留下了思索的余地。她真正的不凡之处并不只是表现在与死亡的抗

争上，而是表现在真正的生活之中。她坚毅、健康、乐观、进取，很少向挫折、灾难和绝望让步，又怎能不让我们感慨、深受感染呢！奥尔佳在浩劫面前保持着求生希望的火花，她在浩劫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她生命本性之中的自然流露。为了明天的希望，就要面对今天的浩劫。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像奥尔佳那样，敢于面对浩劫，而不是在浩劫面前胆怯软弱，束手待毙，那么浩劫得以猖獗的空间就会愈来愈小。

通过奥尔佳的故事，读者可以了解到那些执行“最后解决方案”的德国纳粹对人类造成的浩劫。“浩劫”这个词有个确切的含义——天灾人祸造成的严重损害和痛苦。但“生不如死”是浩劫的根本特征，而且事前无法预料，到时必须忍受，过后不堪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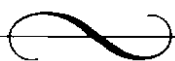
时光已在所有人的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奥尔佳女士也不例外。时隔多年，奥尔佳才将那经历诉诸笔墨。想必她在集中营所经历的浩劫一直刻骨铭心，欲罢不能，没齿难忘。她是一个直接面对劫难和命运的人，她为她的生活与记忆找到了一条好理由。相对于历史，劫难不过是瞬间，相对于生命，历史不过是瞬间。奥尔佳的写作方式和她对遗忘的抗拒方式，都可以与人类的尊严、人格的高贵与高尚并立。

作为本书的编辑顾问，我的任务是帮助作者理清写作思路，帮助她回忆事情发生的时间与地点。本书的写作风格是奥尔佳自己的，字里行间透露出的仍是作者的声音。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与奥尔佳的合作充满了硕果，令我钦佩的是奥尔佳女士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中的求生欲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亲友们的关怀，奥尔佳女士已逐渐从大屠杀中失去双亲和姐姐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了。奥尔佳女士是一位勇士，她也把我当作朋友！

保罗·奥西亚

序



介绍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书比比皆是，而由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自己写的书，在二战结束迄今的65年中，却和集中营的幸存者一样并不多见。本书就是这样一本书。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结识了一位外国朋友马克斯·斯托恩先生，2004年曾翻译过他的传记《我的邮票生涯》。他是原籍斯洛伐克的犹太裔澳大利亚人，也是一位二战期间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幸存者。2005年初他到波兰参加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后，顺路到北京访问，并与我一起聊天。临别前，他赠送我一本英文原版书，名叫《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副标题为“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这是他的表妹（五舅的二女儿）奥尔佳·霍拉克女士写的她本人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期间经历的传记。

马克斯介绍说，这本书在澳大利亚发行后曾引起轰动，当时正酝酿在德国发行德文版，并希望我能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他对我说，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都对人类犯下了累累罪行。如果人们不熟知那段历史，就无法理解20世纪是怎么回事。当今的世界正是20世纪的延续，不了解那段历史，人们就无法面对未来。

他还说：悲剧和苦难，给犹太民族留下了沉重而独特的精神遗产。犹太民族是一个善于记忆的民族，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太人

进行的种族灭绝式的杀戮一直储存在他们的记忆中。那种记忆使得犹太民族变得更深沉，他们始终铭记着德国纳粹在集中营及大屠杀中的暴行，时刻不忘追究那场灾难制造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记忆战争是用来珍惜和平。关于德国纳粹在集中营及大屠杀中的暴行，对于像我这个年龄段的中国读者来说，印象实在是稀薄。说起集中营及大屠杀的历史，我想到的是褪了色的照片、黑白记录电影中那层层密布的高压电网、巨大的焚尸炉、瘦骨嶙峋的活尸、奄奄一息的囚犯……那些场面只是旁观者眼中的历史，将它们拼凑在一起，是一个个摆放在博物馆里木头架子上的标本。透过标本回看历史，一切都蒙上了一层纱，很难把历史请回来。毋庸置疑，没有人能回到过去，人们通过标本体验过去的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的浩劫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透过集中营及大屠杀幸存者的亲身经历去体验那段历史。

马克斯建议我静下来认认真真地读读这本书，有弄不懂的章节可以同作者交流，这样可能会对了解那段历史有所帮助。经历是骨头，记忆是肉，有骨有肉，事情才能鲜活。好书，特别是原著，确实应该多读几次。在细细品读并多次同作者书面交流后，我时而被作者悲惨的经历所打动，时而被她那些关于生活、生命的深刻洞见所启迪、折服、震撼、激励，有时甚至震撼得心潮起伏，久久不能自己。

作者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中的经历比那些标本本身更为可信、更为逼真。用记忆描述出来的历史，用经历勾勒出的灾难，会轻轻撩开那层纱，生与死的较量清晰可见。这种生与死的较量，让人感受到屠杀的残酷。残酷的后面，作者在集中营及大屠杀的经历就越发清晰起来了，让过去像现在一样栩栩如生，历史不请自来。

这本书从揭露纳粹浩劫、感受人生磨难、透视自我认知、铸造生命强度等几个方面入手，以作者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的经历为主线，以作者移民到澳大利亚生活为辅线，语言朴实，娓娓道来，表现了作者在灾难面前的窘迫不安和苦苦挣扎，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建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世界。本书虽然朴实无华，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中读出作者对生的渴望、对爱的追求、对生活的留恋、对浩劫的仇恨、对和平的呼唤、对未来的憧憬。

真正体味到作者的所思所想之后，我才坐下来翻译这本书。当然，让我有翻译这本书的激情，除了要不负老朋友的重托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动力，那就是二战结束已经65年了，了解当年那场浩劫的人越来越少，今天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越发显得必要。

那么回顾什么、反思什么呢？作为一本优秀的传记，书中在这两方面都有精彩的体现，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有一致之处，这就是，在作者的头脑中，既有宏观的交待，也有细节的深思。宏观之大，大到在浩劫的背景上探寻着造成如此人类大悲剧的根源；细节之小，小到在德国纳粹集中营中如何应对个人生存与死亡的考验。它的意义在于借助幸存者的记忆，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历史灾难的发生和根源，还会让人就此担负起一些重大责任——警惕那场浩劫的再度发生。

奥尔佳在浩劫面前对生存执着的追求精神在这本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对于生与死密切相关的信念与意志，面对浩劫如何忍受与坚持等问题，作者都作了生动透彻的论述，向人们展示了作者当时作为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少女，如何面对战争和种族迫害、自我成长与定位、寻求自由等心路历程。那些不平凡但真实的历史记录，伴随着主人公的心境起伏，足以引起人们心中的震撼和共鸣，因此能够深深打动和吸引众多的读者。

今天，奥尔佳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了，她的经历与记忆是一份遗产，这份遗产就是在那个时代她所拥有的灾难、思索和生命实践。并非人人都曾有作者的苦难经历，有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品尝过个中的苦味，但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经历不存在、不发生、不重演。因此，人类前行的足迹中应有历史老人指点迷津，人生的步履中应有历史老人陪伴着征程。

为了记住那段历史，读一读这本书吧，沿着书中的脚印体验作者的经历与记忆。如果它还能让你落泪、让你震撼，或进一步地让你沉思、让你联想、让你仔细咂摸咂摸其中的滋味，就是对我这些年在翻译这本书中所花费心血的最高褒奖！

高山

2009.3.14

目 录



第一章	1939年-1942年的新秩序	/1
第二章	1942年-1943年到匈牙利躲藏	/16
第三章	1944年春返回布拉迪斯拉发	/27
第四章	1944年秋被抓到塞雷德中转营	/34
第五章	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	/41
第六章	到库尔茨巴赫集中营	/57
第七章	到贝尔森集中营	/69
第八章	回家历程	/85
第九章	回到布拉迪斯拉发遇见约翰	/101
第十章	移民澳大利亚	/114
附录一	家族史	/134
附录二	斯洛伐克简史	/148
后记		/156

第一章

1939-1942年的新秩序

1926年，我出生于一个善良、虔诚的犹太教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市。那是一座有着15万人口的城市，战前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城市人口中大约有百分之十的犹太人。二战爆发的1939年我刚刚13岁，姐姐朱迪思14岁，母亲普鲁斯卡34岁，父亲雨果·罗斯博格45岁。

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要成为完美与优秀的人。父亲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但每个人都有资格追求完美；优秀是一种习惯，最终的成功是依靠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达到的，平时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和品行，才会使我们最终成为优秀的人。他还要求我们要学会善待别人，不管他们的肤色、信仰和观念是多么的不同。对于父亲的教诲我们都认真地接受了。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要求孩子们养成勤俭持家的好习惯。母亲每天都在家操持家务，在我们姐妹俩的眼



▲ 奥尔佳姐妹俩和母亲

里，母亲就是勤劳和善良的化身。

父亲和他的兄弟们从事牲畜交易。他很有经营头脑，总是心平气和地对待客户，因此，家里的生活殷实充裕。由于父母的辛勤劳作，慢慢地，全家越来越有生气了。父母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我们的家里充满了温暖。那时候，我和姐姐最快乐也最安心的便是见到父母的笑容。父母用他们的肩膀和勤劳撑起了一个犹太人的家。



▲ 1918年父亲服兵役时的照片

可父母的笑容没能持续多久,《纽伦堡种族法》^[1]在斯洛伐克通过后,大规模的排犹行动开始了,平静的生活被打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逼走上逃亡之路。我的家族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朋友和亲属原先也居住在斯洛伐克,那时不得不离开。三姨艾琳和三姨父卡尔及他们全家为了躲避排犹,在1939年初去了巴勒斯坦。当时有很多犹太人家庭离开了欧洲。我的同学和朋友也有些人背井离乡,从此天各一方。在他们之中,有我孩提时的女友朱兹·凯恩。

人们经常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离开?”

那是一个令人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预想时局今后如何发展。德国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我们同信仰基督教的邻居在布拉迪斯拉发市共同融洽生活了许多年,一直都和睦相处,谁能料想一夜之间就会发生变化。

父母想到:如果我们离开,谁来照顾家族中那些离不开的人?

祖母奥玛已经是年近80岁的老人,外祖母艾恩更老了,行走不便。你能撇下你热爱的人吗?

父母的回答是“不”。

1940年,斯洛伐克又通过一部新的反犹太人法,它直接影响到姐姐朱迪思和我的学业。那时我们在一个叫泽温杜姆的讲德语的女子高中上学,但新的《反犹太人法》通过后,我们无法继续上学了,犹太人的孩子几乎一夜之间在学校里消失了。

母亲十分有远见,认为技不压身,掌握越多的技能越好。当时掌握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对将来能养家糊口是一件十分实际的事。母亲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掌握技能如同储钱罐,每天存一点并不显眼,时间长

[1]《纽伦堡种族法》。1935年9月15日,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颁布《纽伦堡种族法》,那是德国纳粹彻底灭绝欧洲犹太人计划的第一步,使犹太人失去在德国的立足之地,成为被社会排斥的对象。该法规定,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如选举权,禁止担任公职,甚至不准升德国国旗等);禁止犹太人与德意志公民通婚或发生性行为;犹太人不得与非犹太人有任何社会关系等。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了零存整取，自然会有惊喜。生活让我们过早地开始掌握生活技能，母亲让朱迪思和我参加了一个缝纫学习班，我们很快学会了制作皮带、人工绢花、机器绣花等技能。每天，我们带着学到的技能回家。后来形势的变化证明了母亲的预见十分正确。

母亲到一个叫古德纳镇的著名糖果制造商的工厂里学习手艺，她在那里学做蛋糕、巧克力，很快成了那方面的专家。她的手艺在家里得以施展，后来她自己研究食谱、研究烹调，为我们制作各种食物、各种菜式。她可以把神赐给人类的火，运用得出神入化，烧出堪称火之艺术的菜肴，使我们这些孩子们十分高兴。由于母亲做得一手好菜，亲戚们不时会把家族聚会的地点选在我家。

当《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斯洛伐克获得了自治权。随着捷克斯洛伐克被分割，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脱离了布拉格政府的管辖，成为纳粹德国的保护国。当德国吞并捷克之后，在斯洛伐克建立起了一个由主教约瑟夫·蒂索^[2]统治的傀儡政权。匈牙利参与了瓜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得到了卢瑟尼亚以及斯洛伐克南部匈牙利族人口占多数的地区。

我外祖母生活的塞拉镇就在那一地区。过去我们还经常到她家度假。当时斯洛伐克犹太人和平、安详、宁静的生活一下子结束了，外祖母将自己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埋了起来。后来我见过部分被埋起来的東西，还有部分值钱的东西仍然埋在地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的外祖母。

在布拉迪斯拉发，排犹行动使犹太人的生活十分困难。政府的法令要求我的父母交出自己所有的财产和贵重物品。父亲在梅泽霍夫的农

[2]约瑟夫·蒂索（1887—1947），曾为天主教神甫、神学教授。斯洛伐克人民党首领。1938年后积极从事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的活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出任斯洛伐克民族分裂主义者建立的斯洛伐克自治政府首脑。1941年6月，追随希特勒参加反苏战争，还积极支持和配合艾希曼之流在斯洛伐克大力推行“最后解决”政策，造成近10万名犹太人惨遭屠杀。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4月15日蒂索被判处死刑。

场被“雅利安化”^[3]了,当时家里的生意主要在城市。一位“雅利安”人莎嘉先生正式接管了我家的财产,他是一位“正人君子”,一名拳击手和散打运动员。她的妻子是位贵族妇女。他们信誓旦旦地向我们保证一定保护好我父母的财产。父母十分小心地上缴了自己所拥有的部分财物。依据新的法律,犹太人不许拥有钻石戒指、耳环、金手镯、项链及手表,家里的收音机也连同家里的皮货及银器一股脑儿上缴了。犹太人不准养狗,上街必须戴配证明自己是犹太人身份的黄色六角星章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我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 and 希望,还依仗着当地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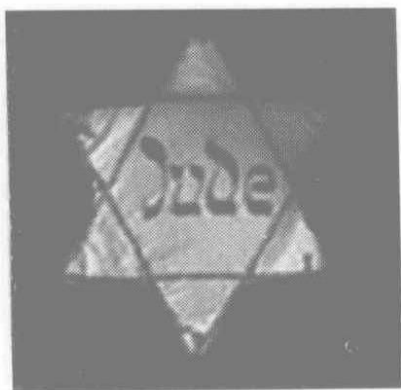
父母将一些财物托付给可信赖的朋友们保管,还将一些贵重的物品寄到了国外。父亲的一位远房表弟在伦敦开设了一个安全保险箱,可以将家族中值钱的一部分东西储藏在那里;另外一位亲属在纽约开了一个账户,父亲时常往那个账户里寄钱。由于生意的关系,他经常出入于奥地利的圣马格雷滕,他还在瑞士银行开了一个账户。

当时,如果我们外出必须佩戴证明自己是犹太人身份的大卫章^[4],还要将其牢固地缝在外套上,那十分令人沮丧。从人格与尊严的角度看,侮辱一个人莫过于在他的某个部位打上一个什么屈辱的标记。虽然一个人的尊严并不在大卫章上,但佩戴大卫章是一种人格侮辱。戴着那玩意儿上街会遭到街上行人的凌辱、谩骂及身体侵害,陌生人会对我吐唾沫。在那个世界上,欺负弱者是某些人的本能,而德国纳粹的排犹行为又使得那些人的本能得以发挥。

佩戴大卫章的人无尊严可言,我对佩戴大卫章有着极大的抵触情绪,很快学会手拿着一个包或者一本书,将它自然地抬高到胸前,挡住

[3]雅利安化。希特勒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罪恶的民族,是“劣等民族”;“所有的文明都起源于白种人”,而“雅利安人是白种人中最高贵的人种”,因此劣等的犹太人“必须从地球上消失”,他们的企业和房地产应被没收。

[4]佩戴大卫章。德国纳粹规定,犹太人不分男女老幼,外出时必须佩戴一枚证明自己是犹太人身份的黄色六角星标记,即“大卫章”。



▲ 象征着耻辱的大卫六角星章

大卫章。当然如果被抓到，会得到故意遮挡大卫章的“罪名”。

当时，我只有14岁，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和我的交流常常是以他们的关爱作为媒介的。作为一个孩子，一直都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伴随着温暖、爱和幸福长大。我十分喜爱自己的家，因为天下最温馨的莫过于家，哪怕是最平常的家；家是永远的避风港，家里有爸爸坚实的臂膀，有妈妈慈祥的目光，有孩子们快乐的嬉戏；家是最自由自在的地方，是心灵最后停泊的地方，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不管有了多大的困难，家人都能为你分担。

我总是认为家庭是安全的，因为有祖母、外祖母、父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妹和很多朋友，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当时，由于纳粹的排犹行动，太阳落山后，犹太人不得不待在家里。犹太人要交出自行车；犹太人禁止搭电车，也不准坐车，甚至是自己的车也不行；犹太人只能到犹太人开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理发；犹太人晚上8点到早上6点禁止上街；犹太人禁止上歌剧院、电影院或任何运动场；犹太人不允许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禁止划船；犹太人晚上8点以后禁止坐在朋友或自己家中的花园里……我感觉我们所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不懂为什么人们那么憎恨犹太人？我们为什么要承担如此不公平的待遇？担惊受怕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种烦恼一直困扰着我。

西方有一句谚语：“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排犹行动中所有的罪恶都来自希特勒那个渊藪。先有希特勒，而后有了纳粹，接踵而来的便是第三帝国，他们疯狂蹂躏整个欧洲、疯狂屠杀犹太人，使人类社会堕入人造的浩劫之中。我十分赞同人们对希特勒的评价：他是个疯子！家人曾在私下讨论过为什么希特勒如此仇恨犹太人，那时我们没有找出答案。

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犹太人的商铺被砸的砸、抢的抢，人们

纷纷逃离。不久，我们家门前那条原本十分热闹的大街就变得冷冷清清。很多年轻犹太男子和未婚的妇女到当地犹太复活组织处登记，准备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有人已经租到了船，那些船可以从布拉迪斯拉发启程，沿着多瑙河航行到黑海，在那里换乘大船再到巴勒斯坦。那些船要经过匈牙利境内的多瑙河，可是亲纳粹的匈牙利当局时常拒绝发给那些船运输签证，它们只能连续几周停泊在匈牙利与斯洛伐克的边境线处的码头上。父亲和社区里的其他朋友经常驾驶自己的车去购买食物、地毯和帐篷。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行动，因为法律规定，犹太人不允许与非犹太人有“不必要”的接触。

党卫军^[5]少将狄特尔·维斯里塞尼^[6]根据柏林主子的指令来到斯洛伐克，作为德国纳粹派往斯洛伐克政府的“顾问”，负责落实《反犹太人法》的实施。他和党卫军的一个小分队抵达布拉迪斯拉发。他们整天在街上出没，谁都知道那些家伙们在干些什么。他们是想让我们明白犹太人时时刻刻被德国人所控制，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害怕。每当见到党卫军黑色的军服，很难描述我那时的恐怖心情，虽然理智让我快点离开，但脚却像生了根一样牢牢地定在了那里，一动也不能动，感觉自己像病了一样，心里知道应该尽快离开，越快越好，可脚却迈不开步。

党卫军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组织，当年的欧洲人不时会听到党卫队在城市和乡村踏着石砌路面的行军脚步声。党卫军总司令海因里希·希姆莱^[7]不胜骄狂地宣称：“我知道，有些人看到这种黑色制服就感

[5]党卫军，简称S.S，是希特勒及其纳粹党的警卫部队，是纳粹德国的特务和军事组织，也是他们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的最庞大、最凶恶的工具。他们以残酷的手段迫害和屠杀犹太人、战俘、进步人士和和平居民，并直接参加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战争，对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46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其为犯罪组织。

[6]狄特尔·维斯里塞尼，纳粹中央保安总局国内保安勤务局的第四处——犹太事务处的副处长，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7]海因里希·希姆莱，二战史上臭名昭著的所谓“最后解决”方案的提出者，德国纳粹党卫军头子，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刽子手。他深得希特勒的信任，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1945年5月21日，希姆莱在德国不来梅被英国士兵扣押，两天后他服下一颗氰化钾胶囊，死于汉堡附近的一个英军审讯营里。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到不舒服，我们对此很理解，而且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喜欢我们。”

维斯里塞尼与一些在中欧完成“最后解决方案”^[8]的纳粹高官密切合作，党卫军少将阿道夫·艾希曼^[9]是第三帝国负责处理犹太事务的指挥官，他负责对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实施灭绝计划。艾希曼对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直接负责。维也纳内务部的书记官恩斯特·卡腾布鲁纳^[10]因为仇恨犹太人得到了重用，他在党卫军中的地位平步青云，炙手可热。1943年1月，卡腾布鲁纳升任党卫军第二号人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指挥官莱因哈德·海德里希^[11]于捷克被刺身亡后，他接任第三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职务，统一指挥党卫军。党卫军少将阿洛伊斯·布鲁诺^[12]由于无情地对待犹太人，获得了“犹太猎手”恶名，残忍加野心使他在新的工作领域里取得很出色的“成就”，赢得了上司的欣赏。

这些人的工作就是在纳粹统治的黑暗世界里，无情地吞噬成千上万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生命，在那些被吞噬的生命中也包括我们家族的很多人。

[8]“最后解决”方案。战争的进程使希特勒不再满足于驱逐、隔离犹太人，他认为，驱逐和成立特别犹太区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只有彻底消灭犹太人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据统计，在实施“最后解决”方案中，约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

[9]阿道夫·艾希曼，“死亡集中营”的制造者，创造了“最后解决”的术语。二战期间，他是德国纳粹执行丧心病狂的“彻底解决”方案的负责人，在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跟他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961年4月，他在耶路撒冷遭审判，1962年6月1日被绞死。

[10]恩斯特·卡腾布鲁纳，1935年成为党卫军的头领，积极从事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各种活动。第三帝国覆灭前夕，他已升任党卫军帝国副总指挥（上将军衔）。二战后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被判处死刑，1946年10月16日被执行绞刑。

[11]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党卫军的二号人物。海德里希在纳粹高层中年纪最轻，但以其冷酷的性格深得希特勒赏识。1941年9月，他被指派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保护长官”。1941年5月29日被捷克的抵抗组织成员行刺，6月4日身亡。

[12]阿洛伊斯·布鲁诺，1912年生于奥地利，是纳粹中央保安总局国内保安勤务局的第四处——犹太事务处的副处长，是在第一线指挥“最后解决”犹太人的屠夫艾希曼的少数几个最亲密的帮凶之一。

在维斯里塞尼及其同伙的操纵、鼓动和精心策划下，斯洛伐克纳粹傀儡政府逐步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权利、财产和保护。从那时起，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司空见惯、日甚一日了。那时我们情绪十分低落，常被羞辱，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

由于不允许犹太人雇佣非犹太人，我们只好辞去家里同我们多年生活在一起的保姆安娜。安娜长得很好看，20多岁，一望便知是良家妇女。她离开我家后，在斯洛伐克内政部长亚历山大·斯拉维奇家中找到了一份保姆工作。几天后，安娜来看我们，哭诉说：斯拉维奇是一个畜生，在她到他家工作的第一天，他强奸了她。

家里的财产“雅利安化”后，父亲和几个叔叔曾经为“雅利安人”莎嘉先生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教他如何做生意，帮助他照看农场里的牲畜。莎嘉先生当时是农场的新主人，生意也十分红火，他驾驶着父亲的小汽车，在生意圈里很有名。

父母和家族中的其他成员经常在密室里开会，商量很多秘密的事情，我猜想可能是在讨论如何应对当时的时局。他们交谈，有时用密码记录。我的一位舅姥爷马瑞奇和他的女婿巴布斯等也时常到我家来。巴布斯一家和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好，他们后来在我的战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细心照料过我。

在1941年德国纳粹向奥斯威辛集中营运送第一批犹太人之前，国际社会还有一个“挽救儿童”计划，那是犹太孩子的父母没有办法的选择。纳粹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始于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13]。浩劫初期，本该生活在阳光下享受教育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的孩子却被限制进入学校上学，已经上学的犹太人的孩子被叫到教室的前面，当着老师的面被指出区别于非犹太人孩子的特征，他们受尽了人格的侮辱。

[13] “水晶之夜”。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1938年11月9日夜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时开始的。暴行过后，被洗劫的地方到处是破碎的玻璃。所谓“水晶”，指的就是碎玻璃，后人将这血腥的一夜称为“水晶之夜”。从那一夜晚开始，犹太人遭遇了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父母已惨遭纳粹杀害或被押送到集中营的一些犹太孩子被迫掩藏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如家中的壁橱、顶楼,甚至下水道中。他们听不到声音,看不见亲人,在那里噤若寒蝉,靠一些好心的非犹太邻居提供少量的食物生活。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们的家长忍痛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纳粹黑手无法达到的安全地区。

可怜的犹太人孩子的生活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英国的犹太难民委员会通过一些议员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接受犹太儿童的要求。英国政府同意这一请求,决定接纳德国、奥地利、波兰和捷克的犹太儿童到英国避难,条件是孩子必须是年龄在5至17岁之间,且必须单独离开自己的家庭,不得由他们的父母陪伴。

1938年12月2日,第一批200名犹太儿童从德国柏林启程被送到英国,12月22日另一批200人从维也纳送到英国。最后一批孩子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天启程的。到1939年的9月,大约有1万多名犹太儿童被送往英国,并和英国家庭生活在一起。

犹太孩子们在火车站上与他们的父母告别。为了让孩子安心上火车,许多父母告诉他们的孩子,他们先走,父母会随后赶到。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都说善意的谎言是美丽的,可父母亲的那个谎言,首先让人感到伤心。生活中所有的谎言都是具有欺骗性的,但那个善意的“谎言”是必要的。父母就是想安慰孩子,让他们放心,其实他们的内心在流血。多年后,那些长大了的孩子十分理解这些“谎言”,他们是没有理由去指责的。他们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说过那样的“谎言”的人,就是一个不懂亲情的人。

当时英国的许多城镇正在遭受德军轰炸,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他们被分散到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等地与他们的新家长共同生活。孩子们到达后,得到了很好的照顾。一些孩子由家庭领养,一些孩子由社区组织抚养,一些孩子去了孤儿院,还有一些孩子被送到了农场,很少有人丢失或失踪。那些孩子长到18岁后,有许多人加入了英国或澳大利亚军队,加入了与德国纳粹战斗的行列。战争结束后,大约

只有五分之一的孩子与他们的家人团聚，大多数的孩子从此再没有见到过他们的父母。

我的姑姑父彼比·斯托恩在那次转移犹太儿童的活动中担任着重要的工作。他将自己七个子女中最小的两个男孩库尔特和哈里送到了英国，他们一到英国后就受到了非犹太人家庭无微不至的关怀。几十年后，在英国父母关照下长大成人的库尔特和哈里以在英国的生活为背景，写下《天使紧握我的手》一书，记载了他们在英国的成长经历。我父母不愿意一家人的分离，经过慎重考虑后愿意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没有把姐姐朱迪思和我送出去。我们也选择留在父母身边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1942年3月21日，又一部新的《反犹太法》颁布，这对犹太家庭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特别是我们家。斯洛伐克傀儡政府对那一法律执行得十分认真，所有出生于1925年以前的单身犹太人被要求向当局报到登记，并被强制劳动。傀儡政府宣称：“对于犹太人，最后能做些工作是件好事情。”那些被抓到的人，在帆布包里装上一些必要的用品和食物后就得马上离开。周围被抓的人越来越多，每天晚上，人们都可以隐隐地听到哭声。我们的心头被一种不详的预感笼罩着，但真要伸手去抓住它时，它又像空气一样消失了。

母亲变得愈发消沉，最后连拿手的菜也做得没了味道。面对不寻常的苦难，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许会好些，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姐姐甚至开起了许久没开的玩笑，但愿日子就能这样过下去，她也在心中默默地祷告。然而，不测风云、旦夕祸福无所不在，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事实上，意外的事情马上就发生了，它搅乱了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

1942年3月21日，德国党卫军命令布拉迪斯拉发所有1925年之前出生的未成年的犹太人孩子到当地火车站报到，去完成一些“工作”。3月22日，在对犹太人宵禁的当晚，两名当地纳粹党卫军闯进了我家，检查了姐姐的证件，发现她正好属于1925年以前出生的。党卫军立即发出

“召集令”，命令她第二天清晨到当地的一家弹药厂报到。那家弹药厂在距布拉迪斯拉发10公里以外一段废弃的铁路旁边。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都不知所措。朱迪思似乎预感到了不祥，但她十分坚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稚嫩的脸上写满了与年龄不相符的镇定，她马上收拾行李。我以为姐姐是被突如其来的事情吓晕了。母亲见状，犹如五雷轰顶，浑身颤抖，抱着姐姐痛哭不已。姐姐微笑着安慰母亲：“妈妈，别哭，又不是永远见不着了，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的女儿已经长大了。”而母亲则把姐姐搂得更紧，哭得更凶了。父亲努力地安抚母亲，尽管他也感到十分绝望。我无助地坐在角落里，忧心忡忡，什么也不想干，只能默默地静观事态的发展。

父亲半晌不语，突然，他想起了一位“老友”，此人在当地的党卫军中担任一个重要职务，过去在蒂索政府中任部长。父亲在以往的生意往来中和他有过很多接触，也给过他一些关照，因此他总对我父亲说：“朋友，如果你需要我帮忙，马上来找我，我肯定会帮忙的。”

父亲当时想起他的那一番话，相信是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了。父亲满怀希望出去找他帮忙。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父亲回来了，忧郁而沮丧，表情失望，痛苦像潮水一样涌到父亲的脸上挥之不去。他告诉我们，世界上最让人琢磨不透的东西是人心。他在那位“老友”面前跪倒，苦苦哀求：“求求您，帮帮我，我的女儿就要被人带走了。”

那个人丝毫不为所动，表情冷漠地对父亲说：“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母亲和我听了，默默无语。对于父亲所谓朋友的话我们能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同情，有仁义，有帮助，因此，世上有慈悲为怀的侠客，有侠骨柔肠的壮士。但是，要看在什么时候、什么环境，此一时，彼一时，对世态炎凉绝不能大惊小怪。一旦事关自己，当事人的头脑总能切换成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思考方式，每一个人在灾难面前首先考虑的是自己。

母亲几乎神经质了，手足无措，忧郁像乌云一样越积越多，逐渐遮满整个脸庞，她一夜之间就变老了。那时我才发现有一种感觉叫心痛，我不同任何人讲话，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多么的孤独。那一夜，除了想怎么才能安抚姐姐，其他的我什么都没想。纳粹贴着“开往东方”标签的火车就要开走了，我清楚大规模的驱逐犹太人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纳粹向犹太人举起了屠刀。姐姐会不会被杀害？不，我不能那样想，那样想太没人性了！

姐姐朱迪思和我们家族的四位堂兄、堂姐就要一起被人带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命运如何。什么也不知道的紧张和焦虑是最令人痛苦的。我在想：我姐姐会怎么样？她要去哪里？她是否还能回来？我的表兄、堂姐的命运如何？

第二天，3月25日，清晨，姐姐早早地起来了，强打起精神，乖乖的样子令人心痛。她唇角上流露出苦涩，白皙的脸上，两轮清晰可见的黑眼圈，长长的睫毛上，挂着一颗颗晶莹的泪珠，无意间透露了她一宿没睡。全家人送姐姐出门，依依不舍。悲痛与怜爱在父母的胸膛里奔突冲撞，他们在道别时紧紧地抱住姐姐，反复叮咛：“要小心，孩子，一定要小心！”姐姐没有哭，她和四伯的儿子玛格达、三伯的女儿爱娃、大姨的儿子弗兹、欧文等几位堂兄、堂姐到“集合地点”报到，和其他994名十几岁的犹太儿童一道离开。我不知道，送别是一切的开始，还是一切的结束？

出门前，姐姐向父母保证：无论如何都会好好保重自己。母亲含泪和姐姐告别，她也向父母挥着手。到了车站，她看到到处都是依依不舍的人群：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哥哥和弟弟、姐姐和妹妹……她默默地看着我们。从小到大，姐姐从没有一个人出过远门，而那时就要上火车了，她就要离开朝夕相处的亲人了。

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他们坐的火车直奔奥斯威辛。这一别就是永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姐姐。姐姐和几位表兄、堂姐根据纳粹党卫队的命令被送到新奥斯威辛二号营（又被称为“比克瑙集中

营”）。我姐姐可能在她满17岁的前两周，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纳粹送进毒气室杀害了。



▲ 1933年奥尔佳（左）与姐姐朱迪思（右），中间为老姨的女儿朱瑞玛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过着艰苦的生活。犹太人在布拉迪斯拉发，在斯洛伐克的其他地区遭到驱逐。当地的犹太人组织决定，每家要尽可能多地接收一些犹太人，我们家的每一个房间都住进了犹太人和他们的孩子。我们还为那些找不到栖身之处的人提供食宿，一位以编织假发为营生的妇女和她的丈夫也住了进来，我注意到住在我家里的他们夜以继日地为传统的犹太妇女编织着假发。楼下的奶奶家也住满了人，后来小姑父斯托恩连同他的女儿特鲁蒂和莉莉、儿子乔西和瑞比也来到了我们拥挤的房间。

尽管有那么多家庭住在我的家里，我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之中，没人知道下一轮的驱逐行动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者说什么时候下一次的敲门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姐姐和其他几个孩子已经被抓走，忐忑不安的心情一直笼罩着我。

对姐姐的思念一直伴随着我，毕竟我和姐姐形影不离有好多年，姐姐离开后，我在梦中都盼望着姐姐能回来。记得小时候，小姑的儿子马克斯·斯托恩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世纪30年代的某一天，伦敦一个中学的校长罗兰·希尔正在街上散步，他看到一位邮递员把一封信

交给一个姑娘。姑娘接过信，匆匆瞟了一眼，马上又把信还给了邮递员，不肯收下。希尔十分纳闷。邮递员走后，他好奇地问姑娘为何不收信。姑娘羞怯地告诉他，信是她远方的未婚夫寄来的。因为那时邮票还没有发明，邮费由收信人支付，可邮资昂贵，她付不起，所以不能收。不过，她已从信封上了解了对方的情况。原来，他们事先约好在信封上作一种只有他俩才懂得的表示平安的暗记，那样，用不着看信的内容就可以互报平安了。罗兰·希尔也因此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枚邮票——“黑便士”。我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收到姐姐寄来的类似信件，表明她的处境是安全的！

不久，父母作了决定：逃离斯洛伐克，去匈牙利。作出决定的时候，父母是很坚决的。

父母一直同居住在塞拉镇的外祖母和住在匈牙利的二姨塞娜、小姨内莉保持着联系。他们商量好了，父母和我及大姨阿纳卡尔、大姨父雅各布和他们剩下的惟一的儿子汤姆斯一起走。非法穿过边界，躲藏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当时的匈牙利，由于是德国的“同盟国”并协助德国参与了1941年对苏联的入侵，因此还未被德国占领。欧洲各国许多遭迫害的犹太人纷纷逃往匈牙利避难。

大姨和大姨夫的另外两个儿子弗兹、欧文和姐姐朱迪思已被纳粹抓走，他们同我父母一样担心着自己最后一个孩子汤姆斯的生命。外祖母家的一位亲戚弗德比夫妇决定不参加我们的逃亡行动，他们为女儿埃里卡尔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藏起来，后来，埃里卡尔成功地逃脱了纳粹的魔掌，但她的父母被纳粹抓到，惨遭杀害。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第二章

1942-1943年到匈牙利躲藏

小姑父彼比·斯托恩是个能人，而能人总是很有办法的。他为我们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向导，同意带领我们穿越斯洛伐克与匈牙利之间的边界线。当然我们要付给向导一笔钱。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秘密中进行着。

1942年晚春的一天，我们作好了准备。那一天天气十分温暖，母亲却让我穿上厚厚的外套，我不愿穿，因为那样不舒服而且看起来太臃肿。对于我的小算盘，母亲当然心知肚明。人都是爱美的，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但是母亲坚持，毕竟天气还会有变化，路途又遥远。母亲赢了，我最终拗不过她。实际上我没有意识到我离开布拉迪斯拉发穿的那件大衣是我的惟一一件大衣，在以后的一年半里它一直陪伴着我。我还穿了几条短裤，两件短上衣、一件花呢上衣，上衣配有一条棕米色头巾，穿上一双舒服的皮靴子。我们每个人都背一个双肩包。

简单拾掇一下就出发了，我们分别走到火车站。我和父母为一组，大姨、大姨父和他们的孩子汤姆斯在另外一组，两组单独行动。要是一起走，那会十分显眼，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没有身份证明，所有的一切都扔在家里。战争期间，财产已是身外之物，转瞬即逝的生命比所有的财产都要珍贵，所以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悲伤。我抬头望望家，又望望生我养我的城市，一阵恋恋不舍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们登上了火车，坐在不同的车厢里，列车向遥远的匈牙利边境一个叫海济萨胡姆的小村庄驶去。

在匈牙利边境附近，暮色初起的时候，我们下了火车，正如预先安

排的那样，向导在等着我们。那位农民向导是个中年人，有着数年偷越边境的操作经验，十分专业。什么季节，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走什么路，遇到人如何应对，他了然于心。遇到突发事件，他有临危不惧的从容，虽然在报酬上要价不低，但还可以接受。

向导在前面带路，我们紧随其后。连呼吸都是轻轻的，一句话都不能说，也委实有点儿寂寞。寂寞的旅途夹杂着离愁的伤感，一种恐惧的情绪从心底的一个角落钻出，逐渐地扩散着，蔓延着。大姨、大姨父和表弟走在后面，我们都十分小心，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太阳藏到了山后，天慢慢黑下来，我们走得不快，后来在一片森林旁停住了脚步。向导走过来，告诉我们下一步如何行动，并收了钱。那是一个危险的交易，他很容易把我们遗弃在那里，自己绝尘而去，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他是个诚实的人，遵守了在交易中的承诺。

虽然是夜晚，但光线很好，空中没有什么云彩，月亮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天亮其实很危险，我们不得不休息一下，等待月落。那天，我们一点都不觉得那明亮的月亮美丽，反而希望它不要那么明亮，越暗越好。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启程了，默默无语地走了很久。小路崎岖不平，越走越黑。天黑路又不熟悉，高一脚低一脚地向前走着。对黑暗的恐惧，像一波高过一波的潮水淹没了我们，那情景我至今回想起来还起鸡皮疙瘩。

我们穿过一条小河，河水很浅，还没有没过我们的脚踝。我感觉到刺骨的冰凉，更感觉到对不起我的新靴子。过了河继续向前走。农民向导总是走在我们前面，他那敏感的耳朵可以捕捉到任何异常情况，有时他转过身来告诉我们躲避一下，因为前面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反正他对眼前的一切常常敏感得不可思议。我非常地惊恐、害怕，而且十分疲劳，但我不敢抱怨，也不敢说一个字。

我们终于停下来了。向导告诉我们，已经越过了边境，一颗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我们很快就到达了森林的对面，然后进入匈牙利边境内的一个小村庄，此时天已经接近拂晓，偶尔有一两声鸡鸣犬吠从村子里

从
奥
斯
威
辛
集
中
营
到
澳
大
利
亚

飘来。

在那里，另外一位农民向导接替了工作，领着我们到达了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我们可以休息了。他把我们领进一个破败僻静的房屋，那儿为我们准备了一张大床，我记得有一个皮制的枕头和一条白色松软的床单，可以在那里睡一个好觉了。

不久，我们又继续上路了。我们到了匈牙利边境的一个火车站，搭乘一列直通布达佩斯的火车。那里的环境十分可怕，在那样的小村庄里，人们互相熟悉，对陌生人很容易产生怀疑。我们在那里见到很多边境上的卫兵，他们都戴着很滑稽的皮帽子，手拿着寒气逼人的刺刀。

向导事先为我们买好了车票，我们走进车站，登上了已经停留在那里的火车，其它的事情也就不需要安排了。我们十分幸运，没有被别人发现而让我们出示身份证明。几个小时之后，火车开进了布达佩斯的凯莱特火车站（东火车站），那个灰色的火车站又大又旧，我们在那里越发显得孤单。

有一种情况解决不好就会出问题，语言——当地要讲匈牙利语，幸好父母都会说，这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我是第一次光顾欧洲著名古城布达佩斯，它风光秀丽，景色如画，被人们誉为“多瑙河畔的明珠”。布达和佩斯原是一对隔河相望的“姐妹”城，多瑙河把市区分为东、西两部分。河右岸多山，为布达；河左岸是平原，称佩斯。横跨多瑙河上的9座大桥和穿越多瑙河底的地下铁道，把布达与佩斯紧紧相连。蓝色的多瑙河恰似一条晶莹夺目的翡翠项链，从布达与佩斯之间缓缓流过，蜿蜒曲折地连缀了两岸星罗棋布的名胜古迹。

居住在匈牙利西部松博特海伊的小姨内莉已经为我们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安爪斯库特寄宿处找到了一处房间，那是一个旧式的大公寓，公寓的主人出租他所有的房间。我们伪装从乡下来，到布达佩斯是来看病，因为父亲病了。由于没有身份证明，无法在那里登记，3天后我们还是搬了出去，找到另外一个地方栖身。

在布达佩斯的亲属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外祖母从塞拉镇为我们寄来了钱，足够我们在那里逃生用了。一位在松博特海伊的亲属欢迎我们到布达佩斯居住，给了父母一些匈牙利货币和一些可以购买食品的购物券，当时那些购物券可以到黑市买东西。母亲的一个远房堂弟朱利斯更是乐于助人，他从黑市上帮我们购买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朱利斯是一个穷小子，他本人靠家里给的救济品生活。父母为了答谢他的帮助，每次都多给他一些钱。

鉴于我们无法在寄宿处居住，父母疯了似的寻找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父亲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的，着实不是无缘无故，他担心某一天他在街上会被人抓住，会因为没有身份证明而被捕。

母亲成功地租到了一处房子，地点是在瓦胡曼乌达卡，是和善良的威利·库尼格犹太夫妇合租的。不过，我们没有向他们披露真实身份，还是讲老故事，说父亲需要到布达佩斯治病。我们是来自农场的人，有自己提供食物的办法，购物券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然而有一个问题，就是房子狭小局促，只能摆下一张双人床，没有我住的地方，只能在地板上打地铺。

时隔不久，大人们觉得小孩在城里更危险，商量要我搬家，到乡下去。要送我到住在松博特海伊的小姨内莉家住，她愿意我到她家住几周。她的小叔子路易斯·霍鲁泽到布达佩斯来接我，我们一起乘火车来到松博特海伊。一开始我还很高兴，不久就感到很孤单，因为十分想念父母。我毕竟只有16岁，也从没远离过父母。

小姨父约瑟夫·霍鲁泽不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可是很有钱，全家人住在一座十分有特色的漂亮房子里。他们只有一个女孩，叫安库尔，她十分漂亮，但是也被宠坏了。除了小姨、小姨父，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我有一个假的出生证明，起了个假名字罗丝。我装作是从乡下来探亲的，我的匈牙利语不是十分地道，半生不熟，但是可以利用有限的单词蒙混过去。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晚上没人的时候会因为想念父母而哭泣。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小姨还算年轻，却自有一种成熟风韵，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但清楚了，有条有理。她总是很和善，脾气也很好。但我知道她的婚姻不十分幸福，她与约瑟夫之间的感情就如黑暗角落里滋生的青苔，看上去是翠绿新鲜的，可给人的偏偏是阴冷潮湿的感觉。

小姨是一个现代女性，毕业于维也纳一所寄宿学校，喜爱音乐和体育。在战争爆发之前经常去布拉迪斯拉发，愿意和她的姐妹们住在一起。我的到来，她先是乐不可支，继而了解我并不快乐。她知道我是想父母，总是感到孤独，因此几周后我离开松博特海伊，返回布达佩斯。

见到父母后，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放声大哭起来，祈求父母再也不要把我送出去了。父母对我这惟一的女儿也疼爱有加，发誓再也不会让我一人出去了。他们仍然住在库尼格家里，我继续在地板上打地铺。

一天，库尼格夫妇邀请父母参加他们与朋友的一个下午茶聚会，父母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他们没有感到害怕。有母亲帮忙，库尼格夫妇的下午茶聚会办得快乐而又喜庆，热烈而又活泼，咖啡煮得好，茶也喝得快。大家在一起喝得高兴，气氛渐入佳境，似乎忘了外边的世界。

那天晚上，母亲有了一次不寻常的遭遇，那次遭遇使母亲一生都对此记忆犹新。就在他们品茶、喝咖啡的过程中，坐在母亲对面的先生目不转睛地盯着母亲，仿佛想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琢磨出几分深意来。过了一会儿他问母亲能否让他看看她的手，他握住母亲那只漂亮、修长、白皙的手，仔细察看着掌心。

他似乎能以小见大，从手掌里头看世界。初次见面的他几乎对我们家的情况了如指掌，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原委，却转弯抹角说了许多事实。他告诉母亲说：“夫人，我能看出来你遇到了麻烦，能看出来你左肾受过伤，还能看出你有两个孩子。噢，我的上帝！你的一个孩子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像是被一条铁链子绑着，她动不了，只能到战争结束才能知道她的生死。可你另外的一个孩子是自由的，战后她将到很远的地方，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要飘洋过海，到一个阳光明媚

的地方去。”

刹那间，母亲不知该说什么好，脑袋嗡的一声变大了。她并不是找不着话说，而是出现在脑袋里的词语统统不像那么回事，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是“对不起”。她自己打破尴尬，从他的手掌中迅速抽出白己的手，转身离开了房间，明显的伤感。她的心被那位男子的一番话给搅乱了。

大伯的女儿罗斯和丈夫曼诺在维也纳的针织品工厂在战争期间被迫关闭，在她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后，也来到了布达佩斯生活，因为他们有匈牙利国籍。我在布达佩斯躲藏期间，罗斯对我们支持很大。她十分友善，我们经常见面，她十分愿意同我们待在一起。她的婚姻并不幸福，但我对此知之甚少。罗斯十分漂亮，回来不久她就有了十分崇拜她的男朋友威斯莫。威斯莫来自匈牙利北部的米什科尔茨，他有两个妹妹朱丽和吉兹，她们很快成了我的好朋友。

吉兹和她已婚的姐姐朱丽、朱丽的丈夫及他们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他们的家离我们居住的地方不远。吉兹是一个服装设计师，母亲就让我到她的服装设计沙龙工作，那样可以提高我的缝纫水平。我的技术很快就得到了她们的认可，我的工作对吉兹有极大的帮助，也使她获得了效益，但她从不付我工资。

我为能在那里消耗时光而感到高兴，也知道在那里十分安全。然而也有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和他们杂然相处，我不得不小心谨慎，注意我自己说什么、讨论什么。他们也许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但从来不正面提问，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

父母还在执著地寻找新的住房，因为库尼格家的房子太小，过于狭窄，没有父母用来方便的卫生间。在库尼格家不远处有一处新盖好的高楼可以出租，父母过去询问，发现那里非常适合我们，就租了下来。我们租了一个四楼的房间，看起来很漂亮，是一套新房子，十分干净。有一个小阳台、小厨房、洗浴室，还有电梯。

我们搬了进去，还租了一套家具。外祖母寄来一些羽毛枕头、被子、床单以及锅、碗、炊具，家庭必备的基本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厨房的碗

柜不是十分大，但是设计十分巧妙，白天它是一个装饰品，到了晚上拉下来就成了双人床。

我有一个舒服的垫子，可以铺在房间的一角，晚上就睡在那上面，床垫十分宽敞。我在屋里无所事事，待得叫人发愁的时候就经常打扫房间。我擦洗地板，让它保持着整洁与光亮，我还经常擦洗门框，使用的是松节油和醋，直到特别干净才满意收手。

房间乱了可以整理，心乱了呢？父亲足不出户，整日用读书和自制香烟来打发时光。他有一个小设备，把白纸放在里面，然后放上烟叶，用机器一卷就出来一支漂亮的香烟。我的匈牙利语水平也很一般，只好临时抱佛脚，尽最大努力来提高匈牙利语水平。我经常到图书馆去，借一大堆匈牙利语书拿回家来读。有时候，在清晨六点钟左右，我会去杰勒特游泳池，那时街上的熟人比较少，不会被很多人注意到。

我没有其它的娱乐活动，也不允许到其它的地方去。表姐罗丝时常带我去她在顶楼上的公寓，在那里我愿意帮她做饭，捎带脚做一些家务。有时她还带我去糕点店，给我买香草面包，特别好吃。

父亲就待在四壁空空的家里，郁郁寡欢。心中总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寂寞无可排遣，不能购物、不能聚会、不能派对、不能谈生意，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桌前。母亲鼓足勇气出去购物，十分危险，因为她没有身份证明。她还去巴勒斯坦办事处打听移民到巴勒斯坦的申请批准情况。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米卡·克劳斯先生60多岁了，精瘦精瘦的，脸上皱纹累累，像块揉皱的破布。他的态度像一堵砖墙一样，将母亲顶了回来，从他嘴里蹦出来的词汇从来就没有给过我们希望与鼓励。

年轻的我很难体会父母复杂的内心感受，我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1943年的冬季，天气异常的寒冷，我御寒的衣服不够了，小姨内莉给了我一件她穿着不合身的皮大衣，我穿上特别合体。母亲借给我一个棕黄色的皮包，还为我订购了一双时髦的在舞台上演出穿的鞋，那双鞋后来几乎就没有离开过我的脚，最后实在不跟脚了，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将它扔掉了。我还到布达佩斯最为时髦的瓦兹乌达卡街的一家商店购买

了一件外套，这是一种贴身的款式，我不好意思试穿，因为里面没有穿内衣。母亲为她自己和我买了一些棉布，吉兹为母亲制作了一件考究的服装。没用别人帮助，我为自己设计了一件短袖上衣，前面有两排金色的扣子，漂亮极了。

那些事情看起来都很正常，可我们家的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父母总是着急上火，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有一天，母亲十分不高兴，是我惹的祸，母亲叫我的时候我没有及时应答，我真是“不应该”。母亲被我的行为所伤害，发了脾气，打了我一顿，尽管那是母亲最后一次打我，但当时我却记在心里，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有好几天不和任何人说话。感觉也许是一种错觉，其实母亲没什么错，我自个儿可能也没有错，母女之间的矛盾，说不定是由于某种神秘的激素正蓬蓬勃勃地成长造成的，我进入青春期了，到了那个青涩得不计成本的年纪。回想起来，一股歉疚的情绪就会偷偷袭来。

几周来，我一直把歉疚的情感埋藏在心底，没有对其他人有过任何吐露，但隐瞒最终给我带来了压力。于是我终于向母亲道出了心思，请求母亲原谅。令我欣慰的是，她的反应非常平静。“我的孩子，”她对我说，“妈妈早忘了。”母亲的这番话使我如释重负。从那以后，我们母女俩的心贴得更近了。

当时，我们周围的政治形势越来越糟。随着1943年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失败，时任匈牙利总统的霍希准备同苏联议和，他拒绝了希特勒要求匈牙利继续参与对苏作战的命令。希特勒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派兵入侵了匈牙利。随着德国人的入侵，执行“最后解决”方案的盖世太保及其帮凶也来了。1944年春夏之交，更大规模的反犹、排犹行动开始，匈牙利的犹太人遭受了更大的苦难。在德国占领匈牙利的几周内，艾希曼及其在匈牙利的走狗，也就是匈牙利纳粹，已安排好了开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列车。

突然，那些躲藏起来的犹太人被告发了，逮捕外国犹太人委员会所属的警察局买通了一些公寓的看门人为密探，只要他们告发犹太人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就可获得报酬。身边的人，纠结于内心的同情心逐渐演变成一种怪异的行径，似乎一夜之间都成了魔鬼，他们随时都会告发他们所发现的犹太人，这对我们的生存和生命构成了严重威胁。

我们的房东正好是一位十分特殊的人，幸运的是他不问什么问题。城市的大街小巷充满了告发者，父亲有一次在街上被一位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老朋友认出来了，他现在就在搜捕犹太人的警察局工作。他还算有良心，走到父亲身旁告诉父亲：“赶快消失，如果有人看见你和我在谈话，你就会被捕。”在街上被告发的人被抓到后，很快就会被驱逐到奥斯威辛。

经过1944年夏那一轮大搜捕，我们失去了与居住在塞拉镇的外祖母的联系，他们都被捕了，被送到奥斯威辛，在那里惨遭杀害。在第一轮驱赶犹太人的暴风雨到来前，布达佩斯的排犹行动已经有了征兆，布达佩斯是整个驱犹行动中的最后一个中心。那一段时光，天空是暗的，河水是干的，日子是苦的。

我们对形势的判断，决定了我们生活的方式。日常生活变得让人十分难以忍受，如果我要上街，必须特别小心谨慎，街上有很多受雇于抓捕犹太人警察局密探的“瞭望者”，他们在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上搜索着犹太人。我们总是避开人群，避免有人认出我们。总是紧张、害怕，我们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可能吸引别人的注意，被人抓走。有人告诉我们，那些被捕的人“被送到波兰”或者“被送到奥斯威辛”，当时我们还不完全懂得这两句话的含义。

在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我们总是竖着耳朵，听到奇怪的声音就以为是报警的信号。不能同公寓的其他住户交谈，怕万一说漏了嘴暴露出真实身份。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确实不能叫人放心。

1944年初，几乎每天都有空袭，吓人的警报声每次都使我发抖。人们一听到警报就赶紧跑到隐蔽室，但那却给我们出了难题。我们不想走四段楼梯跑到隐蔽室，因为那里要登记名字，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认出我们来，没人知道别人会问我们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去，我们

在隐蔽室里见过所有的住户，有时我们要在空袭警报解除后长时间地待在那里。

有一对年老的叫弗瑞达的夫妇，他们有一个女儿，是来自南斯拉夫的藏匿者，同我们一样，也藏在公寓里，算得上点头之交。后来我见过他们的女儿，是在解放后的贝尔森集中营，她告诉我当初是如何随着父母在布达佩斯过着噩梦般躲藏生活的。

空袭一般发生在白天，有时也在晚上。纳粹在街上设了路障，盘查过往的行人，令我们十分害怕，也十分危险。匈牙利抓捕犹太人安全委员会的警察到处寻找躲藏起来的犹太人，一开始是在街上设路障寻找，后来发展到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隔三岔五就会搜查一次，令人防不胜防。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心里觉得相对安全一些，至少当时是那样。

一天，公寓的看门人向我们报警，门口的街道两头都封闭了，几分钟后纳粹要挨家挨户搜查。他告诉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逃离，赶紧收拾一下逃吧。同时他向我们表示他自己不是告密者，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还告诉我们他早就怀疑我们了，以前见面说过两句话，他就从我们的表情上琢磨出我们是干什么的了。他还劝告我们在这里躲藏是不合法的，警告我们身处极度危险之中。我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叫他看出了破绽，感谢他的及时报警。当时情况危急，就匆忙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回去。

母亲将父亲带到了一家犹太人医院，父母的一位老朋友的女儿在那里做护士。父亲装成病重的样子，我们认识的护士把父亲安置在一张病床上。母亲和我跑到街上，在街上走了很久，然后又租了一间房住下。

那间房位于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我经常在椅子上睡觉，因为床上有臭虫，它们一嗅到人的气味就扑过来。我特别恨它们，无法忍受它们。我们不得不经常更换所租的地方，有时找不到租住的场所，就找一个地方躲藏几个小时，又换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非常郁闷，又十分恐慌，只要能找到栖身之处也不管条件如何，

能栖身就行，阁楼上、洗衣房的熨衣台上我都睡过。防空警报响过之后，我们不敢去躲避，当整个建筑都在强烈震动的时候，母亲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一次我们在顶层的阁楼上住，看见轰炸机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扔炸弹，我非常害怕，整个下半夜都在哭泣。那是一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环境，我们像被人瞄准的动物，每天都在恐慌中度过。

第三章

1944年春返回布拉迪斯拉发

父亲在医院里则相对安全些，但他的心情却异常沉重，焦虑不安。他六神无主、心烦意乱，头发不梳不洗，任其支棱着，忽而卧床叹息，忽而依窗眺望，心中猜测着犹太人的命运，家人的命运。他那副神不守舍的样子让人看了心痛。他联络原来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些老朋友，同他们分析形势，揣测德国纳粹下一步排犹计划。父亲认为：布达佩斯的环境太恶劣了，在那里就是等死，尽管人生有许多时光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但被动等待的时候，一颗心悬着，前景未卜，生死不明，那滋味不好受。

应该怎么躲避灾难？是一个令几乎所有身陷囹圄者狼狈的问题。父亲的结论是：我们不能麻木并乐观着，甚至不惜自欺欺人，实际上我们的命运就捏在德国纳粹手中。我们实在太渺小，渺小到不知道明天自己的命运，渺小到不知道明天自己会不会被纳粹抓走，渺小到不知道今天深爱的人明天是否还存在。要尽快离开此地，早一天走就多一份生存的希望，晚一天走就多一份危险。继续待在布达佩斯绝没有出路，结果明摆着，凶多吉少，在劫难逃，不能听天由命等着纳粹找上门来。

父亲清醒地认识到：形势总是风云变幻，阴晴不定。比形势更可怕的，是等待，比等待更可怕的，是死亡。还有什么会比等待死亡更能吞噬人心，更能让人不寒而栗的？要命的是，那是一个多么折磨煎熬人意志的等待，或许下一个被捕的就是我们！人是万物之灵，父亲的大脑里似乎有一个人提醒着他，在浩劫面前，“听天由命”一词只存在于蠢人

的字典里，它是人们在浩劫面前的一剂毒药，是对浩劫的顺从和无奈；人在紧要关头绝不能服用，要学会在“听天由命”以外进行选择，因为，“听天由命”是一种不合逻辑的逃避。

父母商量之后，有了一个新的决定，就是马上返回布拉迪斯拉发。有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却不知道如何应对，束手待毙是一种愚蠢的选择。在当时的环境下，回到家乡是必要的，它能让对未来无从把握也无从掌控的我们多少有了一点希望。如果我们固执地不肯离开，或者愚笨地认为形势还会有所好转，那你就不会躲过浩劫，更为可怕的是更大的灾难总是紧紧跟随。好在父母已经意识到浩劫马上就要来临，就像推倒了的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倒下，马上就要到我们身边了。

我当然也愿意回到家乡。在布达佩斯，我百无聊赖，只能在屋里晃荡，与邻居几乎不接触，只同寥寥几家相识，原本就同他们不熟悉，再加上怕暴露身份，同邻居见面形同路人，总是思念家乡那些没有隔阂的邻居。在布达佩斯，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在那里还能躲藏多长时间，布拉迪斯拉发毕竟是家乡，各种环境都十分熟悉。父母认为：回到布拉迪斯拉发一定比待在布达佩斯要好得多，还是应该返回到布拉迪斯拉发。

大姨和大姨父也都同意，他们的儿子汤姆斯也准备和我们一起走，至少我们几个人互相信任，互为依靠。我们又联系母亲的表哥朱利叶斯，告诉他要离开布达佩斯，他马上把我们要离开的信息传递出去，他是个好人。

那是1944年的早春，我们离开了布达佩斯。时至今日，布达佩斯宽广的街道、巍峨的大桥、时髦的服装、善良的人们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返回的路程也令人十分紧张，朱利叶斯帮助父亲同当初为我们来匈牙利当向导的人取得了联系，由他重操旧业，当然费用和来的时候一样。我穿着那件自己缝制的宽大的有着金黄色纽扣的衣服，穿上那双漂亮的舞鞋，其它的东西都带不走了，不得不留在布达佩斯，我特别心疼

小姨给我的那件皮大衣。

父亲看起来十分着急，身体还算强壮，但体重减了很多。他总是鼓励、安慰我们，从来不考虑他自己。他是一个十分杰出的人，我非常爱他。我们启程的那天，从布达佩斯的凯莱特火车站坐上了火车，经过几个小时，列车在靠近边境的那个小村庄停了下来。我们徒步穿过小村庄，来到了边界线。母亲的头上披了一件披巾，装扮成是当地的妇女。我也一样，尽管当时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因为那样看起来像个农民。

作为近17岁的少女，我已经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了。布达佩斯的时装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女孩子当时为了体现身材美，都不戴乳罩，但不知道它对母亲是否也有影响。我的身体在匈牙利那段时间长得很快，看起来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女性了。但我实际上还是一个孩子，对我们当时面临的形势的严重性还没有深刻的认识；知道我们面临着危险，但并没有想到别人会真的伤害我们。

出发时已是傍晚，红彤彤的云彩扯在天边，东一块西一块的。走在那条熟悉的路上，父亲装作病人，身上披着一条毯子，母亲装着搀扶着父亲，我紧紧地跟在他们身后。匈牙利的宪兵就在站台上检查过往人员的身份证明或旅行证件，当然我们什么都没有，自然会遇到各种各样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麻烦，只能默默地祈祷可以顺利通过站台检查。

父母和我没有被人注意到，但大姨和大姨父遇到麻烦了，被匈牙利宪兵抓住了。15岁的汤姆斯和我们走在一起，他的父母遭到逮捕马上就要被带走了，他都没敢回头看一眼。大姨和大姨父就那样消失了，被驱赶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从那时起汤姆斯从不说起他的父母，他把痛苦与悲伤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又见到了那位向导，他轻车熟路带领我们走过了村庄到达了森林边，又蹚过了那条没过脚踝的小河，那条我们曾经在1942年蹚过的小河。

一路上，我只是和汤姆斯默默对视，窒息般的沉闷。他强忍着泪，能看得出，他苦涩的心在流血，内心燃烧着错综复杂的感情，悔不当

初。返回家乡的决定正确与否，都无需再多说，那个倒霉的站台，是他心中的痛。此情此景，催人泪下。

我们整整走了差不多一个晚上的光景，最后穿过了边境到达了斯洛伐克。我们设法登上了开往布拉迪斯拉发的火车，到家时已经是身心疲惫，精疲力竭了。

那年4月，回到阔别两年的故乡，我们贪婪地呼吸着家乡大地清新的空气，很快被周围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了。进了家门，看到家里的旧物，家里已经变了样，罗斯博格家族——父亲的亲戚住在这里，当然他们的亲戚有很多被驱逐，那些人的命运也无人知晓。

我们的家从外面看没什么变化，但从里面看就大不一样了。人是物非，家具都被推到墙边上，房间看起来更像一个储藏室。确实，它还真是一个储藏室，只不过储藏的内容不一样，那里储藏的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龟缩在一起十分害怕的人。

我试着寻找当时我们去布达佩斯之前安置的一些东西，我们曾经找一些可靠的人代为看管，然而却没有发现什么。只发现我和姐姐朱迪思用过的两辆自行车，那两辆自行车对我们的家庭来说十分需要。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到附近的农村购买食品，每次我和父亲一起去。不过离开城市到乡下去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们要找东西吃呀！我就和父亲到我们周围的地方，寻找他有认识朋友的地方，骑着自行车去购买食物。

出外骑车购物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惬意的是沿途可以看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每次我都是不由分说地冲将出去，像一只离开鸟笼的小鸟。那种骑车购物，路途遥远而且十分劳顿，可我并不在乎，总是盼望着下次远行早日到来。我认为骑着自行车与父亲到空旷的农村远行，要比关在家里与那里害怕与忧愁的人们待在一起感觉好多了，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乡村的美景。春末夏初，野蔷薇这儿一丛那儿一丛，生机勃勃地开放着，粉红一片，漂亮极了，比城里卖的大朵的玫瑰、月季之类要动人得多。那里山是绿的，河是蓝的，小鸟自由飞翔，鸟语花香，煞是好

看！我望着在草丛中上下翻飞的蝴蝶，忽然间，羡慕起那些只有一年生命却无忧无虑的美丽生灵来，如能乘着蝴蝶远去，该有多好！

我去拜访过我过去的一些同伴，同一位叫杰蒂的同伴联系上了。她和她寡居的母亲一起生活在布拉迪斯拉发一处被人遗弃的房子里，她们也是从原来居住的地方被赶出来的。另外，还有一位和我们同岁的朋友叫弗瑟尔，原来是十分要好的姐妹，可她当时有了支持纳粹的倾向。时局动荡，人心叵测，不能和她联系了。其他的同伴要不消失了，要不就躲藏起来了。

尽管生活很艰难，但与匈牙利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全家人可以自由地在一起，仍然可以待在家里，还可以到处走一走。当然也要格外小心，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那时的纳粹党卫军可以随意毒打犹太人的。

1942年开始的驱逐犹太人行动在那里进展相对缓慢，居住在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有很短的一段安全的时间。当然“安全”一词也是相对的，它意味着人们并不害怕，他们所爱的人天黑之前能回家。1944年初，满载着犹太人从匈牙利开往奥斯威辛的“死亡列车”^[1]已经开动了，相比之下，当时斯洛伐克相对平静，但这只是暂时的。

灾难对于最靠近它的地方，总要发生一些悲剧。在那段不幸的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件，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姑弗丽达和二姑父奥色卡的儿子尤金是一位年轻的律师，他在为地下组织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和美国大使馆的人有联系。斯洛伐克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布拉迪斯拉发有许多外国大使馆，其中包括美国大使馆。尤金为家里的所有成员搞到了假的身份证明，那意味着我们是“美国公民”，是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之下。我们的身份证明也理应受到斯洛伐克政府的保护；党卫军和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也要遵守斯洛伐克的法律和国际

[1]死亡列车：德国纳粹采用所谓“重新安排”、“到东方安排就业”等欺骗手段将在欧洲各处搜捕到的犹太人运送到各大集中营分别屠杀。运送的交通工具主要为火车，每趟2000至3000人，被称为“死亡列车”。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法，要尊重那些被保护的人。

斯洛伐克的形势在1944年8月末变得危险起来了。在斯洛伐克中部、东部爆发的反对蒂索当局的起义为德国入侵斯洛伐克提供了借口，德国人声称他们入侵斯洛伐克是为了“保卫”这个国家。随同德军入侵的还有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我们的生活再一次被恐怖所笼罩。

战后，我才知道了我表哥尤金的命运。当时告发犹太人可以获得奖赏，任何能披露出犹太人藏身之处的人都会得到德国人的奖励。德国人入侵后不久，新一轮的驱逐活动又开始了，尤金被人告发到党卫军，党卫军派密探跟踪尤金，以便通过他找到更多犹太人的藏身之地。

一天，在市区，尤金突然意识到被人跟踪了，他开始跑，跑进了一个能为他提供保护的家庭。党卫军马上封锁了那幢房子，在三楼抓住了尤金，立刻将他从三楼的窗户扔了下去，他当即被摔死了。一个正常的生命，不正常的死亡，那是党卫军对我们家族成员的一次公开的谋杀，是对我们的沉重打击。光天化日之下杀人，德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干？

我父母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我们有美国的身份证明，但我们还是应该尽量躲藏起来，此外别无选择。我家隔壁的邻居奇默拉一家是我父母多年的老朋友，父母对他们一家完全信任。他们夫妇是一家药店的药剂师，全都信仰天主教，非常同情我们。

他家有四处公寓，一处是在药店后面，紧挨着我家，另一处在附近的一个比较现代的建筑里。奇默拉一家在我们1942年去匈牙利躲藏期间帮我们保存了一些物品。当时他们主动让我们到那所现代建筑里躲藏，我们接受了并马上搬了进去。

汤姆斯和我家一起生活，因为他没有地方去。我们只带去一些必需品，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冷食和干粮是我们当时吃的主要食物。那时，白天我们只能待在那里。只能静静地待着，不敢说话，不敢走动，甚至入夜之前不敢冲洗厕所。奇默拉夫人为我们提供一些食物，都是她下班后顺路购买的，那是我们当时与外界惟一的联系。

有时候，我也渴望活动、外出、交往，但可能要以被抓住作为代价，

那未免太不值得了。白天，我躲在窗帘后，站在那里百无聊赖地观察着交通情况，数着人行道上过往的行人，以此来打发寂寞的时光。晚上，站在窗前怅望城市，若有所思，我知道，有些事情本身我们无法控制，只好控制自己。我的天性好动，我必须耐得住性子，惟有带着那样的心理去生活，才能避免被抓走。

奇默拉夫妇有一个儿子，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他从来不和我们说话，我感觉他缺乏同情心，对我们住在他家十分不满。他是一个大学生，不赞同他父母同情犹太人的态度和行为。十分自然，为犹太人提供躲藏地的非犹太人家庭也面临着危险。

当时的情形确实很困难，我们也只能同家族的其他家庭取得联系，特别是巴杜斯和费德里博两家。我们一点儿都不敢掉以轻心，已经确定好了互相警告的信号，那个信号就是通过电话传达信息：“让我们到市场去。”其隐含的意思是“马上躲起来。”我们在奇默拉家只躲藏了两周，然后就被出卖了。

第四章

1944年秋被抓到塞雷德中转营

1944年8月初的一个下午，我们听到了钥匙在门上转动的声音，每个人都呆若木鸡。那个声音十分不寻常，是不详之兆。因为奇默拉夫人一般不在那个时候回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母亲见到那个场面，似乎要死过去。门开了，奇默拉夫人和一位水果店的老板站在那里。水果店的老板站在奇默拉夫人旁边，他穿着斯洛伐克法西斯党卫军的服装，褐色的衬衫，戴着德国纳粹标志的袖标。那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没有人动，也没有人出声。

他们装出十分友善的样子告诉我们不要惊慌：“你们是‘美国公民’，是安全的，是可以得到保护的。”我们当然不相信他们的话，水果商的表情非常之假，皮笑肉不笑，脑袋高昂着，两只眼睛冲人瞄着，流露出些许狡黠，那样子还真有几分狰狞阴险。我们后来才知道真相，那个人心太坏，不是善主，他早已同德国人勾结在一起，成为叛徒。

叛徒，出卖良心者，打我从孩提时起，父母和学校的老师就反复告诉我们，说那是世界上为人们最不齿、最可恨、最不幸的人，是最为虚弱和怯懦的表现，没有骨气。水果商已经对奇默拉夫人施加了压力，她跟他沆瀣一气，将自己身上的那一点点人格与良知出卖了。

实事求是地说，起初奇默拉夫人对我们一家是同情的。对于他人的灾难，同情心起初可能存在，但一旦灾难持续下去，一切有良知的人都在经受着内在的道德冲突和外在的非理性环境对他们的双重考验，一些人的同情心会逐渐消退、遗失。另外，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比想像的

要大，在同情心上，他们之间有着无法言喻的鸿沟，特别是当事人也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

我并非存心刻薄，而是想从中得出一个很实在的结论：在那个世界上，人皆有同情心，但当人们特别需要它的时候，它未必总是在场的，也未必持久。它经常会在最关键、最需要它的时候缺席，或者失去了它的深度和尺度。

奇默拉夫人支支吾吾地说，她要收回租给我们的公寓，让我们“搬到”一个外国人居住的叫玛丽亚安喀的地方，水果商可以带我们去。那是一个小城镇，离布拉迪斯拉发不远。

美国公民在战争期间是得到保护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1944年10月美国参加对德战争已经整整两年了。我想没有人相信水果商编排出来的故事，但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收拾起我们的物品，放在行李袋中，默默地跟着水果商走了。

我记不清楚了，似乎是水果商亲自开着他的运货车把我们全家送到了玛丽亚安喀的。那里的建筑是巴洛克风格的城堡，庄严地坐落在一个漂亮的、经过修饰的公园中央，我们到达时，城堡似乎很空旷，但我们很快就发现其他被抓捕的“美国公民”早已在那里。那位水果商后来还送来了由他抓捕的我们家族的其他成员，其中也包括我的祖母。

那时天气还比较暖和，我们席地而睡，待在那里只能任事态发展。每个人都着急，也十分害怕，但是我们在那里不能同任何人说话，担心怕再一次被人出卖。我们在那里谁也不能相信，两周后紧张的心情才略有缓解，因为我们知道，在那种环境下，我们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命运了。

父亲时常对我说：人生的旅途总是有起有伏，有顺境亦有逆境。不培养一定的生活能力，铸造足够的生命强度，使自己坚强起来，能够经得住千锤百炼，那么一旦陷入逆境，风浪袭来，随时可能被击垮。

8月底或者9月初的一个清晨，我们听到城堡外面噪声大作，党卫军包围了我们居住的整个建筑。一个级别很高的党卫军军官骑在一匹高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头大马上来到公园，我们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艾希曼臭名昭著的走狗，有“犹太猎手”之称的党卫军上校阿洛伊斯·布鲁诺，艾希曼派他到斯洛伐克来完成驱除犹太人的任务，要把那一地区的犹太人“扫平”。布鲁诺是一个残忍的虐待狂，喜欢对毫无防备的犹太人实施屠杀，我们当时所了解的就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他们命令我们穿好衣服一个挨着一个地走出房间。父母已经在房间外面了，该轮到我了。当我走出房门时，发现自己置身于骑在高头大马上的布鲁诺的枪口之下，他正在看着我，我不知道此时此刻他的脑子在想什么。

他的脸色十分严厉，看不出有人的情感，就他而言，我俨然不如一条病狗。我什么都没想，在他面前停了下来，怒目而视，那无疑使他震惊，我想他可能要对我开枪。一个党卫军对我吆喝着什么，我只好径直往前走，来到父母及汤姆斯旁边。当我来到他们身旁时，我早已被吓得浑身战栗，冷汗横流。

整个城堡被清空了，所有关押在那里的人都排成了队，党卫军命令我们出发。荷枪实弹的党卫军站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起往前走，平添了几分悲壮的气氛。汉先生和他的女儿希尔达也在行进的队伍中，他们与我家原来就熟悉，看到我们后，他面无表情地向每个人问好，跟我们从容地握手。他们十分勇敢，就在队伍离开城堡走到公路时，父女俩飞快地越过路边的树篱笆消失了，我相信其中一个党卫军看到他们逃脱，但没有来得及开枪。

不久，另外一个党卫军走到我身旁对我说：“走出队列里，跟我走，我会帮你的。”我吃惊地看着他，报以感谢，并告诉他如果我父母也和我在一起，我就出列。他不同意，我们又继续往前走。

时间不久，我们就来到了铁路旁，那里有一列装牲口的列车在等着我们，我们先是在车厢旁集合，然后被装进车厢内。没有人告诉我们任何事情，在我们当中，每个人都疑惑将被送到哪里去，每个人心中都没有答案。纳粹习惯用那种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恐惧将我们控制起来。

当时人们通常的表现是十分害怕，因为反抗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

小的时候就喜欢火车，尤其是坐在窗边，扒着窗户看外面的景色。景色是流动的，思绪也是流动的，许多早已遗忘的往事随着倒退的景物，又回到我的脑海中，可那次坐火车却没有了这种心境。火车行驶不久，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那就是中转营——塞雷德，尽管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只是在那里暂时逗留。

塞雷德位于布拉迪斯拉发东北55公里处，瓦赫河旁，那是斯洛伐克人起义失败后处理捷克犹太人的一个主要集中点和中转营，从那里把犹太人运到奥斯威辛。塞雷德集中营有两个功能，首先它是一个运输营，被抓来的犹太人只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然后装上列车送到奥斯威辛；其次，它还是一个劳动营，有一定数量的囚犯，他们在纳粹党卫军的看押下在工厂里紧张地忙碌着。囚犯们大部分是木工，为党卫军们制作家具，同时也为党卫军头子艾希曼和布鲁诺等的办公室制作家具，他们之中只有个别的几个高级工匠躲过驱逐，得以幸存。

下了火车以后，就被送到了营地。我们被领到了一个大棚子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囚舍，靠着墙有一排排的铺位，当时的囚舍相对比较干净，但是特别拥挤。期间，每天营中都涌入很多新抓来的犹太人，那里的条件变得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我们很清楚德国人正筹划着其他的什么事情。

父母睡在一个床铺上，我睡在地上，过去已经习惯这样睡了。母亲有一个皮枕头，外面套上一个灰色的枕巾，我清楚地看到她黑色的头发和白皙的脸庞枕在上面。令我们吃惊的是在中转营中我见到了汉先生和他的女儿希尔达，他们曾经在我们出发时机智地逃跑，可后来还是没有逃脱纳粹的魔爪，被抓了回来。还好德国人没有杀了他们，而是和我们押在一起。

当时，我们是无法控制自己生命的囚犯。点名是磨难的开始，我们站在囚房外面，等待着核对人数。布鲁诺总是亲自过来观看，他把点名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看作是一种消遣，十分欣赏他完全统治着别人，会利用任何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统治力。他是一个非常准的射手，骑在马上随意枪击囚犯。就在我到达塞雷德的前一天，囚犯老加斯曼正在院子里扫地，布鲁诺骑马经过，可能是看他不顺眼，不问青红皂白，一枪将他打死。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指定老加斯曼的儿子雨果·加斯曼为集中营的保安。就在他被任命不久，我见到了他，他是一个高个子、漂亮的年轻人，戴着一顶保安的帽子和袖章，看起来十分引人注目。

我们成了好朋友，与他相识使我的生活好忍受一些。有时他利用工作之便给我带来一块面包，那种关怀使我感觉到人有所不同。食物当时是短缺的，我总是感觉到饥饿，日益临近的冬天更使我担忧起我的将来，任何一点食物对我都是帮助。

在我们到塞雷德后的第十天，德国人命令我们拿着行李，在营房外排队。那是1944年9月的上中旬，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些食物——一片面包，比平常的面包略微大些。我们站好队，走到一个离废弃工厂不远的火车道旁，听候纳粹党卫军的指令。

我们乘坐的火车有很多节装牲口的车厢，每个车厢都标上了特殊的号码。我们都要登记，然后等着点名。当时，我们互相拥挤着、推搡着，卫兵们对我们喊着、骂着。我和父母被推进拥挤的车厢内，我们这节车厢装了120个人，通常情况下，那节车厢核定载员的标准是40人或8匹马。

就在车厢门关上之前，加斯曼跑了过来，递给我一个用纸包好的小包，打开一看是一块烤鸭。没有时间说更多的话，两人四目以对，眼睛就湿了。加斯曼有几分不好意思，他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战争一结束就会去看我。说话间，一抬头，瞥见阳光一闪，车厢的门关上了。我暗暗着急，赶忙起身奔了过去，待我冲到门口，车门已被反锁上了。

母亲和我吃起了烤鸭，烤鸭真香呀！父亲没有吃，他还在遵守着犹太教规，吃素。即使在那种环境下，他也没有改变。那时车厢的门已经关上了，车厢内一片黑暗，周围都是痛苦的人群，连叹气都别无二致，坐

也不行，躺也不是。在四周可以听到有人哭泣，还有人在祈祷，其他人在痛苦地呻吟。

那些声音都是人们心情的真实流露。一些母亲在喂养自己的婴儿，一些老人在遭受心脏病的折磨。时间不长，一些人大便失禁，车厢里充满了大便的臭味。当时，每节车厢只有一个便盆，我两天内拒绝使用它。但最后，没有办法了，只好求母亲用一个毯子把便盆围起来，在里面解决问题，当时羞辱的感觉还是有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小养成的习惯也逐渐离我远去了。

我们后来才知道那些火车是从欧洲各地调来的装牲口的闷罐车，车厢里没有床铺，没有座位，也没有厕所，只有一点干草，最长的路程大概7天。火车轰鸣，铁轨哐哐哐乱响，在车上到底待了多长时间，已经记不住了，时间对我们也不意味着什么。在那次可怕的火车旅行中，白天和黑夜颠倒了，我们所有的感觉就是痛苦、饥饿、饥渴。

惟一的安慰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奶奶奥玛与她热爱的孩子们在一起，对于我们来说她就是力量的源泉。她看起来文弱，但是在精神上她从来是强者。她镇定自若地坐着，那些年她经历的事情多了，家里的事，事事要她拿主意，成了大家的主心骨。多年来她磨练出一种本领，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面对大喜或大悲的事情她总是能让自己迅速地进入一种入定状态，在危难的时候担当起全家人的精神支柱，她知道全家人都在看着她。她没有一句抱怨的话，悲痛从没有显现在她的脸上。作为母亲，她对家庭的情感和对家人的爱心影响着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鼓舞着我们的信心，传递着母亲的温情。她以镇定自若的态度驱散着晚辈们的恐惧，她以母亲的慈爱鼓舞了我们所有的人，她以女人的热情温暖着我们无助的冰冷的心。

很多人在猜想我们的目的地，最后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奥斯威辛，但是当时那个词对我们而言还没有太多的意义。我们知道的是火车经过的城镇，偶尔可以看到的山——喀尔巴阡山脉，我们一直向波兰的北方前进。火车经常停下来，为军用列车让路，或者是更换卫兵，上

从
奥
斯
威
辛
集
中
营
到
澳
大
利
亚

一些食物，不过那些食物并不是给囚犯的，而是提供给德国人及其走狗和他们的狗的。

经过长时间几乎是无休止的颠簸，火车缓慢地停了下来，我们到达目的地。在车厢内就可以听到外面的狗叫。伴随着德国人的喊声，所有的车厢门都被打开了，阳光马上充满了原来黑暗的车厢，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眼睛。

令人奇怪的是，在那种呼喊和谩骂及狗叫混合的嘈杂声音里，竟听到了音乐声，一支小乐队正在演奏，听出来了还是“欢迎曲”。在那种场合下听到“欢迎曲”总是怪怪的、不伦不类，当时的感觉就是，那种音乐不属于活人的世界，而是属于死人，再欢乐的曲子也难以愉悦人们正在流血的心灵。

外面的世界令我们陌生，嘈杂的谩骂声令我们晕头转向。周围的人被迅速地赶下了火车。纳粹党卫军们向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的人们高声断喝“滚下来”、“滚下来”。我看到周围的人开始蠕动起来，算了，我还是等他们走完后下车吧。穿着蓝灰色条纹外衣、戴着帽子的一些长相怪异的人在车厢外边跑着，告诉我们把行李放在站台上。当时所有的事情都是紧促的，我们听到的喊声就是“快、快”。我抬起头来看见前面有一扇铁门，铁门上方有一行字——“通过工作获得自由”，我们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了。

第五章

到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

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着急赶我们下车,也不懂“通过工作获得自由”的含义,不懂我们为什么要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更不知道它可怕的历史。

奥斯威辛集中营是1940年4月由纳粹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下令建造的,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修建的200多座集中营中最大的一座,是波兰南部奥斯威辛市附近40多座集中营的总称。集中营在距波兰首都华沙300多公里的奥斯威辛镇,波兰语的原地名在德语中读作“奥斯威辛”,大约有1.3万波兰居民住在那里。它原为波军的一座旧兵营,附近有



▲ “死亡工厂”——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

维也纳通往华沙的铁路。德国纳粹之所以选中奥斯维辛作为屠杀场,是由于那里交通便利,又地处偏僻,易于保密。二战期间,有110万人在那里被德国纳粹杀害,因而它又被称为“死亡工厂”。

1940年4月,正在达豪集中营任职的党卫军上尉鲁道夫·霍斯^[1],因工作成绩“显著”,被希姆莱提升

[1]鲁道夫·弗朗茨·霍斯:首要纳粹乙级战犯之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头号刽子手,一个草菅人命的职业屠户。他的重大罪行之一是参与了奥斯威辛集中营1944年夏季对近4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1947年4月2日,华沙人民法庭判处霍斯死刑;4月15日,霍斯被波兰法警押解到原奥斯威辛集中营内专门为他设立的绞架上送他去见上帝。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为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奥斯威辛有一个奇怪的环境，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到了极点：春秋两季连日里刮着大风；夏天浓雾弥漫，酷暑难当；冬天严寒刺骨，滴水成冰，气温低到零下20多度。

我不清楚可怕的命运在等着我，我们把行李放在站台上，看到穿着条纹囚服的囚犯将我们的行李收走，放在一个四轮的小推车上。我后来才知道那些囚犯被称为“加拿大人”，“加拿大”是35个仓库的绰号，装满了德国纳粹从全欧洲偷盗、抢劫的犹太人的财产。任何东西只要德国人有用，都被特别队搜走，那里有衣服、眼镜、女人的假发、人工假肢、旅行袋、鞋甚至牙膏。在纳粹党卫军撤离期间，他们仅来得及烧毁29个仓库，共有35万件男人西服，4.4万双鞋，1.4万张地毯和其他物品。从搜查到的集中营文件中可以看出，从1944年12月1日到1945年1月14日，仅从奥斯威辛送往德国的就有9.2万套儿童服装，19万件女人衣服，22万件男人衣服。这些衣服和其他物品都送给了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救济组织”或各个市的市长，再分发给国内的居民。居民们虽然十分清楚那些物品的来路，但仍然照样使用。我们这些“有用”的生命，作为德国工业指定的产品，用来维持第三帝国的生存。德国的一些公司如布纳橡胶公司、伊·格·法本化学公司、西门子公司、席森公司、赫希斯特化学工业公司靠榨取犹太人的奴隶般的劳动养肥了自己。

从车站的站台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营房，它更像一个杂草丛生的狗窝，里边囚禁着活生生的犹太人。我能看到的只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部分——奥斯威辛2号营，官方称呼是“比克瑙”，世人也称“奥斯威辛死亡营”或“奥斯威辛-比克瑙死亡营”。其主要功能是在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它还先后扩大为B1营、B2营等。最早建立的集中营还在两公里以外。奥斯威辛3号营，亦称“莫诺维茨”，在更远的地方，有从事建筑和生产人造橡胶和汽油的大型企业。

德国人命令我们一分为二，排成两队，男的站一队，女的站一队。其他带着孩子的妇女、老年人、体弱多病的人站成另外一队。德国人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检查。由于家庭从此就要分开，哭声、喊声震

耳欲聋。我们疲倦不堪、又饿又渴，但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必须像傻瓜一样执行他们的命令，我和母亲站在一队等待着我们下一步的命运。

我在站台上向前看，看到两个女囚犯穿着皮夹克和皮靴，她们的胳膊上写着“卡波”^[2]几个字。我看见她们中的一个正挥舞着皮鞭抽打新来的囚犯，警告她们快一点。看见这个女孩，我屏住了呼吸，我认识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埃塔，是姐姐朱迪思的同班同学，1942年3月她和姐姐一起被抓走的。

见到她，我无法掩饰内心的情绪，大喊了一句：“埃塔，你在干什么？”然后就冲了过去。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她停了下来，转过头看着我，认出了我。她对我说：“我已经不是人了，我是一个野兽。”她说自己是野兽一点都不假，“卡波”们张着血盆大口像狗样爬在德国纳粹脚旁。后来，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我再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几个月之后，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我又见到了她。

我们和埃塔在集中营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囚犯，受制于党卫军，不过我们是德国纳粹的奴隶，是任德国纳粹任意宰割的奴隶，或者宽泛点说我们是保持着精神上相对自由的奴隶；可埃塔甘心受党卫军驱使，助纣为虐，是德国纳粹主子的奴才。由此看来，奴隶和奴才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我还见到了另外一位来自布拉迪斯拉发的同乡，战争爆发前是一家饭店的老板娘，名叫费瑟尔。费瑟尔夫人认出了我的母亲，她走过来凑近母亲的耳朵，用很低的声音说：“罗斯博格太太，听仔细了，一定把我的话记住，切不可把表面现象当作善意，在党卫军面前不要自愿做任何事情。”她告诫我们的神情和表情，对待党卫军的态度就如同躲避瘟

[2]卡波：即囚犯工头，是卖力地干活，同时又能模范遵守集中营各项纪律甚至甘心充当纳粹分子走狗的囚犯。一旦获得政治部的认可，给他们戴上黄色臂章，他们立刻就获得监督、拷打、折磨甚至杀害其他囚犯的特权。

疫一般。对于她的话母亲牢牢地记住了。然后，她变戏法似的把手中的一截胡萝卜给了母亲，“记住这不是胡萝卜，这是金条。”对于费瑟尔夫人，我们一直感激着，记得妈妈说过，对别人的帮助都要心存感激，何况那不是点滴的恩惠。

在队伍中，我看见几个男女囚犯衣衫褴褛，可怕地虚弱，费力地推着两轮小推车。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捡起地上的垃圾。他们车上的东



▲纳粹党卫兵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站台上将囚犯分类

西十分沉重，小车一直推向焚尸炉，不远处可以看到烟囱，只见那烟囱窜动着火舌，幽黑色的烟夹带着紫色的火焰从中飘出，人们可以闻到可怕的尸臭，那是死亡和污秽的气息。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感觉到集中营腐烂发臭的味道污染着整个天空。

在站台上等待的还有很多党卫军士兵，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军服，脚踏锃光明亮的军靴。其中有一个人端坐在桌子后面，他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年轻人，桃花般的面颊，穿戴十分整洁。他的靴子保养得格外好，还戴着一副皮手套。后来才知道那个漂亮的年轻人是一个残忍的虐待狂，热衷于对儿童和其他囚犯进行各种医学实验，他就是有“死亡天使”之称的约瑟夫·门格尔^[3]博士。

门格尔出身于德国一个富裕的工厂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获得过法兰克福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的两个博士学位。接触过门格尔的人说，他仪表堂堂，专业精湛，作风严谨，智力超人，极具涵养，是“高度文明”之人，最难忘的是他待人接物的迷人和优雅。

[3]约瑟夫·门格尔：奥斯威辛集中营“死亡医生”，被指控应对集中营数十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战争结束后，欠下40万条人命的门格尔一直没有受到战犯法庭的审判，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同样也是这个人，30出头时就担任奥斯威辛死亡营的主任医师，人虽然年轻，却已有了“死亡天使”的恶名。残忍嗜血是他的本性，每一个细胞都渴望暴力。他丧尽天良，人性泯灭，从那颗漂亮的头颅里迸出许多拿人做实验的罪恶招数，双眼中放射出刻骨的仇恨和歹毒，看起来叫人心惊胆战。

白衣天使沦为屠夫，竟比魔鬼还要恶毒三分。他是替阎王掌握生死簿的恶魔，每当列车开来，他就站在旁边，一眼决定谁身强力壮去卖苦力，谁体弱多病马上送进毒气室。被他屠杀的犹太人多得不计其数，那个漂亮的男人是那群白衣死神中最臭名昭著的恶魔。

我和一些疲惫不堪、手足无措的妇女站在一个队里，后面就是我的二婶和她的女儿露丝。父亲和奶奶及我的姑姑们以及她们的孩子站在另外一队，父亲不时地鼓励着他们。突然，他们那支队伍被带走了，亲人之间没有时间说上一句话，连一声“再见”都没来得及说，他们转眼就消失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被领进了毒气室，惨遭杀害。从此以后，我失去了父亲，失去了父爱。

接着，发生了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随着我们靠近门格尔的桌子，他从嘴里吐出几个字：“把身上所有的衣服脱掉，扔掉你们手中的行李。”看我们没有回应，他又清了清嗓子，提高声调说：“快一点！”门格尔将攥着的手重重地砸向桌子，那是不耐烦的信号，表示他决定不再为此浪费唾沫星子了。

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我们一丝不挂，特别是在党卫军士兵面前？我们面面相觑，但是，却没人敢说“不”字，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执行命令，脱掉身上的衣服。

党卫军士兵斜着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看来这样的场面他们经历多了。我们站成一队，脱光衣服，走向门格尔。他上下打量着，认为谁身材苗条、谁年轻、谁健康，就站在右边的队伍；其他被认为不好的，比如年龄太小、太老、太胖，也许身上有一处伤疤或其他引起门格尔不高兴的人，就被命令站在左边的队伍里。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大家很快地认识到站在右边的队伍比站在左边的队伍要好一些。我接近了那张桌子，门格尔像一个屠夫检查猪肉一样上下打量着，挥挥手让我站在右边。我站在了那支“得救”的队伍之中。母亲也忍受了同样的“检查”，也被送到了我这个队中。我当时17岁，母亲39岁，我们都通过了到达奥斯威辛后的第一次“筛选”。

二叔的女儿露丝当时只有16岁，也被筛选到我们的队伍中。然后轮到二婶站在门格尔面前，她以前的腹部作过手术，有一处伤疤，被门格尔挑到左侧的队伍里。她预感到了什么，立刻嚎啕大哭，和露丝挥泪告别。露丝马上跑回到门格尔桌前，站在他面前恳求：“让我母亲和我在一起吧！”门格尔猛然站了起来，抓住露丝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但把二婶推回到我们队里。幸哉幸哉。二婶笑了，可眼里的泪水还没有干。

那地方只能顺从，不能反抗，只能忍耐，不能抗争。露丝的举动在队伍中引起了轰动，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勇气，可能是由于母爱的激励。她的胆量和勇气惊天地泣鬼神。命运需要巧合和运气，实际上求神不如求己！她对母亲的爱和勇敢挽救了她母亲的生命，她们两位以及二叔大卫、二叔的二女儿玛赛尔后来都幸运地活下来，全家人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这似乎是个奇迹！

“筛选”工作结束后，门格尔开始决定我们的命运了。靠左侧的队伍朝着另一个方向列队走向毒气室，毒气室外表看起来像个浴室，里面装着莲蓬头，然而那里流出的不是生命之源的水，而是窒息生命的毒气——齐克隆。屠杀者用洗澡的谎言把囚犯们骗入“浴室”后，管理人员立即封闭毒气室，然后将毒气放入，几分钟后，犯人就全部死亡。紧挨毒气室的是焚尸炉，尸体马上被扔到焚尸炉里焚烧。刽子手们称那段路为“天堂之路”。



▲集中营的焚尸炉

德国纳粹计算过，男人走完它需8到10分钟，女人的时间长些，要15分钟，因为她们得在死前留下自己的头发。

我们右侧的队伍走进了离火车道不远的一个巨大的大棚。党卫军的士兵又命令我们站好队，又让我们毛骨悚然了一回，这一次要把我们的毛发剃光。卡波们向我们发出指令，抽打着那些行动缓慢的人。剃光要比站在门格尔等党卫军面前脱光衣服更没有人性，德国人说剃光主要是为了除去虱子。我不明白“为什么要除去虱子”，我们是干净的，我们是有教养的和受过教育的人！

所有活着的囚犯都要除虱子，剃光头。德国人很少和我们直接接触，直接和我们接触的是比我们早到奥斯威辛的老囚犯。他们之间的谈话都用波兰语，但我也能听到有些人讲斯洛伐克语和德语。我和母亲、二婶、露丝光着身子等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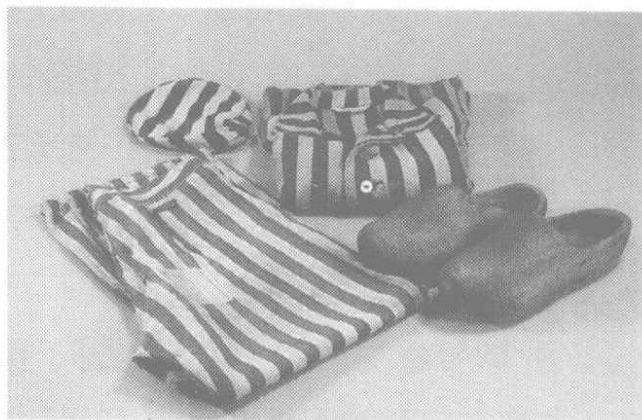
给我们剃发的妇女咧着嘴，拿着极钝的剃刀把我披肩的头发剃掉，接下来让我举起双臂把腋窝剃干净，然后把阴毛剃下来。我当时只能紧闭双眼，听任她摆布，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切会很快就过去的。那把剃刀太钝了，被剃过的地方都渗出血来。接下来我还得站在囚犯面前，手里端着桶，她们用特脏的麻布蘸着石炭酸盐水给我上下擦洗，先是头，然后是双肩，再洗两条腿。我的头因为剃破了，蘸上水清洗时格外的疼。当时我终于清洁了，消毒了，虱子除净了。

我出去找母亲，喊着她的名字。站在面前的一个人答应着，我根本就认不出她了，其实整个过程母亲就一直站在我身旁。母亲曾经拥有美丽、浓密的黑发当时变成了一个秃头，可怕的形象简直惨不忍睹。那赤身裸体的模样多么凄凉，我已经无法再像以前公主般优雅。看着自己滑稽的形象，我们忍不住苦笑了一下。我们的人格与尊严，早被摧毁殆尽。

在集中营这个野蛮的屠宰场，当死亡变得像邻居一样，令你别无选择地与之长相厮守，其背后的哲学意念为：人们要生存就必须面对这一客观事实。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耻感甚至残忍、冷漠等已经失去了主体与对象。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党卫军的命令又来了，要我们站成另外一队，排着队领取囚服。在我们面前是一堆破旧的囚服，一位女囚犯负责发放。没有时间找适合自己的衣服，我看了看扔在我面前的衣服，是一件黑色的粗毛纺的麻袋片似的裙子和一件粗质料的上衣，已经千疮百孔，也许过去是一件好衣服，当时我只能穿上它遮挡我赤裸的身体。



▲ 发给囚犯的囚衣和木头鞋

我们没有内衣，给我的一双鞋是不同的两只：一只平跟的很小，另一只高跟的很大。

后来那双鞋被一双木鞋所代

替，但也十分松大。在奥斯威辛如果没有鞋穿，估计也活不长。我的母亲也有和我相同的窘境，她的衣服也不合身。

下一步就是在囚犯身上打印号码。一个囚犯从我的后背到左胸漆上号码。后来很多囚犯是烙上号码，一些人烙在胳膊的内侧，另一些人烙在胳膊的外侧。尽管我也是奥斯威辛的囚犯，却没有被烙上号码，因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囚犯被送到奥斯威辛，党卫军没有时间为每一位囚犯烙上号码。年轻的囚犯不需要烙号码，可能是因为他们集中在集中营里“活”不了多久，德国人考虑那是浪费，不值得。

登记造册的工作完成之后，我们来到囚室区。哪个囚室我记不准了，我想我们是住在“B营”。囚室区太大了，像个巨大的飞机棚，一个挨着一个排成了几排。囚室大都是用有波纹的铁皮外加木板制成的，用“狗窝”来形容它们似乎更准确一些。囚室内随便什么地方都有床，叠放成三层，每层铺上肮脏的稻草，四个女囚居住在一个很狭窄极不舒服的床里，晚上在这里睡觉十分难受。每两排床中间竖立起一个台子，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囚室区。台子是用红砖砌成的，刷上了白漆。我不知道这个台子代表着什么、是干什么用的，只见“卡波”或“斯杜布娃”（囚室长们）站在上面对囚犯们发号施令。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遭受由于所谓的“节食”（实际上是吃不饱或食物不干净）引起肠胃问题。其结果是厕所脏乱不堪，粪便横流。厕所在每个囚室区都是独立的，是在木制的椅子上挖出来一个个小洞。里面的味道实在受不了，我第一次进去差一点儿要呕吐，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使用这种厕所。当然，有些囚犯由于身体太弱，无法挣扎着走进厕所，只好在自己住的床上就地解决，造成囚室内臭气熏天。那是纳粹最愿意看到的，那种脏乱的卫生状况也是纳粹灭绝犹太人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营房的入口处有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床是用毯子罩着的，那是囚室长斯杜布娃的“私人房间”。斯杜布娃负责看管囚室区的所有囚犯，每天早晨四点和下午五点，斯杜布娃站在那里大声呼喊我们出去点名，那是令所有囚犯十分恐怖的程序。囚室区外面的营区内有一条街，那条街十分肮脏，还有许多污水。

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烈日严寒，囚犯们在每天做工前和收工后都必须在操场上一动不动地站立几个小时，等候清点或安排劳动。党卫军士兵将机枪架在塔楼上，居高临下监视着囚犯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毫不掩饰地对我们交底：在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下，“犹太人最多可以活一个月，其他人最多可以活三个月。你们想离开这个地方，那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焚尸场的大烟囱中飞上天”。我们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垂首而立，接受点名和训话，直到党卫军心满意足为止。有时人们由于疲劳过度摔倒在地，点名还得继续；有时人死了，也得拖出来接受点名，直到对上人数。党卫军点名主要是检查是否有囚犯逃跑。由于人很多，点名的时候要所有的犯人都集中在大操场上。如果总数不对，就要重新点一次。

点名人数对上了，令党卫军满意了，才开始分发食物。集中营的食物不但跟我们的视觉过不去，更跟我们的胃口过不去：早晨我们能得到用菊苣（一种植物，根部可做咖啡）做的类似于咖啡的一碗汤，实际上是一碗黑水，还有一小片军用面包；晚上给我们的还是一碗汤，那所谓的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汤，实际上是一碗温水，有时能在里面发现沙子、石子、草根；如果运气好的话，汤里面有时能发现一片萝卜皮、一片土豆。汤喝过不久，一泡尿排出后，肚子照旧饿得咕呱乱叫，饥饿难耐。

汤是盛在囚牢区门前的几口大锅里。当排队取汤时，十分有必要在队中选择一个恰当的位置。如果你着急跑在队伍的头几名，你能得到一碗混浊的热水，如果你动作太慢了，排在队伍的最后一名，可能什么都不剩了，就得忍受饥饿。最好的位置就是在队伍的中间，锅里还有足够的汤，仍有余温，还有点稠，你可能有机会得到汤中的一些固体食物。我很快就掌握了其中的秘诀，实际上那是一个关系到“生存”与“死亡”的问题，这个令哈姆雷特王子徘徊不已的质疑可以将就在那里。有人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生与死，但如果你进了纳粹的集中营，世界上最近的距离就是生与死！

直到战争结束，我才了解到食物中有许多至毒的东西，所谓的“咖啡”和汤充满了溴化物。由于食用了溴化物，当时妇女们的月经基本上都停止了。不过对我们妇女也是好事，当时的集中营根本没有妇女卫生用品。女囚犯的生理功能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即使从集中营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她们的月经也没有正常过，我也是如此。

希特勒上台后，迫害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非雅利安人，要建立所谓的欧洲新秩序。当时的欧洲阴霾笼罩，血雨腥风。纳粹当局到处逮捕政治犯，致使监狱暴满，仅一个月，在普鲁士就有1.5万人被捕，监狱里无法容纳那么多的人。时任慕尼黑警察局长的希姆莱想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建立集中营。

纳粹分子所建的集中营不但类型繁多，涉及地区之广也堪称世界之最。那些魔窟每天都在吞噬着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国家的无辜平民，甚至连天真无邪的儿童也不放过。即使暂时没有杀害犹太人，在那里也并不意味着生命有了保证。其实，纳粹分子只是出于劳动力紧缺，暂时留下少数青壮年不杀，仅仅为了完成某些紧急任务，一旦完工，那些人的死期就会来临。

遍布德国境内和占领区的各种类型、大大小小的集中营是德国纳粹用以实施暴行的重要工具之一。海德里希派人严密监视集中营，在营内设立了政治部，开始干预集中营事务。政治部的成员都是秘密警察或刑事警察官员，他们负责审讯囚犯，记下营里发生的所有事件和保管囚犯档案。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波兰的奥斯威辛、玛伊达奈克、斯图特霍夫、格罗斯-罗森等大型集中营以及在德国本土的布痕瓦尔特、拉芬斯布吕克、达豪、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也都辟出专地作为灭绝营，大量杀戮犹太人。

当我们在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时，我并没有被选去做工，母亲也没有，我们都没有被烙上号码。成千上万的人还在陆续来到集中营，也许德国纳粹是没有时间处理我们。他们要把新来的人“处理”掉，主要的精力都在毒气室，不分白天黑夜地抓紧屠杀。

那年的冬天，天气出奇的寒冷，是欧洲历史上最寒冷的冬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其他的囚犯一样，变得冷漠，对一切事物都不感兴趣。如果有人提醒说，当天是犹太新年^[4]或者是赎罪日^[5]——犹太人最神圣的节日，我们也没有反应。我们的感觉已经死了，如果还有感觉，可能会惹大麻烦。眼前发生的一切本来就使我们难以忍受，最好的状态就是不要有任何的感觉，就是为了第二天还活着。

奥斯威辛还有一些非犹太人囚犯，德国纳粹用带有颜色的三角标志为囚犯划分类别：犹太人为黄色、政治犯为红色、同性恋^[6]为粉色、耶和华见证人^[7]为紫色、刑事犯为绿色、妓女与“自闭症患者^[8]”为黑

[4]犹太新年：犹太历一年的开始，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犹太人这一天一般是到教堂参加宗教仪式，并吹响羊角号（其意是与上帝通话）。

[5]赎罪日：即斋戒日，在新年后的第十天。它是一年中最神圣的日子，那天忏悔之门将向所有人打开。

[6]同性恋：第一批被纳粹逮捕的同性恋者于1933年秋被送入集中营。在此后的12年内，估计有1万至1.5万名同性恋者被关入各地的集中营。在所有囚犯中，同性恋者和犹太人的等级最低，所受的虐待也最为严重。他们不仅经常被派以重活，而且死亡率也最高。

从
奥
斯
威
辛
集
中
营
到
澳
大
利
亚

色、流亡者为蓝色、吉普赛人^[9]为棕色。

天气很快就冷了，晚上还有霜冻，我们的衣服无法御寒，剃光的头感觉十分寒冷，两只脚长了水疱，疼痛难忍。我的牙床出血，特别疼。面对恶劣的气候，死神到处向人们招手，疟疾、伤寒、痢疾以及其他疾病无情地折磨着骨瘦如柴的囚犯们。与害怕和恐惧相比那些都是小问题，最令人恐怖的是党卫军士兵随时会在营中出现。

一天，一群党卫军士兵冲进营中，强行抓走20名妇女，以后再也没有见到那些妇女。她们被带到门格尔的实验室，由门格尔对她们进行各种实验。“死亡天使”门格尔的理论是：“人和狗一样，都有谱系，有人在实验室里培养出了良种犬，我也能在里面培养出优良人种来。”

门格尔的业余爱好是骑着脚踏车在灭绝营里闲逛和寻找“实验品”，碰见合适的就带走，用不着考虑囚犯们的意愿，说验就验、说抽就抽，和对待牲畜别无二致。他用活人做人体解剖实验，而且连麻药也不打。他曾亲自冲到毒气室“抢救”出几个犹太侏儒，给他们打各种针剂，看他们能不能快速长高。他拔下侏儒的牙齿与正常人的牙齿进行比较；他还让他们脱光衣服，在请来的党卫军军官面前当展品。

他还在吉普赛孩子们的黑眼睛里注射药水，以便让它们变成蓝眼睛。门格尔决定用自己的方法创造蓝眼睛、棕色头发、漂亮皮肤的雅利安人种。有时候，他把人的臀部用锯子锯成两半，然后再缝起来；有时候他命令士兵开枪把人的四肢打断，以试验身体的自我痊愈能力。其他

[7]耶和華見證人：一個信仰基督教的組織。因二戰時拒絕應征入伍，有6000位耶和華見證人的成員被囚禁在集中營和監獄里。就當時的集中營囚犯來說，耶和華見證人的成員占了總數的5%至10%。

[8]自閉症：是人的一種發展性的殘障，其主要症狀表現為人际關係的隔離、語言的困難及行為障礙等，並往往伴有多動症。自閉症患者一方面智力落后，另一方面存在社會交往、溝通等方面的嚴重障礙，又常常伴有異常的行為與興趣。

[9]吉卜賽人：也叫茨岡人。滅絕吉卜賽人的行動是德國納粹黨綱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37年冬和1938年納粹當局大規模逮捕吉卜賽人，許多吉卜賽人被秘密處死。1941年德國警察局成立了行刑隊，滅絕吉卜賽人的行動達到高峰，納粹分子時常使用慘絕人寰的集體屠殺手段。

令人发指的暴行还包括往心脏里打针以及阉割男人等。还有一种由门格尔发明的取乐方法，就是由党卫军的狙击手在他的实验室里射击他的“病人”的乳头，他的很多“猎物”被折磨致死。看到或听到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行，对人的神经系统是巨大的考验。

后来，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一直奇怪：党卫军士兵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们的脑浆无动于衷？他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苦苦哀求不要杀她的孩子置之不理？其实，奥斯威辛集中营与德国纳粹的存在就是以杀人为目的的。屠杀和死亡在那里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已经使死亡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意外的不幸和极限的来临，而是一个日常现象和“研究”所需。

苦难可以摧垮意志，也可以磨练意志。面对纳粹的暴行，没有人敢反抗，所有的囚犯都在默默忍受着。在集中营里，生死无常，确实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在看似不能没膝的沼泽中，深藏灭顶的灾难。不过，人可以左右自己的是在灾难面前具有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

饥饿和杀戮充斥着整个集中营。有时党卫军变换另一种杀人方法，拿来一杯牛奶，还煞有介事假惺惺地撺掇：“有没有人愿意喝？”在那种环境下，很少有人能免于诱惑，由于早已忍受不住饥饿的折磨，人们在决定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的时候，往往变得不假思索。尽管囚犯们对党卫军心怀戒备，但经细细过目，未见牛奶里有什么特别之物，便自欺欺人地认为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在饥饿面前，很多人动了心，将牛奶喝了下去。那些喝过牛奶的人，不久就莫名其妙地死了。如果你没学会用自己的理智去剥掉诱惑的伪装，浑然不用心机，就可能会被党卫军的花言巧语所左右，就会倒大霉。

党卫军骗囚犯一骗一个准，但他只能骗一次，囚犯们很快就识破了他们的真实嘴脸。诱惑是一付毒药，谁肯次次品尝？党卫军的伎俩只会加剧我们对他们的憎恶，每根神经都理智地抵抗着，宁可饿着，也不上当，更不找死。我们的心智、心机已经成熟，越来越相信党卫军个个都是混蛋，听起来振振有词的诱惑都是他们捉弄、屠杀我们的伎俩。其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实，小到个人的生命，大到社会群体，都要在乎心智、心机的培养。

德国党卫军还曾经在集中营做过这样的实验：两个囚犯相距一米远面对面地站着，党卫军把其中一个人的双眼蒙上，并在他的右手边放上一个水桶，然后用一把利刃割断他的右腕动脉，让血滴答滴答地滴到水桶里。另一个人就那样看着同伴因失血脸色越来越苍白，直到死去。

第二天，同样的地方，同样两人相对。这次被割的是昨天幸存的那个囚犯。仍是那个水桶、那把利刃，但德国党卫军这次却是用刀背假装割了他一下，虽有痛感，但连皮都没破。随后就用水滴模仿血滴滴入水桶。党卫军发现，他的脸色竟如昨天那个失血者一样越来越苍白，呼吸越来越急促，虽然他连一滴血也没有流，最后也死去了。强烈的恐惧感也会毁灭掉一个人的生命！绝望、恐惧、空虚、无助，那样复杂的情感和痛苦让囚犯们难以忍受。

生存与死亡有时是一瞬间的事，有时又是一个时期的较量。每当党卫军进入囚牢区时，我母亲都用身体遮挡着我，当时我已经17岁了，已经符合门格尔实验室作为实验品的年龄了。不过母亲的动作也极容易将自己暴露在党卫军面前。可在危险面前，她根本不需要选择，因为那瞬间的动作源自母爱的本能。由于母亲的掩护，我没有被发现过，也没有引起人的关注，费瑟尔太太当初的忠告经常在我们的脑海中回响。

当一连串不寻常的预感如闪电般出现在脑海之中，接连而来的，就是无休止的恐惧。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使人进入一种非同寻常的恐怖状态。我经常双手发颤，两眼发直，青筋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女囚犯

蹦跳，眼神凄切悲伤，绝望一直笼罩心头。在那种状态下，人的各种想法在脑袋里发生了大错位。那种恐慌，我不止一次碰到过：遇到党卫军来抓我，冷不丁朝一个漆黑无底的深洞掉下去，当我冲什么人高声怒吼或者大声求救时，突然发不出声

音来，只能干着急，在一身冷汗和怦怦心跳中醒来，一片茫然，无着无落——噩梦，令人胆战心惊。

我们在奥斯威辛度过了几个月，生活在不计其数的恐惧和持续不断的危险之中。突然有了一个变化，在一天的早点名之后，我们被告知不返回营房。一股凉气从我的脊背上冒出，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什麼，但肯定不是好事。大家步行到一个宽广的空场上，从那里等待着进一步选择。门格尔来了，“观察”着我们，从我们当中筛选了许多人参加体力劳动。其余的人没有解散，只能原地待命，等待着进一步的指示，一等就是多半天。夜幕降临了，我们仍然站在那里等候，我们感觉在那里已经等候几天了。时不时还有一些衣衫褴褛、表情痛苦的囚犯加入我们的队伍。没人给我们饭吃，很多人坚持不住了，倒在地上。我靠在母亲的膝盖上睡着了，我们还在广场里等着。

过一会儿，我被熟悉的大喊声惊醒，男女党卫军连同牢头命令我们站在队里，清点人数，然后要求队伍向前行进。当时我已经不关心去哪儿了。我和其他人走在后面，母亲守在我身旁。我看见身边有很多高高的高压电网、铁蒺藜。经常有些失去生活信念的人触电网自杀，我就亲眼看见过一位女囚犯的尸体悬挂在电网上，她双手无力地垂下来，张大的嘴巴似乎是在痛苦地呼喊，微微睁开的双眼充满了极度的恐惧。那情景所展示的集中营给人类带来的肉体痛苦与精神恐惧深深印入我的脑海之中，半个世纪过去了，那场面仍然历历在目。

久而久之，我发现生活是不可能改变了，违背那个规律如同是跟风车打架，于是就只能改变我们自己了！在那里你想死没人拦你，可是你若活下去，却得使出全身的解数。正因为人要面对现实，人才之所以为人。我深知，遭遇大难必须不畏不惧，求生的欲望一旦丧失，就会摧毁正常人拥有的理性和意志，使正常状态下的观念模式和行为规范失效，使人麻木不仁，不以死亡为意，不以生命为念。不过，了却自己的生命只是你从世界消失的最笨的办法，毕竟，“一了百了”仅是一句感慨。我时常自己问自己：死亡难道比生存更令人留恋吗？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我们到达营房外的站台上，等候我们的一台老式火车头正喷着粗气，后面是装牲口的车厢，我们十分熟悉那些车厢。我们一行人数不多，所以只有几节车厢。当我们这些人类货物装入车厢后，火车徐徐地开动了。

每个人只分得一片面包和一块人造黄油。坐在封闭的火车上，感到火车在喷着气，一蹶一蹶地向前冲。由于火车的颠簸，我们在车厢里乱晃，人都晃晕了，十分疲倦，体力和精力消耗过大。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精神并没有完全被击毁，尽管我们心里大惑不解，不知道火车要把我们送往何方。既然能从“死亡工厂”奥斯威辛活着出来，还有什么地方不敢去——至少我是那样想的。

我们路过了许多城镇和村庄，由于火车一闪而过，那些地方的名字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一条冰封的河流忽左忽右始终伴随着疾驶的火车。天上飘着雪花，地面白茫茫的一片，只剩下两条黑色的铁轨在不断地向后移去。一阵雪花飞过，那细细的痕迹又被雪埋得不见一丝踪影了。雪，应该是某种事物终结的象征吧？

除了隆隆作响的车轮声，世界是宁静的。然而，我清醒地意识到火车离开了波兰，好像来到了德国的什么地方。最后火车停了，我们从车上下来，又站成一排。队伍排列得十分整齐，数了一下人数，100组来自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女囚犯，共1000人。

那是一个早冬的拂晓，天气十分寒冷。我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了，我们到了德国的一个火车站上。从那个小火车站的建筑上，可以看到那个地方的名字——特拉西贝格，时间是1944年10月下旬。

第六章

到库尔茨巴赫集中营

由荷枪实弹的党卫军士兵押送着，我们朝着市里走去。党卫军命令我们去浴室洗个淋浴。那是不能再坏的消息了，我们听到后惊慌失措。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出来的人都知道“浴池”这个词在纳粹的词典里就意味着“毒气室”，当时虽然换了一个地方，但我们也清楚我们将被毒死，可是我们不敢反抗，只得服从命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吃惊地发现，那座灰色、旧式的小楼，还真是一个浴池。

我们进入一个巨大的房间，看见砖铺的地，淋浴喷头整齐地悬挂在满是锈迹的管子上，那情景使我们有了“放心的感觉”，那是一个真正的浴室，而不是德国人的阴谋。我们把自己身上破旧的衣服脱掉，在他们的引导下来到淋浴的喷头底下，然后等着。突然，感觉到了奢侈的水，此时此刻，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温水的滋润，一寸一寸地沁透了我的肌肤，那时我才想起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水在奔流了。

几个月来，我是第一次将自己清洗一番，甚至萌发了一种自己还是个人的感觉。好景不长，我们立马又回到冰冷的现实中来，在我们被允许穿衣服之前，他们将一条黄漆从我们的头颅涂到脊梁上，那是囚犯的标志。当时天气比较寒冷，我们冻得颤抖，但我们觉得自己干净了。我的双脚冻伤了，由于穿着过于肥大的木鞋，脚在里面左右晃动，脚上的水疱疼痛不断地折磨着我。我不断地问自己：“灾难已经持续这么久了，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新来的囚犯都必须洗淋浴，因此当他们脱下衣服后，纳粹卫兵就从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囚犯的衣服里找出一些缝在布内的钱或珠宝等物。接着牢房头们进行第二轮搜刮，而且也往往会有所获得，他们将获取的钱财换回面包和香烟。

每个囚犯都分到一个轻而薄的毯子，那是人工纤维织成的，并不保暖，但它还可以遮挡一下我们可怕的、瘦骨嶙峋的身体。我们把它裹在自己身上，一些妇女还独出心裁地利用毯子改制成新款衣服，人从一侧钻进去，用一条带子在中间系住，看起来更像“和服”。

我们又继续行进了，去开始我们痛苦生活的又一章。没有人通知我们下一个终点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同外界没有一点联系。没有一个德国人给我们提供一丝信息，他们在扼杀我们生命的意志。即使是那样，我们也没有被灾难彻底击败。恶劣的生存条件并没有扼杀大家的理想，我们这些充满理想的囚犯，都有着不屈不挠的个性。那时我们经常使用的词汇就是“战争结束时，我们将这样或那样”，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之中只有很少的人能活到战争结束，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当我们离开特拉西贝格时，天上下雪了，房顶马上变白了，树枝也裹上了银装，周围的景色变得十分迷人，可是路上十分泥泞。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在泥泞的路上走了十多公里，到达目的地时，已经筋疲力尽了。

我们到达了一个小村庄，叫库尔茨巴赫。在那里我只待了几个月，可那段日子我至今难忘。那里看起来十分荒凉，有一些低矮的新建草仓。公路旁有一处很大的、十分漂亮的房子。穿过公路是一大片由稻草建成的仓库，又长又高，上面扣着个圆屋顶，看起来既像一个巨大的飞机棚，又像蜂箱。那就是我们下一个苦难的栖身处。进入屋内，常年不见阳光，阴冷而又潮湿。一排挨着一排，摆满了上、中、下铺三层木床，我们对此十分熟悉，奥斯威辛集中营也是那样的“床”。因为没有梯子，从下铺爬到上铺十分费劲，但对年轻的囚犯来说这倒不是什么难事，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爬上爬下，所以我就住在上铺，母亲住在下铺。

每一位囚犯发了一个“睡袋”。那是一个棕色的纸袋子，它可以帮我们御寒，因为我们发的毯子很薄。但是我们居住的床十分狭窄，如果我们要钻进睡袋必须把它的一侧撕开，时间不长，我的睡袋就成了碎片了，其他人的也是如此。后来我们就把睡袋裹在身上，或者剪下一块垫在鞋里。

囚室内上铺的床在冬天是最好的地方，要比下铺暖和。但对我来说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可以保护母亲免受另外一种折磨。晚上有人起夜，很多人感觉起夜十分不便，因为身体很虚弱，有些人虚弱得不能及时站立起来，她们很多人的大小便就在上铺解决了，屎尿滴滴答答地流下来，下床的囚犯要饱受上边囚犯屎尿淋漓之苦。

可是母亲却十分幸运，因为我晚上不需要上茅房。我母亲居住的地方很干净，那是我保护的结果。在那里，上茅房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茅房是在囚房外边一个非常大、非常深的战壕上修建的。在战壕的两侧，两根铁棍连在一起，铁棍只有细树枝那样粗，人蹲下之后，旁边有党卫军士兵站岗。大便池上面既没有盖，也没有遮挡的东西，大便完全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在那个天寒地冻的季节，骨瘦如柴的人们有时屁股和铁棍粘在一起，让人感觉特别的疼。有些妇女由于身体特别虚弱，蹲下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了，有人一头栽在粪池里面，从此无声无息，那是一种十分恐怖的死法。

在仓库的另一侧与茅房之间，有一个圆形的用稻草扎成的草仓，那就是所谓的“浴室”。叫“浴室”这个名字实在是开玩笑，因为那里既没有水也没有脸盆，或者其他用以洗澡的设施。应当承认，出于对外宣传以及欺骗国内公众等方面的考虑，“浴室”是集中营要求建立的，德国人是严格遵守规定的。一定是有那么一条规定——每个集中营要设一个浴室，但那个浴室能不能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穿过仓库不远，有一座漂亮的小楼，那就是装修得非常高级的党卫军上校的家。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不适合到前线打仗，被派到后方的集中营。那个个子高高、白头发、修饰得很好的党卫军军官是我们集中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营的指挥官。和所有的党卫军一样，他非常认真地执行着第三帝国铲除“敌人”的任务，而我们这些可怜的、受尽凌辱和饥饿的犹太妇女就是他们看守着的敌人。

我们每天清晨都可以见到他，他准时来参加我们的早点名。一开始他说明集中营的作息规定，我听了听，无非是什么早操啊，不准擅自离开自己的房间啊。后来每天都说三句话，在党卫军向他报告情况后，他接着训话，第一句话是他的开头语：“我上帝的孩子！”第二句是不辞劳苦地提醒我们一个“真理”：“就我而言，你们都不值得我吐唾沫。”最后一句他最乐此不疲，“你们是在我们的怜悯之下才来这里干活的。”每个停顿处他顺势发出感叹，“你们已经被完全抛弃了。”我认为指挥官还可以加上一条：“通过工作获得自由”，但是指挥官讲完“你们已经被完全抛弃了”便打住了。在诸如此类的“高论”里，没有一句人话。

两个女党卫军士兵轮换看管我们，和她们的男性同僚一样，她们也无比残忍凶暴。她们穿着女式的党卫军军服，一件灰色的带有斗篷的衣服，手里拿着棍棒，不时地毒打囚犯。很多囚犯被毒打得急剧地抽搐，无力尖叫，只能痛苦地呻吟。听到她们的嚎叫，许多囚犯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党卫军士兵依卡，是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女人，有着乌黑的头发，一双尖锐的蓝眼睛。可她没有善良的心，动辄就处罚人，而且从来没有好脸色，眼神着实吓人。每次点名她都要我们站得笔直，如果有人稍稍弯了下腰，她就会拿棍子狠揍囚犯的脸，很多人因此被打掉了牙齿，那幅惨象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另一个党卫军士兵名叫埃里斯，几乎没有什么教养，她长着淡黄色的头发，一双罗圈腿。她们两个人都残忍无比，无论体力还是社会地位，她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她们那一身军服给了她们毒打、残害我们的权力。她们以此为乐，一次次露出玩女囚犯于自己骨掌之中的得意与满足。

我们到达库尔茨巴赫不久，党卫军指定了一个女斯杜布娃-奥诺巴赫。此人十分严厉，使我想起了一位不受人待见的教师。她是个怨气冲

天的古怪女人，性情反复无常，有事没事就拿我们当出气筒，张开血盆大口冲我们训斥一通。她是乖戾的女魔，我们惹不起也躲不起，至今我还记得那张阴郁的扁脸。她的工作是在两个党卫军依卡和埃里斯白天工作结束后值夜班，继续着党卫军对我们的监管与摧残。

在纳粹当道的年代，数以百万计的德国妇女被希特勒蛊惑人心的说教所迷惑，大约有230多万名德国妇女加入了纳粹党及其所属的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各种各样的法西斯团体；数万名中青年妇女穿上了褐色的党卫军制服，狂呼“哈伊，希特勒”；6000多名女青年充当了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看守，抡起皮鞭和棍棒，对无辜的犹太囚犯大打出手，直至把他们赶进毒气室，那是一种心灵扭曲所释放出来的一种反常行为。数以百计的德国、奥地利女护士，直接投身于T-4^[1]行动，把注射器、灌肠器变成杀害重病病人的凶器。还有近百名凶悍的德国、奥地利少女，直接开枪杀害无辜的犹太居民，成为臭名昭著的特别行动队的一员。

女党卫军是和她们的男同僚一样的野狗，阴险毒辣已不再是男党卫军的专利。她们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与极端扭曲的变态也许只有撒旦狂魔才能消受得起。

那里每天的程序同奥斯威辛大体相同，早晨起来点名，晚上再次点名。我们拖着木鞋站在泥潭和大雪之中，又冷又冻，等待着清点人数。党卫军向我们布置劳动任务，每天很晚才让我们回到牢房。每100名女囚犯组成一个队，



▲ 囚犯等候点名

[1]T-4行动：纳粹大屠杀的前奏和预演，是依靠医疗单位消灭重残病人的计划。由于该计划是在柏林市动物园大街（Strasse Tiengarden）4号的一座别墅中拟订的，为保密起见，该计划的代号简称为“T-4计划”，具体执行该计划的护士被称为“T-4护士”。

我和母亲、二婶及露丝属于同一个队。荷枪实弹的党卫军士兵监督着我们。

我们的一项工作是在早晨分发“食物”，那一般是在点名之前。我们要略为早一些起床，把汤盛在一个大锅里。那汤是我们白天的主要食物，下一顿汤要等到12小时以后的晚上。然后，我们要排着队，走10公里的路到一处茂密的松林里干活，我们旁边有武装的党卫军和他们的狼狗看管，修饰整齐的德国牧羊犬和黑色丑陋的德国短毛猎犬露着整齐的白牙怒视着我们，一有命令，那些恶狗就能冲出去把活人撕成碎片。党卫军不时地挥舞着皮鞭，皮鞭在我们的头上忽忽作响，他们不断地高喊：“快、快、快。”天呀！那声音跟狗叫如出一辙。

大雪到处都是，地上的积雪被踩得咯吱咯吱的响，我们在雪中跋涉，沿着小路到达我们干活的场地。森林是茂密的，小路蜿蜒其中，沿途偶尔可以发现树上有几只你根本不认识的鸟儿，被雪水淋透；在枝桠间，大鸟悄无声息地为小鸟梳理着羽毛，狼狈中透出无私的亲情。看着一队囚犯从眼前走过，它们侧头看着树下经过的每一个人，发出温柔的咕咕声。

私下里掐指头算算，几周下来，也许是几个月，已经记不清楚了，我们在寒冷、冰冻的冬天干十分劳累的活。我们拿着锹、铲去挖地沟和战壕，当然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挖那么长的战壕，也不知道战壕干什么用。我们也从来不敢停下来问一问或考虑那个问题，否则，你肯定要遭受一顿毒打。

地皮冻得十分坚硬，那份工作对我们这些虚弱无力、营养缺乏的女人来说真是太艰难了，活得一天不如一天。记得我们是用烂草根垫到鞋子里来温暖我们已经起了水疱的双脚。我们暴露的双手无法得到保护，双手被冻得奇痒无比，被我们抓破了。但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一次，我摔倒了，摔破了膝关节，伤口流了大量的血，看起来十分危险。如果党卫军看到囚犯站在工地上不干活，他们会认为是装病，因而会毒打囚犯。我还算幸运，囚友用生锈的剪刀剪下破布把我的伤口包好。尽管我的膝盖

扭伤了，好在我还可以行走，至少表面上看我能干活。

我们把沟挖好，还要把土和沙子砌成一个台子，然后党卫军命令我们从森林中将十分沉重的木头抬到壕沟上。木头要仔细认真地摆放好，一根挨着一根，堆成一个篱笆。母亲身体十分虚弱，能把一根木头抬起来也算难为她了，我尽量帮助母亲，抬木头时主动抬粗的一头，让母亲抬比较细的一头。除了同样艰苦的劳动外，那里还是纳粹士兵练习射击的场所。我们工作时步伐一定要快，如果速度慢或由于身体虚弱、得病等原因停下来，我们知道党卫军会毫不犹豫地向我们开枪。那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把枪杀一名囚犯看作踩死一只蚂蚁那样无足轻重。我们曾想，也许严寒能让纳粹士兵减少对我们开枪，可实际上严寒并不能阻止他们把我们当作靶子。他们是畜牲，似乎更有兴趣把我们当靶子。在抬木头时，我们总是提心吊胆，生怕自己成为活靶子。每天我都看到几个同伴遭枪击致死，受伤的就更多了。

当我们返回营房时，往往身心俱疲，又饿又累，但有一个党卫军士兵总是用那个时间来折磨我们。他是一个魔鬼，是我见到的最坏的一个魔鬼。他不是强迫我们在空场上做“运动”，就是让我们在雪地上做俯卧撑。他满脸带着坏笑，看我们做，10次或者20次。有时他还会给我们额外的“奖赏”，让我们多做几次。他有时狞笑着看着我们受苦，如果我们做得不够快或者有谁的表现让他不高兴，他就会用他钉有铁钉的皮鞋踢我们，把我们踢到泥坑里面。那种“运动”对我们这些精疲力竭的妇女特别是身上有伤的人简直就是噩梦。但我们都尽量做好，少给他毒打我们的机会。他心满意足地折磨完我们之后，才骂骂咧咧地允许我们返回牢房。

不是所有的囚犯都在森林中从事奴隶般的劳动，还有一定数量的囚犯要在仓库中从事其他特殊的活计。留在仓库中干活应该是个好差事，它比在冰天雪地的森林中干活要好上千百倍。塞纳·库恩负责面包房的工作，主要负责切面包片，天天都要去面包房。每天晚上，当我们从森林返回营地，塞纳总是偷些面包，用破布裹着带回营房。实际上那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是十分冒险的行为，如果被发现，党卫军会用特殊的手段惩罚她。

饥饿迫使人去冒险，一位妇女由于忍受不了饥饿的折磨，“顺”了几片面包，不幸被纳粹党卫军发现，党卫军马上把她抓走，从她头上中间部位剃下一道头发，使她看起来像莫霍克族^[2]人，以此来侮辱她。因为我们的头皮在被剃过之后已开始长出了一撮一撮的新发。党卫军知道我们对刚长出来的头发格外珍惜，我们又有了人的感觉。但是任何一点体现做人尊严的感觉，党卫军都要抹掉。

另外一位“幸运”的囚犯叫黎莉，她是塞纳的女儿，比我小一岁，她引起了集中营指挥官的注意。尽管她同我们一样也是饿得半死，但她长得漂亮，有一双美丽的黑眼睛，打着卷的头发——她的短发已经长出来了。指挥官让她到家里做孩子的保姆，那意味着黎莉的主要工作是在室内照顾孩子，她也能从孩子那里得到剩下的食物。她和她的妈妈都成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我们成为好朋友。

小姑家的两个女儿——我的堂妹特鲁蒂和莉莉同我在一个营地，同一个队，但是不同的组，不在同一个地方干活。我们也是好朋友。那时候，没有朋友的话你很难能活下来。如果有一个朋友，你活下来的机会就会增大。集中营里的生活充满了死亡、疾病、饥饿、苦役和折磨。在那些漫长的黑暗岁月里，友谊成了一些人活下去的动力。

晚上点过名、喝过汤、吃过一片面包之后，我们经常挤在一起。那阵子天气不好，经常下雪，但是到了傍晚时分通常会转晴，甚至可以看到月亮。我们在一起分享着在森林中偶尔发现的蘑菇，那是我们在集中营中最为快乐的时光。对于那些蘑菇每次都要仔细辨认，幸运的是那些不是毒蘑菇。当时附近没有灯，只有月光，但那就足够了。

我们围个圈，席地而坐，谈着话。谈话的内容十分简单，话题就一

[2]莫霍克发型。莫霍克发型起源于美洲的一个土著部族，该部族被白人殖民者称为莫霍克族。该发型需要剃掉所有的头发，只在头顶中间留下一窄条头发。20世纪70年代，朋克人群当中开始流行的发型与莫霍克发型相似。

个——食物。一提到那个话题，兴致马上被撩起，食欲就涌上心头，我们享受着没有食物的口福。不知为什么，当时我特别想吃洒上黑胡椒粒的饺子^[3]。实际上，作为一个孩子，我从不喜欢黑胡椒粒，可是当时在库尔茨巴赫集中营，我就是想吃那些没有可能搞到的东西。可见，饥饿在我们心中留下多么深重的伤痕，一提起食物我就垂涎欲滴。

因为痛苦而放弃生活中的快乐不符合上帝的精神，也不符合人性。快乐是人性中的光明的一面，是一种应该展现出来的东西。我们还在一起写歌，尽管我们没有纸、没有铅笔，却能记住歌词和韵律。一位和我们在一起的波兰妇女用她那宽厚、低沉的嗓音同我们一起唱起一首忧郁的意第绪语^[4]歌：“我忍受苦难，平静，微笑。上帝啊，不论我是谁，你知道，我永远属于你！”有时我们能看到德国士兵透过围墙听她唱歌。我们还有库尔茨巴赫之歌，每天早晨在我们去森林干活的路上都要唱那首歌，党卫军也伴随着曲调监督我们上工。

当这一天醒来，阳光在微笑，
队伍向森林中前进，
我们心中装满了忧愁。
森林是黑暗的、天空是红色的，
我们的口袋里只有一小片面包，
但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中只有烦恼。
噢，库尔茨巴赫！我永远不能忘掉，
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
谁能离开你只能猜测。

[3]斯洛伐克饺子。斯洛伐克的饺子与中国的不同，虽然都是由“面”和“肉”组成，但是在斯洛伐克饺子中那两样是分开放的，而且“面”是面包皮。正规的吃法是用面包皮包一些肉放在嘴里大嚼，同时佐以同样名声在外的斯洛伐克酸菜。

[4]意第绪语：是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历史上为中欧和东欧的犹太人所用的语言，是多种语言的混合，主要来自于中世纪日耳曼方言，其次来自于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各种斯拉夫语、古法语及古意大利语。

你要记住，
自由是多么的美好。
噢，库尔茨巴赫！我们永远不能忘掉，
无论我们的命运如何。
我们对珍惜的“生命”说“是”，
因为那一天终会来到，
我们将会获得自由。

这首歌真实地描述了囚犯们在集中营中心中有信仰，在严酷的环境中所拥有的内在自由与自尊。对一位囚犯来说，自由，是一种盼望而不是拥有。它令我们感动，面对一种可以预见的将来，也坚定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自由”是多么令我们向往的字眼呀！后来我发现“库尔茨巴赫之歌”并不是我们集中营的原创，其他集中营也唱着那首歌，只是曲调不同。这首歌的曲调来自何处还真是匪夷所思。

1944到1945的冬天异常寒冷，连续几天的寒冷让人觉得冬天永远不会结束了。气温骤降，身体开始跟着不适，寒气从脚心逼上来，全身都冻伤了，直弄得你心灰意冷，很难用语言来形容我们在寒冷的冬天所遭的罪。

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能左右自己的心情。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那是我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当时身体非常脏，就用雪来擦一下我粗糙的皮肤，也算洗个雪澡。当我揭开大腿上的伤疤时，皮肤也跟着一起下来了。我身上有几处明显的冻伤，牙床异常肿痛，牙齿在又黑又肿的牙床上悬着。

有人劝我到“医务室”或“急诊室”去接受一下治疗。用那样两个词来形容那简陋的房子简直是最大的褒奖。集中营的病房是由粗帆布支撑起来的帐篷，只有几种药，我那么严重的病在那里是无法得到治疗的。他们给了我几块胶布，我把胶布粘在牙床上，一点作用都没有。

白天只要是清醒着，饥饿就一直折磨着我们。我们经常谈论吃的，母亲总是把她自己那份面包给我，说自己不饿。在温暖的谎话里，母亲

的声音也许依然脆弱，但是母爱的伟大却昭然若揭。在集中营中，即使牺牲自己的一小部分食物，就要得病，使人更加虚弱。母亲为我做的牺牲，正是因为她认为我的生命要比她的生命更为重要。饥饿意味着我们的身体要被一点一点消耗掉，我的手指甲、脚趾甲都不长了，我们的皮肤变成蜡色，我们的眼球好像都凝固了。

我们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生活，我们一起走出囚牢区，行走在路上，连表情都没了，希望，绝望，孤独，迷茫，忧伤……所有情绪交织着，变幻着。在党卫军面前，我们就像一群奴隶，而党卫军士兵在风雪里裹着厚厚的大衣御寒，对我们显不出一丝同情，拳打、棒打、皮鞭抽、各式各样的惩罚，成为他们每日生活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从库尔茨巴赫集中营幸存下来的。每天我都希望，或者是上帝或者是盟军能给我们解脱。我们祈祷英国空军能飞临我们的上空，然后向我们投放炸弹，那样就可以结束我们的痛苦，但那样的祈祷无济于事。时间在向后推移，我们仍被德国人的暴力所折磨，每天像傻瓜一样机械地去干活。我们甚至每天都不用考虑问题，生活似乎变得十分简单了。

圣诞节到了，指挥官家的窗户上显露出圣诞节的装饰，纳粹看守在集中营里竖起了一棵十米高的圣诞树，虽然那并不是为我们这些囚犯装饰的，但一看到那棵圣诞树，我们就不禁想起了小时候与家人一起过圣诞节的美好情景。

面对着被毒打与漫骂的犹太女人，党卫军士兵唱着圣诞歌，那个世界一定是疯了。1944年12月23日夜里，一些俄国战俘试图越狱逃跑，结果被抓获。一些战俘马上被枪毙，另外一些于次日早上被绞死。为了以示对其他囚犯的警告，一切处决都在圣诞树旁边执行，绞死的战俘被挂在横在圣诞树旁边的木柱上作为“点缀”，而纳粹卫兵则安然无事地唱起了“圣诞树，圣诞树，你的枝叶是多么葱绿”。那幅惨象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以后我每次在圣诞节听到赞美诗时，不管那些歌曲是多么优美，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集中营里的那次圣诞节，特别是挂在圣

诞树旁边的那些用来“点缀”的尸体。那就是1944年的圣诞。那一年很快地就过去了，在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时，新的一年便拉开了序幕，又开始了那漫长而又苦难的日子。

其实，在很多战场，德国军队都遭受了重创，希特勒似乎没能赢得预期的“赌资”。按理，此时的希特勒应该有一点沮丧，有一点心灰意冷，歇下来，静心等待战机，再思新的对策，再耍新的权谋，可是，他没有。他就像一个不怕输局的赌徒，即便是老本蚀光，也要拼死一搏。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力构想，希特勒能在蹭蹬挫折中，甘冒不韪，逆势而上，甚至走到歇斯底里、走火入魔的地步。

一日，清晨点名后，党卫军又要求我们站好队，五个人一横排，又开始向一个不知名的地方行进。我和囚友们马上要经历纳粹屠犹史上又一次犹太人的灾难——死亡行军。

第七章

到贝尔森集中营^[1]

每天早晨点名之后，我们都排着队走向森林，在村庄的尽头向右转弯。可1945年1月初的那个清晨，我们仍走在那条路上却没有转弯，而是一直向前走。德国人告诉我们，我们不回库尔茨巴赫了。在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听到枪炮声，在我们头顶可以看到飞机，苏联红军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们每次都祈祷炸弹光临，结束地狱般的生活，但还是见不到炸弹从天而降。

眼看着我们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消瘦，但德国人还是要求我们尽快有序地抵达下一个目的地。我们这群脑袋被剃光、受尽磨难的女囚，第三帝国的敌人，身上的破毯子和破旧的睡袋几乎不能遮盖赤裸的身体，后背都涂上了号码，都快要死了，可德国人却吆喝着，命令我们要像士兵一样向前行进。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还告诉我们整个行军过程要保持同一速度，他们警告我们：“任何停下来休息、不保持队形或坐在路上停留的人立刻被开枪打死。”所以我们要保持很快的速度行军，那就是著名的“死亡行军^[2]”。那是一段无奈的长途跋涉，在那条冰封的路上，一群面无表情、目光呆滞的妇女在艰难地爬行。我们的气力似乎全部耗尽，后

[1]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位于德国北部汉诺威附近，建立于1940年。二战期间，先后有约12万人被囚禁在此。1945年4月15日，英国军队解放这个集中营时发现约6万具尸体，死难者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在集中营存在的5年间，德国纳粹在此共杀害了约7万人。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来完全是机械地抬腿迈步。连我的思想都是机械地思维，什么都不关心了，我还怕什么？什么都不想，党卫军叫我走我就走，他们叫我停我就停，他要开枪枪毙我，他就开枪，达摩克利斯之剑终日悬在头上，我们的生命早就握在党卫军的手上。

有些囚犯因为体力不支而无法前行，于是卫兵就对他们横加打骂。在步行的几天内，不断有囚犯倒下死亡或被党卫军卫兵击毙，说死就是眨眼间的事。党卫军士兵经常更换，他们也能休息，吃饱了喝足了。可我们从来就没有休息，尽管在行军途中经过了许多城镇和村庄，有时要从大路上下来，走一段乡间小路，那些小路很少有人走，但是从来不让我们停留。在兵荒马乱的年月，走在路上的并不仅是我们那支队伍，我们遇到了成千上万从前线撤下来的德国士兵，他们是被苏联红军打败的，我们和那些德国人经常挤在一条路上走。

我看见数不清的马车、四轮车载着各种行李、设备、食物，仓促而逃。罐头、牛奶就装在车上从我们面前经过，看了让我们更加饥饿。我们看到德国人披着厚厚的毯子，有充分的食物储备，可却没有一人向我们那近一千人的囚犯队伍扔哪怕一块面包、一个土豆。德国人齐刷刷地朝我们行“注目礼”，眼珠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们，瞪着我们。他们恨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犹太人。他们颇为不屑地把我们归为人类的劣等民族，尽管他们信仰的第三帝国马上就要土崩瓦解，他们依旧恨着我们。

我们来到了在德国境内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布雷斯劳^[3]的郊区，那说明我们已经走了125公里。小姑的女儿，我的堂妹莉莉发着高

[2]死亡行军：也称为“死亡之旅”，也许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才能完整表达其中的意思。它是德国纳粹已感到自己失败命运后所作的垂死挣扎，他们命令各集中营的囚犯在不堪忍受的条件下进行长距离、强迫性的转移。囚犯要以行军的速度行进，还常常受到随行纳粹党卫军士兵的虐待、枪击，很多人在行军中死亡。

[3]布雷斯劳：今波兰西南部下西里西亚省省会，位于奥得河畔。1945年1月，战场形势已经明朗，可德军仍然垂死挣扎，该市1万名犹太人中有许多人被纳粹杀害，1945年2月红军逼近，布雷斯劳建成军事要塞。在苏联红军围攻3个月后，布雷斯劳要塞在5月7日投降，是德国东部最后陷落的主要城市。

烧，耳朵也痛，她的力气快用完了。她的姐姐特鲁蒂始终和她走在一起，不久她们就落在队伍后面了，她们根本没有力气迈出一步。莉莉痛苦地说：“让我死了算了。我真的再也撑不下去了。把我留在这里好了。”母亲知道，如果那样做，纳粹士兵一定会直接杀了她们姐俩，因为一路上那些跟不上队伍的人都被枪杀了。母亲当然不能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她搀扶着莉莉，实在不行的时候就硬拖着她往前走。母亲不停地和莉莉说话，为她鼓劲：“我们可以撑过去的。你不能现在就放弃。”母亲虽然经过长途劳顿，自己也已经非常虚弱，但她还是拼尽自己全部的力气来保护姐俩。可最后姐俩还是筋疲力尽地坐在路边上了。

也许最坏的事情就要发生，我们一直为她们的命运担忧。在那段死亡行军的路上，每个人都是别人的一部分，大家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人们在共同遭遇着苦难，也共同承担着相互的命运。母亲和二婶的孩子试图搀扶她们起来，把她们扶到队伍中来，但是她们已经不能移动了。我们的体力有限，也实在没有力量搀扶她们，只能扔下她们。我叹气，母亲也叹气，原来自己竟是如此渺小，微不足道，连自己身边活生生的人都救不了。我哭了：“妈妈，她们该怎么办？我好怕，再这样下去，她们会死的。”看到她们在我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令我们扼腕落泪。大家十分害怕，一边走一边回头看，颤抖地等待着听到机关枪向她们两个人扫射的声音。可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不停地向前走，也不知道那两姐妹是死是活。

是啊！在司空见怪的死亡面前，震撼人心的不再是死亡时的那种无助的哀叹和恐惧，而是活着时的冷寂而萧杀的孤独。那孤独又包含有种种的可能性，或许下一个该是我！无法想象，那是一个多么折磨人意志的漫长过程，还有什么会比等待死亡更能吞噬人心，更让人不寒而栗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此时的德国人更加关心的是尽快离开苏联红军控制的范围，进而忽视了两个十几岁的弱女孩已经掉队了。其实，我们也没有意识到，苏联红军已经十分接近了，当时我们听到他们向德国人开枪。一个小时以后，摔倒在路旁的特鲁蒂、莉莉被苏联士兵发现了，

对她们来说，恐惧已经结束，她们得救了！可她们的父母、两个小弟弟——一个11岁、一个只有7岁，还有她们的外祖母、叔叔、姑姑们在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当天就被毒气毒死了。那是1945年1月的第一周（布雷斯劳被希特勒宣布为要塞城市，抵抗俄国人的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6日）。

其余的人沿着公路，朝着德国人指定的方向继续着艰难的行军。我们甚至都记不得已经行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身处一种旷日持久的浩劫之中，如果想得太多，有可能会马上死掉，躺在地上龟缩在那里就可以死去。当时人要死其实很容易，但要真正去活也不难。因为，我心中有希望，有母亲陪伴着我，我要和她一起活下来。人是为自己活着的，人好好地为自己活着，客观上也能给别人带来好处。至少我可以和母亲相依为命，我们要从那困难的环境中逃生，我们还想见到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相对于我母亲的痛苦而言，也许我的痛苦是不足为道的。其实当时父亲离开我们之后大家并不知道他的死活，我们当时也不知道姐姐是否还活着。人是孤独的，就像死亡是人的最终归宿一样。母亲也是孤独的，在父亲离



▲ 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行进在“死亡行军”的路上

开我们之后，母亲也许就一直是孤独的，可母亲知道所有的孤独都是对命运绝望的妥协。要接受生活，就要接受不可抗拒的孤独。

关于生存，政治犯有理想的光芒赐予他们力量，音乐家由艺术的高贵来支撑，那么母亲呢？母亲也不是什么都没有，母亲从没有放弃找到父亲、找到姐姐朱迪思的希望。她隐藏起最深重的悲痛，她紧握心灵的伤口，在她那颗流血伤痛的心里始终装着父亲和姐姐，她的力量鼓励我们生存下来。

对于父亲，我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至亲至爱的人离我而去，而

我的年纪又恰巧是到了能深刻体会到生离死别痛苦的年龄，那令我在很长时期内，心灵几近崩溃，似乎失去了人生的动力。我时常想念他，想念那双有力的大手和坚强的笑容。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常常会有幻觉，感到父亲依然在我的旁边，慈祥而又温暖地注视着我。然而每每幻觉破灭时，我都会泪流满面。

除此之外我还另有一个希望，也是对自己生存的支撑。在同囚友们讨论解放后干什么的时候，我多次谈到我的希望——能成为一名服装设计，它已成为我心中隐形的翅膀。

在“希望”这个问题上我和一句西方谚语感同身受：“与其诅咒黑暗，不如为黑暗点上一盏灯。”这句话又一次让我开悟：人类是在希望中前进的，许多时候人都需要希望。希望是鼓励我生存下来的力量，只要生存的信念犹在，人在任何处境中都能为自己编织希望；只要有希望，人永远不会被挫败，哪怕是极可怜的充满阴影的希望。我嘱咐自己：有呼吸就会有奇迹，我要等待奇迹。就算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堆灰烬，我也要用希望将它点燃。每天早晨起来，我就告诉自己一次：“我今天还活着，明天也许有希望。”如果以这句话忖度，生活若剥去梦想、希望、信念，那生命便只是一堆空架子。希望是和我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话题。其实，拯救自己的只能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不久，我们到达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4]，它离布雷斯劳约60公里。到达集中营的大门时天已经黑了，我们遭遇到可怕的一幕：站在我们面前的一大群人，个个面容苍白、身体瘦弱，看起来像骷髅；很多人趴在地上，半裸着身体，有的人可能已经死了。一些人站在那里喊着：“谁见过或听说过某某？”我母亲一听也跟着喊：“谁见过我的女儿朱迪思？”无人应答。

[4]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纳粹在波兰共建立了四大集中营，除奥斯威辛外，还有玛伊达内克、什图特霍夫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有25万名犹太人和苏军战俘死于疫病、饥饿或被纳粹杀害。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我们重新经历着在集中营生活的又一个可怕的一幕——虱子。我对虱子的憎恨与生俱来，当第一个虱子咬我皮肤的时候，我就下决心把它从破旧的衣服上抓出来，狠狠地将它掐死，心满意足地看着它们死亡。但是过了些时候它们会卷土重来，这便是自然界的生存竞争，相克相生，而且数量增长得不可思议，然后开始新一轮的攻击。更为悲惨的是很难形容它们的疯狂，它们像数万只蚂蚁一齐啃你的骨头，让你不胜其苦。你甚至没有一劳永逸地将它们最终击退的可能。每个虱子都咬你的皮肤，吸你的血。它们无所不在——头上、胳膊上，隐藏在全身的每一处。它们前仆后继的韧劲儿逐渐消磨了我的意志，最后彻底将我占领，只能任其啃咬。

于是，烦躁与痛楚开始捏住我的喉咙，我开始变得神经质，近乎于歇斯底里，随时都会崩溃。当你被虱子疯咬的时候，会有得斑疹伤寒的危险。当时我们的身体十分虚弱，即便是小小的感冒也可能会致我们于死地。但是最可怕的是用手挠虱子咬过的皮肤会引发其他疾病，我的皮肤十分干燥、粗糙。我们发现虱子的最大好处是党卫军远离我们。他们怕传染虱子，党卫军比我们更怕虱子。

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仅待了三天，因为那里开始流行斑疹伤寒和猩红热，疫情越来越猛烈，每天尸体一车车地拉出去。德国人决定，还要往前走。在那个集中营我们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许是他们没有时间。我还是第一次在集中营看到德国人的程序被省略，德意志民族向来是一个恪守各种规定的民族，任何事情都一丝不苟，要求做到准确。而当时德国人的整个制度的执行尺度正由于战场上的失利而面临着瓦解。

三天后，命令下来了，我们要离开集中营继续前进。我们又重新集合，大家走出集中营又向前走去。天黑前我们到达一个小村庄的一个空场。天渐渐暗了下来，在一个喷泉旁分发我们当天的食物——汤和一小片黑面包。我们很快地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在我们旁边的党卫军士兵也在吃饭，他们从铝合金盘子里吞食着热汤和白面包，汤里混合着熏

肉，香味扑鼻而来，使我直流口水。

奇怪的是战争过去之后，我已经记不得那次死亡行军到底走了多远，也记不得我们一共经过了哪些村庄、小镇。只有一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永存，那就是在那个村庄的空场上党卫军吃饭的香味，那种奇怪的感觉一直纠缠了我好几年。

行军又开始了。由于疲劳、饥饿和寒冷，囚犯们纷纷倒下。一些人轻易地放弃了，他们就在路边坐下，接着，死亡的游戏又一次拉开了帷幕：一是党卫军的子弹，二是大雪。什么是生命的本性？死亡行军告诉我们：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什么时候都不能放弃。或许那代表了一种生的态度，一种生命的坚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得到的力量，怎么还有可能对上帝充满着信仰，那信仰传递的信息是：不能放弃，坚持一时是一时，坚持一天是一天。相信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获得自由。劫难总会过去。但是同我一起行军的很多犹太妇女确实没有坚持到那一天。

我们下一个目的地是德累斯顿，它离格罗斯-罗森190公里。我们实际上抵达的是市中心，而不像在布雷斯劳到达的是郊区。我看到旧式火车头在站台上喘着粗气，在它后面是一排装牲口的货车厢，像蛇一样排在火车头的后面。

在走了总共约375公里之后，我想死亡行军可能结束了。我们像垃圾一样被推来推去，党卫军又命令我们上了那列等候的列车，车厢里充满了冰块、泥土及牲口的粪便。我们胡乱挤到一起，互相取暖，刺骨的风同虱子一样让人无法忍受。每个车厢里有一个党卫军士兵负责警卫。他们不需要派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力气逃跑，剩下的力气连下火车都困难。人们一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来自集中营，是犹太妇女。

当时正下着大雪，四周银装素裹。装着人口货物的火车徐徐开出车站，慢慢地加速，并没有走多远，来到了德累斯顿市的主站，然后就停在那里了。当时空袭警报在四周响起，到处都是尖叫声，人们四处奔跑寻找着掩体。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德累斯顿是一座文化古城，是德国萨克森州的首府，距离柏林198公里，离捷克的边境仅有40多公里。1485年它开始成为萨克森王国的都城，经过大规模的建设，成为享誉欧洲的文化名城，有“世界建筑宝库”之称，也是二战期间德国军工生产的重要基地。1945年1月，随着盟军在东西两线的节节胜利，欧洲的制空权已掌握在盟军手中，盟军统帅部制定了大规模空袭德国的计划，把德累斯顿作为盟国空军集中攻击的重点目标。

当时的德累斯顿，充斥着来自德国东部的难民以及从波兰来的德国人，那时的空袭会造成巨大的破坏，也会杀死大批的人。此时，那座城市仍沉浸在一片安详之中，剧院和影院照常营业，夜空中回荡着优美的舞曲。

突然，英国的目标指示飞机投下了目标指示弹。接着，令人恐怖的防空警报响了起来。

车厢里的党卫军士兵毫不犹豫，一溜烟地跳下车逃命去了，他们迅速找到了掩体，把我们放在毫无防御的地方。当第一批炸弹泻下时，一股股浓烟腾空而起，下面是滚滚火球闪耀着强烈的淡红色光芒。巨大的爆炸声成串滚过，轰隆隆震天动地，整个城市被照得如同白昼。

飞在前面的轰炸机用爆破弹把古老的建筑物炸上了天，后面的轰炸机则投下燃烧弹，使地面成为一片火海。炸弹掀开屋顶，炸飞门窗，火浪滚滚。高温造成一股强烈的冲天气流，由于火海的中心吸取新鲜空气，因而形成一股可怕的飓风。

大地像地震一样地颤动着，火焰发出像大炮一样的轰鸣声，风在呼啸着，尘埃和烟雾在德累斯顿周围狂暴地旋转着；人们在尘埃和烟雾中艰难地呼喊，妇女儿童在呻吟着。有些幸存者，焦头烂额，衣衫槛褛，无家可归，到处徘徊，德累斯顿几乎被英美空军的炸弹和燃烧弹夷为平地。

在头顶上，我们看到轰炸机飞得特别低，真是吓人，甚至可以看到轰炸机飞行员的面部表情。他驾驶着飞机，纵横捭阖，炸弹像雨点一样

落下，落在这个德国城市里。风暴般的火焰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市区，在一片焦土中间，偶尔能见到少数水泥建筑的断壁残垣。在那天夜里，我们以为整个城市都已化为灰烬，德国人吓得魂不守舍。

德累斯顿简直成了一座翻腾的地狱，此景此声几十年后仍然毫不走样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5年1月至2月，盟军对德累斯顿实施了三次大轰炸，我见证了其中之一。三次空袭引起城市大火，使15平方公里的市区完全夷为平地，至少有6万人丧生。空袭的目标之一就是火车编组站，也就是我们当时滞留的地方。在空袭中我看见一组组炸弹如神兵天降。我们面对如此多的炸弹在身边落下，一点也不感觉害怕。也有几名囚友被炸死，尽管她们死了，但她们知道德国纳粹马上就要完蛋了。

我想到战争快要结束了，也许我们马上就可以再生了。我们与解放有约，看见了解放的信号，它在不远处等我。我陡然间有一种恍惚，仿佛飞行员的眼睛在黑暗中一直凝视着我们。

然而，一时的心满意足并不代表永恒，空袭的力量还不能让囚友们的眼睛铺满阳光，解放与自由仍只是一种期待，我们还是无法摆脱囚犯的命运。正当盟军的飞行员为我们编织解放梦想的时候，空袭解除的警报鸣响了，盟军飞机已经班师回府了，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

令人瞠目的是我们的车站没有被完全击毁，几分钟后那几个党卫军士兵毫发无损，如同虱子一般又回来了。火车缓缓启动，接下来，离开了那热热闹闹的场面。我觉得自己像是离开了抗击德国纳粹的战场。

几个党卫军士兵又开始吃了起来。从德累斯顿到达贝尔根-贝尔森有250公里路程，德国人就没有给我们任何水和食物。从德累斯顿出发，火车穿越了许多城市，由一闪而过的站台上的站牌得知那些城市的名字，起初是魏玛，接着是哈雷，然后是汉诺威，还有几个不知名的城市。我们乘坐敞篷火车，很容易从车站的建筑上看到城市名。

我当时并不了解贝尔根-贝尔森，也并不知道在美丽的吕讷堡荒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原^[5]茂密的森林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它绵延几公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

后来，我们才知道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司令官约瑟夫·克拉麦尔^[6]是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调来的，与其说他是个党卫军的军官，倒不如说他是个屠夫更恰当。他的凶残狠毒的本性使他杀人如麻而毫不在乎，甚至他的外形也显露出残酷和狰狞。紫红色的脸上布满伤疤，身体粗壮结实，一副杀人犯的相貌，令人第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一个职业杀人专家。

克拉麦尔特别仇视俄国人和犹太人。他消灭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并且认为所有的犹太人很快都要被灭绝。

夜晚，当囚犯的队伍收工归来时，克拉麦尔总要站在营房入口处，通常是在女营，搜查精疲力竭和奄奄一息的女囚犯。随后，他从她们中间拉出几个或者整整一组，命令她们脱光衣服，检查她们衣服的每一条缝。他常常手握一把石子，要是有犯人衣服脱得不够快，石头就会朝她飞过去。

1944年11月，奥斯威辛毒气室的活动停止后，克拉麦尔作为一个最能干和最有经验的集中营长官被调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他要把那里变成一个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火车在贝尔根-贝尔森停了下来，我们从车厢里被赶了出来，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死了。不过由于天气寒冷，再加上拥挤，那些人仍然直挺挺地“站”在活人之中。他们同我们一样被从火车上拽了下来。

[5]吕讷堡荒原：德国中北部下萨克森州的一个区，面积约7200平方公里，其北部以易北河冰蚀谷、南部以阿勒尔河为界。那一地区的典型特征是由于森林遭毁而只有低矮的灌木丛和欧洲刺柏生长。1945年5月4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那里接受了德国北方军的投降。

[6]贝尔森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尔：解放集中营时最为顺利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司令官克拉麦尔和他的情妇、副长官格蕾泽当时正在饮酒作乐，不料盟军部队从天而降，尚未反应过来，已被戴上手铐。集中营的其他要员，如副长官赫斯勒、女营看守长福肯哈特、党卫军医生克来茵以及50多名党卫军女看守、200多名男看守，几乎无一漏网。

那时我们十分虚弱，几个月前我们就没有了脂肪，骨瘦如柴，两个原来丰满的乳房也都消失了，牙齿在嘴里也松动了，浑身是流浓的疮，成群的虱子爬在人的身上令人发痒。我的双眼塌陷在眼眶里，头上长了几撮头发，我几乎不能自己站立起来。不过要同站在我面前的贝尔森集中营的囚友们相比，我还略微好些。

集中营里是一排排的木屋，沿着集中营的路无边无沿地延伸下去，一眼看不到头。集中营四周布满了铁丝网，还有很多岗楼穿插其中。我想我们是被分配到8区，是一个“女犯人营”。那个集中营是1944年秋开始修建起来的，当时有很多从前线抓到的战俘被押送到贝尔森。8区由很多不同的木制小屋子组成，里面十分拥挤。母亲和我在地上只发现了很小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睡觉，几乎不能伸腰，几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动弹一下就会打扰别人。那个集中营是我呆过的最差的一个——饥饿、赤身裸体者到处都是。8区，甚至比比克瑙集中营的条件还要差，特别是在集中营被解放前的几个月更是糟糕。

第二天我们得到了分发的“食物”——黑水和一小片黑面包，如果我们幸运的话，晚点名之后还有汤水。点名制度还在延续，不明白纳粹党卫军为什么总是用那种办法折磨我们？我们这些人在集中营里越来越少说明了什么？我们之中能有人从集中营逃生出去吗？其实囚犯的减少，都是惨死在集中营里，我们见的太多了，也知道的太多了。我们知道自己跑不出去，那些没有生存权利的犹太人没人能逃得了生。

一天，母亲和我还有我们同组的几个囚犯被带进一间小屋——洗菜房。房子里用圆木做成的板凳已经腐烂，但还可以支撑着我们坐在上面。有若干口铁锅摆在地上，几个大麻袋里装着灰色的满是泥土的萝卜。我们的任务是用很钝的刀子削萝卜皮，然后把削好的萝卜放进空铁锅或篮子中再抬走。当然，也有规定，就是不允许我们吃萝卜和萝卜皮。

削萝卜皮也是一种可怕的折磨：面对它们却绝对不允许藏起几片留着吃。我在集中营的时间比较长，我知道因那种行为被抓住的后果。我饥肠辘辘，也不知道那些萝卜是为谁削、为谁煮的，但我知道那些萝卜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是人的食物。

终于有一天，饥饿战胜了理智。当时我正在坐在厨房里干活，看见一些萝卜皮洒落在地板上，我想把它们藏起来，伸出手去捡萝卜皮，结果被党卫军士兵发现了。他用刺刀捅了一下我的胳膊，我没有喊叫，马上缩了回来。很庆幸，那个党卫军士兵没有用力，我的胳膊也没有严重损伤。我担心的是会被带到禁闭室去，在那里可能会被打死。那次事件后，我再也没有藏一块萝卜皮的想法了。

我的身体状况继续恶化。1945年1月在集中营里斑疹伤寒已经爆发，在我们到达集中营的时候，斑疹伤寒已经在全集中营流行，母亲和我几乎立即就得上了那种病。剧烈的腹泻、呕吐和严重脱水使我们没有一点力气。我们太虚弱，以至于无法走路，那意味着我们都无法去取食物。我的吞咽功能有一定的问题，甲状腺炎最后诊断为白喉。其他人有的得了肺结核和霍乱……那些流行病就是贝尔森集中营的正常疾病，营房以外，死尸摞起来像小山一样等待着“处置”。

工作已经没了程序，尸体既没烧也没有被掩埋。集中营简直就是一个疯人院，营房中的恶臭气味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尿、屎、呕吐物等腐烂的气息在空中流动。由于天气寒冷，人们把自己床上的木头拆下来当柴火烧，有些床就自动倒塌了。如果有人在半夜里死了，他的尸体会同邻近的活人躺在一起，直到第二天清晨早点名时才会被人发现，被拖出去。

尸体上有“价值”的东西也早就被人偷光了，像鞋子、靴子、钥匙、勺和小盒，任何东西只要是能被再利用的都被人偷走了。那些东西同它们死去的主人比，也算是幸存者了，它们“再生”了。如果你不尝试着活，你就要死，每天只要是我们把眼睛睁着，就能看见死亡，死亡就和喘气一样容易。

在解放前的最后几周，集中营的条件变得更加糟糕，面包供应从每天一片到完全停止，仅有的食物是每天一顿晚汤，到最后水也没有了。在贝尔森，6万名囚犯没有饮用水的时间长达一周。我相信德国人是故

意切断水源，其险恶用心不外乎就是尽快加速囚犯们的死亡。通过“自然”的方法让囚犯死去，那样他们就可以逃脱谋杀的罪名。

我们的信念已接近崩溃，论及眼下，死亡的意念，也静悄悄地在囚犯心中生长与蔓延，我预感到我们会很快死去。有关战争的进展没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离我们最近的盟军在哪里。在贝尔森附近没有战斗，甚至也听不到上空有飞机的声音。

我知道我还是要坚持，只要晴朗的一天没有到来，我们犹太人将永远只能活在社会的阴影里，永远享受不到做人的尊严。解放的到来很有点戏剧性，那是1945年4月15日，我们像平常一样站队，母亲和我气若游丝，面如死灰，像等待死亡似的等待着点名，想必一会儿党卫军士兵还会辱骂我们。突然，我们听到附近有嘈杂的声音，还伴随着枪炮声。随着卡车和坦克的轰鸣声，枪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接近集中营。可是党卫军士兵始终没有出现，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一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可当时没时间动脑筋想，那里面有什么把戏？德国人会不会在最后一秒钟杀了我们？也许战争临近结束了，他们派坦克来杀我们？

我们看见了坦克，但不是德国灰色的装甲坦克，而是英国绿色的坦克。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一点，坦克不是德国人的，所以它一定来自于盟军。当时，还来不及整理自己的思绪，头脑还在两个世界里混沌神游，身体浑浑噩噩地站立着。我偷偷掐一下自己，感觉到痛，知道那是真的。幸福来得突兀，但是事实，我们解放了，我们自由了，我们打败了希特勒！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了！我们再生了！纳粹德国垮台了，他们虽然没有带走整个人类，却带走了几千万生灵！

大限来时引起了大纷扰，所有那些感觉在我的心中激荡，但我们的身体太虚弱了，我没有力气欢呼。在我的周围，在灰色、寒冷、污秽的空气里，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大家的狂笑，幸福的呜咽。痛苦的灾难已移到远处，我能看到的人个个激情澎湃，它原始，它本能，它的爆发力排山倒海。人们不顾一切交头接耳，激动得手舞足蹈。每人兴奋得像个孩子，激动得双唇颤抖，不知如何表达对盟军的感激，只有眼泪簌簌而下。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那时的集中营一方面多灾多难，一方面又充满了变数和希望。解放的感觉充斥着贝尔森集中营，囚犯们因身体太虚弱不能够尽情欢呼庆祝，此外，德国党卫军和匈牙利党卫军在英军进入集中营后还持着枪徘徊，还在枪杀囚犯。

英国人正在与党卫军集中营的司令官克拉麦尔交涉。后者想同盟军讨价还价，以集中营流行斑疹伤寒为借口寻求24小时的停战协议，想不让盟军进入集中营。其实，克拉麦尔是想寻找时机销毁所有资料，把仍生存在集中营的一切“著名”的囚犯统统杀死。

幸运的是，英国人察觉到了他的鬼把戏，拒绝了那个无理的要求。英国人清楚地认识到在贝尔森集中营，他们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党卫军杀起人来比喘气还自然。当英国军队进入集中营后，士兵们看到了成千上万骨瘦如柴、赤身露体的人，看到了堆积如山的腐烂变质的尸体像木头一样摆放着。那场景使那些经过战争考验的人潸然泪下。

英国士兵的行动如此之快，他们进入集中营后几个小时，就用卡车载来大量的滴滴涕，囚犯们排着队来清理虱子。他们用卡车的引擎联接一个管子，将白色的滴滴涕粉末吹落在我们身上，囚犯们的身上挂满了“雪花”。尽管我们看起来比以前更为恐怖，但囚犯们身上的发痒症状随着虱子的死亡很快就止住了。从此，把我们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虱子突然消失了，那种解脱真是太棒了！英国人马上恢复了供水，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水喝，还第一次有机会把自己清洗一遍，使我们有了人的尊严和感觉。经过几年的折磨，我们的尊严又在生命中恢复了。

英国士兵奉命将自己储存的食品全部送给囚犯。他们把食品



▲1945年4月英国士兵在为女囚喷洒滴滴涕

抬到营房门外，但那里体质太弱有病的人无法活动，也没法得到食品，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饿死了。那些拿到食物的人身体也很虚弱，他们能做的也只是自己设法喂自己。我们没有储藏体能，在整个囚区，我们能听到的就是令人悲痛的大喊“给我点吃的！给我点吃的！”不幸的是，劫难再一次发生：囚犯们的身体已经习惯了饥饿和不健康的食物，在身体没经过长期复原之前，已经不习惯吃那些最正常的食品了。

当时还没有新鲜的食物，只能吃军用食品，那些罐装食物太油腻了，我们对太油腻的食品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每一点食品都似苦药，已经不适应我们那些失去消化功能的身体了。我们得到了一些奶粉，但喝了后却引发了呕吐和腹泻。后来我们又得到了一些饼干，但是我们也吃不下去那东西。我们的嘴里满是溃疡，食物咽不下去。据说要经过几个月的恢复，我们才能品尝那些“正常”的食品。

再生，那大概是人们遇到灾难时最为幸运的了。我那时确实是一个幸存者了，不再是囚犯，但也没有完全自由。在考虑回家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的身体过于虚弱，离开及时的医务治疗我将无法生存。

英国人在解放的第一天对我们这些幸存者进行登记统计。他们在集中营中央搭建了一个临时帐篷充当“办公室”，帐篷中端坐着一位军官，身后还有两三位穿着军服的军官，我和母亲排着队耐心地等待着进入帐篷——“办公室”。

母亲先进去了。她告诉军官自己的姓名、自己的详细情况。母亲说她想带着女儿回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家。我跟在母亲后面，也把我的情况作了登记。我们每个人都接到一张白色的流离失所人员卡，我们在上面签上名，更换了身份，不再是囚犯了。

母亲的身体太弱了，她甚至都拿不动手中的那张流离失所人员卡，我只好替她拿着。我们从帐篷里面刚刚走出来，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母亲瘫倒在地，人事不省。我想把她扶起来，当时护士闻讯进来了，她将我轻轻推开。他们找来了担架，把母亲放在上面。我把手放在母亲的黑发上，她的脸是灰色的，对我的呼叫置之不理。我请求她和我说几

句，不断地重复：“妈妈，不要离开我，我们自由了，我们就要回家了。”但当时已然回天无力，一切都是徒劳的。

那一刻，在泪眼滂沱里，我清楚地看着母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回想母亲痛苦的一生，我痛彻心脾。她能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生，经历过库尔茨巴赫到德累斯顿到贝尔森的死亡行军，在贝尔森集中营那个污水坑里待了四个月，但却在作为幸存者登记的那一时刻死去。母亲摆脱了生的困惑，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把所有的精力和关爱都给了我，没有丝毫保留，甚至不惜向生命借贷。我完全成为孤独的人，我永远地失去了母亲，永远！

第八章

回家历程

一路走来，幸有母亲相陪，眼看曙光在即，可我却失去了她，母亲当时只有40岁，我18岁。我们俩在一起，从整个劫难中幸存下来，可就在解放当日，在我们即将踏上回乡之路时，她却离我而去。与母亲一步之遥，中间是生死两界。我跟随着那些护士，她们把我母亲放在担架上，但是她们不让我跟着她们，劝我说不能和她们一起过去。记得在帐篷外面，我的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哭得一塌糊涂，手里攥着两张流离失所人员卡呆望了很长时间，看着母亲被人抬走。母亲普鲁斯卡，成了劫难中的又一个牺牲品，成了又一具尸体，无名无姓地被埋在石灰与泥土之下……我茫然地回到了营房。

第二天，堂妹露丝过来陪着我。我抱着她一个劲儿地大哭，哭成个泪人，直到眼睛哭肿了，泪水流尽了，俩人才分开。我们一同出去寻找母亲的尸体，来到母亲被抬走的地方，但没有人告诉我她被抬到了何方，也没有人知道。她没有名字，也没有标记，在集中营中堆积如山的尸体中无法辨认。我还是试图去找，但是没有结果。我感到万分歉疚，我还活着，可母亲却躺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尽管我知道她已经死了，可让人抬走是最大的过错，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过错，是我丢失了母亲，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永远藏在我的心底。我实在无法述说自己的苦痛，那个夜晚，止不住的眼泪一直流到天明，那种肝肠寸断的滋味无法言说。母亲把看见的、看不见爱都给了我。解放了，我想当然地以为自己长大了就能回报她。可是那天，她重重地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妈妈呀！

没有了你，谁带我回家，谁能陪我走完那段陌生的夜路呢？

除了情感上的痛苦之外，还有一个痛是身体状况。我还是弱不禁风，主要还是由于斑疹伤寒引起的。但是我还是坚持寻找母亲的尸体。就在我经过集中营内的街道时，见到了过去我在布达佩斯的老朋友。她叫弗瑞达，在布达佩斯曾经与她父母和我们家躲藏在同一个公寓里，后被德国人抓到并被关进集中营，她也在寻找自己的亲人。那时我们的模样都很吓人，彼此很难认出来。我还遇见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个卡波-埃塔，她是在奥斯威辛最后的日子撤到贝尔根-贝尔森的。埃塔看起来很好，英军没有追究她在集中营担任“卡波”的责任，她作为第一批战争遣返难民将被遣送回乡。

正当我在集中营街上四处寻找时，我见到了另一座巨大尸山，尸体都赤裸着，散发着恶臭在等待埋葬。很多尸体在那里停放了几周，散发的气味令人恐怖。幸运的是寒冷的气候使他们的腐烂变得很缓慢，但是看起来还是惨不忍睹。那种景象我每天都要见到很多，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但那些天的记忆让我终生难忘。



▲堆积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囚犯尸体

在另外一座尸山旁，我心里突然涌起了一种无法言状的沉重，躺在尸山上的几百具尸体都很年轻，那挥之不去的青春容颜和抑郁眼神，令我黯然神伤。就在我趑趄趑趄地往回走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宝物：一件驼色的毛外套，随

便扔在地上，似乎是为我准备的。一开始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把它捡了起来，试了一下，很合身，也适用。幸运有时真是只需举手之劳，我把它卷了起来，用行军带捆上，拿着它走到了集中营大门。自从来到了贝尔森，那是我第一次走出集中营大门。

铁丝网的很多地方都被人剪开了，但我要走大门。我囚服去身，阳光重沐，是一个自由的女孩。一到营房限制区之外，我不敢相信我看到

的情景。集中营门外早已春意盎然，树叶已经发芽。在薄雾笼罩的街道上，我们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听鸟儿婉转啁鸣。在料峭春寒的季节里，觅得一粒柳芽，看见一朵野花，人会由衷地快乐。尽管世上有过无数片叶子，尽管一切叶子都终将凋落，此刻我心中涌现出一种生动的感觉，我就要抽出自己生命的绿芽了。

在街道旁、树丛中，在管理得井井有条的院子里，一排排私人住宅时隐时现，那些房子当时已经被盟军征用了。我想进去当面表示谢意。门口有值勤的哨兵把守，但是他们并没有阻止我进入。我走到一间别墅的前门，举手敲门，一些讲法语的加拿大的军官请我和露丝进入他们的房间。我小时候学过的法语还算灵光，同他们自由交谈起来。

在他们偌大的房间之中有一个桌子和几把椅子，桌子上的篮子里盛放着一些十分漂亮的红苹果。我看了看他们，毫不犹豫地向军官们要苹果。一位军官同意给我和露丝一人一个苹果，但有一个要求：很多房间布置有英国国旗，但讲法语的加拿大军官想要法国三色旗，不巧的是他们没有法国旗。那名军官要求我给他们做一面法国旗，他提供了布料、针线。我当即回答：好久没做针线活了，没有把握，但可以试试。我坐下开始缝制。用了很长时间，才将那面很大的法国旗缝制好。我是尽我最大努力来做那项工作的，针脚非常密实也格外结实，把接头多缝了几针，保证旗帜不会磨损。军官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露丝和我带着奖励的红苹果离开了兵营。

当我们返回集中营营房时天已经黑了，我想吃那个苹果，但无从下嘴，无力咬，也无法吞咽，我的牙床破了，喉咙也很痛。身体已经恢复的幸存者们已经在准备返乡的行李，已经解放了的家乡和亲属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归来。

二婶福兰兹和她的女儿露丝已经和母亲与我在同一天进行了登记，她们正在准备返家。她们已经通过红十字会了解到一个情况：二叔大卫和二女儿玛赛尔也已经获救，他们已经回到布拉迪斯拉发的家中了。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他们全家是为数不多的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家庭。二婶福兰兹对我的遭遇漠不关心，只有露丝来看我和我告别。但就在她离开我的一刹那，出乎我的意料，她一把抢去我刚刚在集中营尸堆旁捡到的那件毛衣，自己穿上，然后飞快地离开了。很显然，她认为我不久就会死去。其实，那件温暖的毛衣对我还是有用处的。我由于身体太虚弱无法同她争抢，我摔倒在地上，穿着那件破麻袋片外衣龟缩成一团。

要不是第二天发生的一件事，我就准备躺在那里彻底放弃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卡波-埃塔也来向我告别，她把她的毯子给我盖上了。那条毯子，她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就一直使用。由于她也要返家了，显然她不需要了。埃塔那条“特殊的毯子”是灰黑色，其中掺杂着白条，经过仔细辨认，我发现它是由人发与动物毛混纺的。我知道那些人发有可能就是纳粹集中营囚犯的头发的。

我认为那条毯子非常珍贵，也是当时我惟一保暖的一件物品。披着那条珍贵的毯子，我竟然爬到上铺。我当时发着高烧，正在受痢疾的折磨，我没有力量离开上铺，要是爬回到下铺就没有办法再上去了，解决大小便问题我也无力爬上爬下，只能就地解决。我哭喊着母亲，为自己的被遗弃、孤独、悲惨而哭泣。

我只能待在那里，给人感觉几乎就要死了一般。一些曾经当过医生、护士的囚友当时开始以医务人员的身份在那里工作。我被他们从我的小床上抬下去，送到集中营的诊所里。那个诊所粉刷得很洁白，在集中营一处二层小楼里。诊所里充满了病人，那里没有病床，只能躺在担架上放到地上。担架很干净，床单也比较清洁。我有一条毯子，但我没有用它，我把它叠好和我的木头鞋一同放在我的担架旁。医务人员能为我减轻一定的痛苦，但那里没有药，此外他们工作十分繁忙。

护士给我称体重，我只有29公斤。她们决定：由于我的病情太重，诊所的医疗条件有限，需要将我转到附近城市的一家医院里治疗。经过安排，很快用军用救护车将我送到塞乐，一个离贝尔根-贝尔森最近的城市。我被送到城中的州立医院，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病房，里面有近30

张床位，住满了患病的德国人。我腹部非常疼，叫喊着让人帮忙，可那里的德国护士根本不理我。

我到那接受治疗，几乎没什么效果，她们不给我清洁卫生，也不给我喂食物。也许她们是害怕传染上斑疹伤寒，但我相信真正的原因是我是犹太人。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过来的时间大约是1945年的4月底，那时战争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生命不以为然。我是一个躺在德国医院病床上期待治疗的得重病的犹太人，他们对我一点都不同情，只给我一些鸦片让我保持镇静。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在清醒与不清醒、生与死之间徘徊。一天我清醒过来，看见一位军队的牧师坐在我的床头，他正在拜访病人。随军牧师是西方军队中的一个十分特殊的群体，在炮火硝烟中，在生死诀别时，往往闪现着他们的身影，转达着上帝的安慰。

那位随军牧师穿着英国军服，胸前挂着十字架，手中拿着一本用以祈祷的书。他对我讲英语，幸运的是我能听懂他讲什么。他是一位十分友善的人，他告诉我，他到那里是为了给我做最后的祈祷！他的话使我大为吃惊，尽管病得很重，但也懂得他在说什么，并马上做出反应，用非常礼貌但十分坚定的语气告诉他：我是一名犹太人，是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送到这家医院的。

犹太人不需要基督教的“最后祈祷”，我说：“无论如何，我不能死！”

随军牧师是一位好人，他对我说：“当然，告诉我，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我们开始了谈话。我问他，哪里有犹太教的牧师？

他说：“有的，我们军队有犹太教牧师。”

“好的。”我十分高兴，“能否安排一位犹太教牧师把我从这里带走，我要回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诊所里，因为这里的德国护士根本就不照顾我，我不想待在这个医院里！”他马上冲出去找医生，同他们说了一大堆话，他的语速又快、声音又高，并且讲了很长的时间。

时间不长，一位犹太教牧师和一辆军用救护车来到了医院，犹太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教牧师也穿着军服，那位随军牧师也来了。我被用车送回集中营的诊所，我还请牧师告诉我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三姨艾琳，告诉她我还活着。还好，我仍清楚地记着她的地址——特拉维夫斯宾诺扎大街20号，牧师替我给她写了一封短信。

回到集中营诊所，我和很多病人住在一个病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的是斑疹伤寒。他们整日咳嗽，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所有的苦难都笼罩在我的身上。不错，我们解放了，我们是自由身，但是苦难还在继续，它们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如果我返回布拉迪斯拉发，那里是否还有我的亲人？

原来的一位囚友，温勃格医生，那时负责诊所的工作。他是一位善良的人，来自布拉格，他自愿在贝尔根-贝尔森多待上一段时间帮助病人。由于当时没有药物，他建议给我注射葡萄糖。可是我太瘦，针扎在我的骨头上，令我经常疼得喊出声来。

经常有盟军部队中的英国、加拿大的士兵来看望我们这些得病的幸存者，我就被病房作为一个“特殊的样板”。每当有人来参观，护士或卫生员就往我床前领，她掀起我的被单，让参观者看我骨瘦如柴、布满了脓疱的身体。

一位加拿大的中士，名叫哈里，经常来看我，几乎每天来一次，还给我带来我很久都没看到的東西：爽身粉和肥皂，如同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十分及时。我特别欢迎他的到来。然而，我病情太重，还不能吃哈里送给我的食品。哈里总是鼓励我：“要打起精神，要勇敢地活下去。”那些话对我是莫大的激励。人有时遇到一句话，悟了它，犹如遇到了上帝引导般的一种力量。哈里退役后一直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生活，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

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在我病重的时候，二婶和堂妹离开了。二婶在伦敦的一个弟弟通过红字会给她寄来一个包裹，由于她的离开，交到了我手里。我没有打开，直到几个月后我回到布达迪斯拉发交到她的手里。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整日昏睡，我的命运已交到其他人手里了。我身体太虚弱了，始终得不到恢复，不能从担架上站起来，也无法在屋里走一步，整天无力地躺着，孤单地望着房顶。在外人看来我似乎是什么活的希望了，然而，我知道一定要坚持下去，要活下去。

外面的天气已经转暖，但我病房的窗户还得关着，那是因为集中营堆积成山的腐烂的尸体在散发着臭气，整个集中营都可以闻到。盟军士兵命令德国党卫军的男女士兵打扫集中营，让他们掩埋死尸，将成千上万的尸体埋在沙土和石灰之下。英国人就是想让当地的德国人见证一下“德国文化”的杀人罪证。当地的很多德国人面对事实无言以对，那成堆的尸体就是由他们的党卫军同志杀害的，现在又要由他们装在车上掩埋起来。

官方宣布战争是在1945年5月8日至9^[1]日正式结束的，我获得自由已经近一个月了。到7月，很多幸存者都已返乡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人要全部撤出，集中营要被彻底毁掉。英国军旗没有在集中营的上空飘扬过，一位英军上校解释说英国国旗不能代表残忍和兽性，那是纳粹旗帜代表的意思。集中营的病人也要同其他人一起疏散，集中营要马上关闭，被一把火烧掉，夷为平地。

一天，我痛快地洗了个澡，换上一件干净的医院病号服，带着那条毯子和木头鞋同其他病友一起坐在担架上，乘着救护车来到了火车站。我们乘军用医疗车厢被送到比尔森^[2]州立医院。

[1]5月8日至9日。1945年5月，正当苏联红军已经攻克柏林的时候，5月7日，德国法西斯派出代表，到巴黎以东的兰斯向艾森豪威尔所在的盟军司令部投降，并签订了一个投降书。斯大林知道后不同意，他说：是苏联人民而不是盟国肩负了战争的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法西斯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前签署，而不能只在盟军最高统帅部签署。于是5月8日夜间至5月9日凌晨，在柏林东部的卡尔斯霍尔斯特举行了另一场受降仪式，签约的反法西斯同盟国方面以苏联的朱可夫元帅为首，还包括美、英、法的代表。所以苏联方面宣布，5月9日为欧洲胜利日。

[2]比尔森。捷克西南部城市，相传捷克国王瓦茨拉夫二世创建比尔森城时，那里以酿制啤酒闻名。如同德国的慕尼黑啤酒一样，捷克的比尔森啤酒成为本国人民的骄傲。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昔日不可一世的党卫军士兵——当时的战争囚犯还穿着他们原先灰色的军服，胳膊上佩带白色的标有红十字标志的袖章，还有一些士兵穿着白大褂。那些人不久前表现得还像野兽一样，是他们给我们带来苦难和伤痛，现在却要到诊所接我们，抬着我们上救护车。

在车站上，那些过去折磨我们的人把我们抬到了火车上，我身体太弱也不想向他们表示什么。当他们用礼貌的语言对我们说着什么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只用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们。哎，看看这世界的变化，不知道对于他们，是值得庆幸还是值得哀怜，反正他们对我们的同情有着伪善的气味。

当火车离开贝尔森时，那些前党卫军士兵和我们同车前往，英国人命令他们同我们一路前往比尔森。他们为我们分发食物，照料着我们，为我们打扫卫生，保持清洁与舒服。他们对新的工作倒十分认真，没有半点儿过去耀武扬威的神气，却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

由于长期饥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消化能力不强，还无法适应正常的食物。在车内我们没有力量从床铺上爬下来，也无法去厕所。我们经常把床单弄脏了，更换床单、保证我们舒服就是那些原德国党卫军的工作，他们做那些工作不敢有一点怨言。英军要求他们要把我们干净、安全地送到比尔森的医院里。当我们到达医院时，整个城市仍然被美国部队所占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以啤酒闻名于世的城市。

军用救护车已经在火车站上等着我们了，一个接着一个。那些患病的幸存者从车厢里被抬下来，安全地放在担架上。当德国人抬到我的时候，我由于疼痛而呻吟着。我赤裸的身体上盖了一件医院的病号服，木头鞋和毯子是属于我的唯一随身物品，另外一件不属于我，那是红十字会寄给我二婶的包裹。

当时，比尔森的州立医院十分忙碌，人满为患，他们没有料到接收的是如此棘手的重症患者。不过，我们要承认，大部分在捷克斯洛伐克公立医院工作的护士是信仰罗马教的修女，他们大都是愿意无私奉献的妇女，是认真履行职责的好护士，她们具有强烈的同情心，也十分善

良。当我们到达后，她们也没有想到那些从德国来的病人看起来会是如此恐怖。

她们细心、认真，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她们对刚运送来的病人进行严格的分类，我被送进一个斑疹伤寒传染病的病房。

一位身材瘦长、年龄偏大、善良，脸上充满了慈祥与微笑的护士把我抬到一架轮椅上，她将我送到一个单独的病房。她在病房里的一个单人床旁停下来，对我说：“我亲爱的孩子，你太幸运了，你可以独自使用这张床了。不久前这张床上还有一个人，他刚刚死了。”

按理说，一个人拥有一张床、一个枕头、一个毯子，应该高兴，可我不高兴不起来。刚刚去世的病人正是因为斑疹伤寒去世的，这使我感到沮丧。床单还没有换过，我对此感到犹豫。事实上，我那时有种判断，自己得的不是斑疹伤寒病。因为我不像其他得了斑疹伤寒病的患者那样，有出汗、咳嗽等症状。他们十分痛苦，生不如死。

我决定不听从护士的建议，尽管那张床在等着我使用。实际上，我是担心睡在那张床上会传染上斑疹伤寒病。如果感染不上那种病，拒绝使用那张床将是多么的正确呀！此后，我从来没有在那张床上住过，不管床单是否换过。我就把自己安置在房间墙角的轮椅上，尽管它不十分舒服。我用自己带来的那条毯子盖在身上，皮包骨头的双脚穿着那双木头鞋，安然入睡了。就这样在那张轮椅上待了三天三夜。



▲ 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幸存者在德国军营医院接受治疗

后来医生又带我到X光室去检查，拍了几张X光片后，证实我得的确实不是斑疹伤寒病。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医生和护士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为我治疗了，我不得不更换治疗的病房。罗斯勒教授是负责我的病的医生，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检查，把我安排在皮肤科病房。尽管我的病

得到了确诊，我的心情仍然高兴不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慢慢积攒了一些力量，但我自身的状况还是使我显得很虚弱。事实是孤独一直笼罩着我，尽管护士们对我一直精心治疗，但我还是觉得我的生命并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我去皮肤科病房之前，护士带着我洗了一个澡，我的双膝弯曲着，双腿很难支撑起自己的身体。护士带来一袋粉红色的洗浴液，把它倒进盆里然后调匀，用毛巾将我的身体从头到脚彻底擦干净。

望着镜子里的我，以一种诘问的目光，一会儿看自己，一会儿看镜中，感到十分滑稽，可我笑不出来。我简直不敢相信，镜子里面的人是我。原来丰腴的胴体变得如同骷髅一般，肿肿的眼泡，牙齿在嘴里齙着，头颅上长着短短的头发，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当我用手摸头时，头发掉下来沾了一手。

医院又给了我一件病号服，护士用轮椅将我推到一个干净的床上。在皮肤科病房里，我是那种不知道是何病因的患者。在那里，我很快发现女患者大都得的是性传染病，她们都是被强奸的受害者。战争期间到战争结束后，比尔森驻扎过许多国家的军队。

在我的病房里，只有一位妇女除外，她和我一样得的不是性传染病。她的病床与我的相邻，名字叫波兹娜。她是一名理发师，由于在工作中接触了化学药剂，手上得了湿疹。她举止温柔娴雅，笑容甜美，身材适中。波兹娜看到我时，感到十分震惊。我是这位天主教女性见到的第一位犹太人，她看见我的病状不明白：“尽管我们宗教不同，可我们不都是人吗？”她是我在战争以来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朋友。

每天都有人来探望波兹娜，她愿意同他们待在一起，品尝着他们带来的自家制作的食品。医院的食物很平淡，还有数量限制，我对医院食物的认识说明我已经开始有了食欲，那是身体逐渐恢复的一个迹象。

我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自家烹调的食物了，波兹娜显然注意到我的眼神注视着母亲带来的食品篮子。那个篮子飘着食物的香味，触发了我

鼻子上的神经。我看见了洒着黑胡椒粒的饺子，那正是我在集中营梦想得到的食物。

波兹娜总是把她家里带的食物和我一起分享，饺子是我食谱中“皇冠上的明珠”，我特别愿意吃。看着满桌的好东西，肚子早就骨碌碌响了。尽管我的胃口在慢慢恢复，但我还不能吃得太多，只能小块地咀嚼。令人高兴的是，我可以吃一些“正常”的食物了。

我不能够下床，我的双脚因为水肿有些膨胀。看着水肿的脚，我担心有一天肉皮要绽开。我身体的其他部位长了很多红疹，但我的体温正常，我的头脑清楚。

我因体质非常虚弱而躺在床上，但同时又格外健谈，经常同波兹娜长谈。我知道，一个死气沉沉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享受生活。只有不断和人们交流的人才可以改变一切，因为，与人交谈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之间的话题是沉重的，刚刚获得解放的我，需要倾诉，需要安慰，需要排解，需要摆脱。

一天，我跟波兹娜一直聊到凌晨。我告诉她，在往事如烟的岁月里，我所经历的一幕幕悲剧，不止一次地痛苦过。我从孩提时代聊起，几番诉说，几番眼泪，从纳粹驱犹、杀戮谈到我的姐姐被抓，从集中营谈到父母的去世，从死亡行军谈到身患重病，从德国纳粹的兽行谈到盟军的解放，从过去的生活谈到我做服装设计师的理想。

人类永恒的美好情感像空气和水一样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失去它们，世界将变得难以想象。波兹娜总是静



▲ 生活在比尔森的波兹娜和女儿波斯拉娃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静地坐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凝重地望着你，阅读你的心灵，然后用她的神情告诉你，她在关心你，理解你；她用朋友特有的温柔、温馨、温情将你心头的一团乱麻整理得井然有序。

波兹娜的关怀不仅流露在脸上，也发自于肺腑。关怀真是魔力无穷的精灵，你的境况没有丝毫改变，可只要听了几句关怀的话，就使你在灾难的打击中得以解脱，走向阳光明媚的晴空，让你摆脱黑暗混乱的胡思乱想，走向光明与理性的思考，天地豁然开朗，整个世界就变了样。

纳粹的折磨毁坏了我的身体，医生的技术治疗了我的肌肤，人性的、爱的力量医治了我的心灵。同波兹娜谈话十分重要，因为那可以帮助我与已失去的世界重新建立联系。两周后，医院通知波兹娜，她的病已经治愈，可以出院了。出院那天，她穿戴好，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停当，含着眼泪坐在我的床前和我话别。她充满友爱地提示我：要做一个乐观者，乐观者要“向前看”；要把眼光投向雨过天晴的未来，从而怀抱一种希望，坚强地活着。她坚信我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听着她振聋发聩的话语，看着她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的感激。我对她说，记住了她的嘱托，会坚强地活下去。面对我的回答，波兹娜笑了。那种微笑出自内心，也因此更加动人。然后，她悄然地离开病房，消失在医院走廊的另一端。

看见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离开，看到她眼含泪水、轻咬朱唇的样子，我脑子里翻江倒海，浮想联翩——朋友能给你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感动；尤其当你身处逆境时，朋友就是安慰，是力量，是自信，是安宁。朋友能使你品味人生，享受人生；朋友是一本好书，你要用一生的时光去阅读，要经过风风雨雨才能读得懂。

只过了几分钟，波兹娜又返回来了。她径直走到我床前，对我说：

“奥尔佳，拿上你的毯子和木头鞋，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里，我要把你带到我家去，和我住在一起。”这对我简直是一场梦，我不知道如何是好。犹豫了一下，我们把罗斯勒教授叫来，征求他的意见，询问能否

出院。他对我进行了一番检查，同意我出院。

当时，一个体重只有32公斤、体质仍然十分虚弱的我，穿着那双木头鞋，卷起那条毯子走出了医院。我那双注水的脚穿着一双宽大的鞋，那双脚走过几百公里冰雪之路，经受过严冬的考验，在波兹娜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走出了第一步。我是和朋友一起回家。波兹娜住在一个旧式建筑第一层的“独门独户”的公寓里面，她的房间同时是她的卧房、起居室、厨房。

一张双人床紧靠在墙边，房间里还有一个小型沙发，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在墙角还有一架火炉，一个有自来水的水盆。在门外的院子里，是一个公用的厕所。我们到达她的公寓时，房间看起来很干净，床单整洁，被子舒服。我和波兹娜睡在一个床上。那时我的身体还是很虚弱，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折腾，我穿着背心马上睡着了。

波兹娜又回到她的理发店去工作了，但在她去工作之前把我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她走的时候我还在睡觉，她就把我关在屋里。大部分时间我躺在床上，偶尔上一趟厕所，但是十分困难，有时得手脚并用爬着出去。波兹娜总是买些食物带回家来，那时食物比较紧缺，只有用购物券才可以在黑市上买得到。

波兹娜用流食来喂我，饺子在每天的食谱上都有。她是一位制作捷克饺子的高手，饺子十分好吃。她还告诉我她家传的秘方：“不能用刀来切饺子，那样会把饺子压扁了，破坏饺子的造型，要用一根白线来切。”波兹娜是一个脾气好、性格开朗的姑娘，为了让我开心，她跳舞，教我唱歌，我也通过歌曲温习了我的捷克语。

波兹娜每天外出工作，我有了宽裕的时间，准备同那里的犹太人办事处取得联系，弄清楚如何才能回到我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家。波兹娜搞到了我要联系的办事处的一些资料，问题是怎样到办事处去，穿什么样的衣服去。

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衣服可穿，总不能穿我的病号服去吧。尽管当时已经是1945年的9月了，天气还比较暖和，我把那条很薄的灰色毯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子拿了出来，它在贝尔森集中营到比尔森的列车上一直陪伴着我。我仔细地端详一下毯子，觉得不再需要它了，可以把它剪裁一下，缝制成一件衣服。

主意就这样定了，说干就干。我把毯子铺在地板上，先斜着裁出一条裙子，每边留出一个裙衩。裙子裁完后，剩下的毯子已经不够做上衣了，但还够做一件无袖的夹克。随后几天，我精心地缝制那件衣服，衣服很快缝好了，看起来还不错，担心的是裸露在外面的胳膊和皮肤，是那樣的瘦骨嶙峋，没有光泽。几天后，我离开房间，到外面走走，换上刚缝制好的新衣服，有了一些信心，尽管没有新鞋和袜子，穿的还是在集中营穿的那双木头鞋。

就这样，一步三挪，我来到了比尔森的大街上。但还必须时时小心，脚还肿着，腿也没劲。当我试图把膝盖挺直时，人马上摔倒在地上。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勉强站了起来，扶着路边的可以抓到的东西，尝试着走着。我是特别在意别人是怎样看我的！看着我一步一晃的姿态，有的人会认为我喝醉了，有的人会认为我是流浪女，总之，我自己就觉得我不十分“正常”。

我们就那样步履蹒跚地来到犹太人侨民的办公室。那个房间不大，稀稀落落地摆放着几件家具，一张老式的桌子和一把椅子。那里也是一个附加住院补贴医疗保险的办公室。坦泽尔太太是位捷克犹太人，她负责那里的工作。了解我的情况后，她毫不犹豫地表态，要为我提供帮助，答应为我们搞两张火车票，一张给我，一张给波兹娜。我克制住内心的激动，但心里也极为担心，自己也解释不清，为什么如此想家。我猜想，心里一定是闪烁着希望的火花，在想家里的亲人也许有人活着，也许有人已经平安地回家了。

知道我二婶已经回家了，我就给布拉迪斯拉发的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告诉他们我还活着，马上就要回去，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回音。那深深地刺痛了我，有一种被出卖与抛弃的感觉。当时如果没有波兹娜的鼓励，我会对人性丧失信心和希望的。

CABLE AND WIRELESS LIMITED.

INCORPORATED IN ENGLAND.

The first line of this Telegram contains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in the order named:—
Prefix Letters and Number of Message, Office of Origin, Number of Words, Date, Time handed in and
Official instructions—if any.

Circuit.

Clerk's Name.

Time Received.

HF G

OFFICE OF ISSUANCE
JAN 19 1945
TEL-AVIV

DAXV755/BH BRATISEAVA 51/50 19 1520 VIA IMPERIAL
DLT KAREL ROTH TELAVIV PAL SPINOZA STR 20
I RETURNED FROM BELSEN LAST MONTH STOP ALLREADY
SENT A TELEGRAM AND WROTE TO YOU BUT DID NOT RECEIVED
ANSWER STOP I AM IN GOOD HEALTH DONT WORRY ABOUT
ME MANY KISSES

OLGA AND TOMI OLGA ROSENBERGER
BRATISLAVA REICHARDOVA
28 C/O BARTON

MARK YOUR REPLY *"Via Imperial"*

ANY ENQUIRY RESPECTING THIS TELEGRAM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THIS FORM AND MAY BE
MADE AT ANY OF THE COMPANY'S OFFICES.

▲ 奥尔佳给家里发的电报，告知自己一切都好

一天，我收到弗瑞达姨和巴多斯姨父的来信，他们是我舅姥爷的孩子，也刚从塞森施泰特集中营里被解放出来。弗瑞达是从我家族的亲属那里知道了我的下落，知道我现在被困在比尔森。他们告诉我，家族的其他人无法来接我，也无法给我写信，因为那时接近犹太人的逾越节，弗瑞达和巴多斯邀请我尽快去他们家。那对我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好消息，那一刻，我才相信世上还有人想照顾我。

那些日子，但凡一动回家的念头，就孩子似的激情难耐。波兹娜准备陪伴我一起去布拉迪斯拉发，我拿到了火车票，确定在1945年的9月中旬启程。波兹娜的生意只好打烊，她也十分愿意去布拉迪斯拉发，因为她从来没有去过那座城市。她原来承诺过要把我安全地护送回家，她

第八章
回家历程

99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要履行那一承诺。她对我说：无论在哪个年代，坚守承诺始终是支撑人性的基石。对人如此，对一个民族更是如此。

穿上我制作的灰色套装，无袖的夹克，那双木头鞋。没有行李，孑然一身，身无长物，两手空空，也不担心我的秃头了。当时我知道自己十分丑陋，特别是旁边站着光彩照人的波兹娜，她的形象同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我要乘车先抵达布拉格，在车站里我们要等一会儿，有当晚换乘去布拉迪斯拉发的火车。在车站，倘若你早到了两个小时，你就得耐心地等两个小时，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不能指望火车会早开半分钟。

那一天阳光明媚，我们在火车站对面的公园里等着。坐在草坪中的长椅上，那是一处休息的好地方，在那里等着下一趟车。我们坐着，聊着，看着人们从面前经过。布拉格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军人，他们大部分是苏联红军，也有美国和英国士兵，他们都在享受着布拉格古老悠久的历史和城市之美，受到热情好客的解放了的捷克人民的欢迎，捷克人在德军占领期间受尽了苦难。

一个穿着笔挺军服的苏军军官在长凳前停了下来，与我们一起闲聊。波兹娜问军官当时的时间，军官把军装的袖子撸了上去，出乎我的意料，他的胳膊上戴着十块表。波兹娜一点都不腼腆，她认为军官没必要戴十块表，就大胆地向军官要一块。“好”，军官说，“没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但你要先陪我出去见我一个朋友。我在和他打赌，赌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找到一位女朋友，你就装扮成我的女友。”波兹娜爽快地从长椅上站了起来，陪苏军军官去见他的朋友。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功夫不大她就回来了。她让我看了苏军军官给她的一块漂亮的金表，那是她假扮军官女友得到的礼物。

当晚8点，我们上了火车。尽管是辆客车，但车上没有车座，只搭了一些长条木板凳。我太累了，也顾不上板凳的不舒服，很快就睡着了。那辆车尽管也不太舒服，但同我们过去乘坐过的拉牲口的火车相比，还是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九章

回到布拉迪斯拉发遇见约翰

第二天清晨，我们到达了布拉迪斯拉发，令我惊奇和高兴的是我的表弟汤姆斯到车站来接我。同我一样，他也免遭集中营的劫难，刚被解放出来。我和汤姆斯一见面，紧紧地拥抱了好久，两人都泣不成声。经过一年的分别，我们终于又团聚了。一年来，他几乎天天以泪洗面，不断地猜想父母是否还活着。当然同我一样，他也成了孤儿。汤姆斯在集中营受尽折磨，亲眼看见许多无辜的人被屠杀，至今想起心里都颤抖。他在德国党卫军眼里是个瘦弱的男孩，他们任意嘲笑他，耍弄他。动不动就毒打他。因为他骨瘦如柴，他们都懒得动手打，一脚就可以把他踢出几米远。那些年里，汤姆斯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好的，鞭痕棍痕，纵横交错。进集中营后，他患了颈部淋巴结核，因为得不到治疗，结核块溃疡，脓血糊满了衣领，变硬的衣领又不断磨擦结核块，加剧了溃疡。

一天，一个德国兵看押他时，看见他脖子肿胀得厉害，就带他到集中营的医务室治疗。那个医生用深凹的蓝眼珠子注视了他一眼，那眼光充满了鄙视。德国医生抓起一把剪刀，压住他的头，上来就是一剪刀！剧烈的疼痛使得他浑身颤抖，忍不住大哭了起来，却丝毫没引起医生的些许怜悯。他在没有麻醉、没有消毒的情况下，被活生生用剪刀剪开脖子上的结核块，把脓血硬挤了出来。犹如酷刑的治疗结束后，那个混蛋医生竟然觉得是他的恩赐，要汤姆斯谢谢他。汤姆斯头一扭，捂着脖子，哭着跑回牢房，身后传来一阵大笑。没有几天，结核块又开始溃疡，那次溃疡面积比上次还大。他还时常受高烧的折磨。

18岁的小伙子却还像个15岁的男孩，发育几乎停止在进集中营前的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水平上。瘦弱得皮包骨头，脖子上的淋巴结核成片的溃疡，整天淌着脓水。因为长期与世隔绝，汤姆斯只能终日默默无语，显得更加神秘和孤独。至今他说话都不太流利，残酷岁月的痕迹刻得太深，太痛，以至影响了终身。

集中营，那个和法西斯联系在一起的名称，在汤姆斯面前展示了一个血腥残暴、杀人如麻的场面。他亲眼目睹过德国纳粹屠杀手无寸铁的犹太人，看见一个个苏联战俘走进一个大房子“洗澡”后，再没有活着出来，他们被毒气活活毒死。记得有一次，德国兵当着他们一群孩子的面，打断了一个10岁的女孩的手臂，然后又让那痛哭惨叫的女孩，用自己的断臂一铲一铲为自己挖一个坟坑，惨无人道的德国党卫军用大皮鞋将那个受尽折磨的孩子踢进坑里活活埋掉！所有的罪名就因为她是犹太血统的女孩。至今，那“扑通扑通”的盖土声还常常盘旋在汤姆斯耳边，只要想起来，他的心就阵阵颤抖！

弗瑞达和巴多斯在照看着他，他们住在瑞查杜瓦尤里卡一个多层的时髦建筑公寓里。他们的家在四楼，要走很长的一段楼梯才能到达他们的家。那个楼里没有电梯，他们当时住的房间用现在的标准来描绘就是一个“单人房”，但是有一个很大的起居室、一个小厨房，厨房里有一个小壁橱和一间洗漱室。汤姆斯原本可以到他的父母原来的房子里去住，但当时他家的房子已经被陌生人占有，汤姆斯也不愿意和陌生人住在一起，姨父一家又是热心肠，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享受自己家做的食物。

姨和姨父是一对非常好的人，他们看见我的时候十分震惊，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使我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他们的女儿朱丝同丈夫吉诺住在一起，他们也精心照顾我。我睡在他们的床上，波兹娜睡在厨房里铺着的床垫上。尽管我当时已经回到了家里，可常常是担惊受怕、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同别人讲话反应很慢，还有防着别人的心理。我试着帮助那个家庭料理一些力所能及的杂事。那些年来，不是躲藏就是被纳粹追

赶，要不就是在集中营里遭受磨难、惨遭非人虐待，身心受到的创伤需要时间才能愈合。上帝保佑我，赐给我像波兹娜、姨和姨父那些精心照料我的人。

波兹娜同我一起呆了三天，她就要返回比尔森了，我真是不愿意她离开。她怀着博大的人道情怀，心中闪烁着慈善的光芒。几周来，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关心我，已经建立了十分亲密的感情。我向她保证要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回去看望她。我怎样才能回报她无私的人道主义和对我真诚的爱？对我来说，她就是圣诞老人。说再见难，我们紧紧握手，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姨父巴多斯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挺古板的一个人，讲话做事规规矩矩。从塞森施泰特集中营返回家之后很快就恢复生意了。他的生活很富裕，对钱不吝啬，十分大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翩翩绅士。姨弗瑞达也是受人爱戴的人，她喜欢烹调，饭做得很好，我由于很长时间都吃不饱、吃不好，她的精湛的烹调手艺和精美的食品一下子就让我长胖了，有力气了，她做的食物我都非常爱吃。

返回布拉迪斯拉发后，睹物思人，我又想起了当初父母为了躲避纳粹的搜查，将家中的财产都托人保管起来，那件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去拜访以前的朋友和邻居，也去看了我家坐落在斯皮塔拉斯卡尤里卡大街的老房子。当我看见住过的许多年的房子时特别吃惊。住在我们家的一些房客有一些住在这里，还有一些人搬走了。我希望能搬到那里的一间房子里住，但是他们告诉我不可以，太挤了，没有能容我住下的一间房子，我只能到其他的地方去住。我感到了巨大的伤害，但很难表达出来。我从奥斯威辛、从贝尔森集中营幸存下来，但是别人告诉我，你不能住在你自己家里。所以，我转身走了。

在院子里，我看到了我十分喜欢的脚踏车，它被搁置在一旁，但仍可以使用，轮胎也没有损坏。我骑上它，沿着小路回到瑞查杜瓦尤里卡姨父家中。有家难回。我从此再没要求归还斯皮塔拉斯卡尤里卡大街老房子的事，我生活的那段篇章已经结束。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战争给人们带来很多可怕的事情。父母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委托莎嘉夫妇看管，当我去拜访他们并想要回我父母托他们照看的東西时，莎嘉夫人，当时已经是尊贵的“伯爵夫人”了，她用眼睛看看我，面无表情地说：“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全被苏联人抢走了。”

伯爵夫人或许以为，我听到那番话后会马上离开。就在那时，我注意到一尊瓷像摆在壁炉上面，图案是老牛与小牛，那件艺术品是父亲有一次去哥本哈根时买的。我告诉夫人那件放在壁炉上的文物就是我家的，然后平静地走过去，把它拿在手中。后来我还看到那位夫人穿着一件皮大衣，我对她说那是我母亲的，但我没有强行要她脱下来。类似的事情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好人还是应该记住的，有两位年长的夫人，她们听说我从集中营幸运回来，就过来看我，并把我母亲托她们保管的刺绣桌布和床单带来了。她们的举动不仅让在场的我的亲友们吃了一惊，也令我意外了一下。那两位女士都有艺术造诣，来自德国的文化圈。她们希望我帮助她们。战后德国的后裔要被强行重新安置，要从捷克斯洛伐克被驱逐出去。她们十分害怕被驱赶到德国，希望我能给她们写一个证明，证明她们不是纳粹，在纳粹占领期间她们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过帮助。

我写了，她们没有被驱逐，还同她们的家庭待在一起。还有一些人归还了父母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些东西。母亲曾经十分相信一个叫丹尼尔的裁缝先生，让他帮助保存几丈布。由于我不需要那些布了，我把它给了弗瑞达姨和我表姐朱丝。我自己保留了一匹蓝布，丹尼尔先生为我缝制了一件十分漂亮的衣服，还用海军呢为我缝制了另外一套衣服。就那样，几乎是一夜之间，我旧貌换新颜了。

我的三姨艾琳从巴勒斯坦给我回信了。我很早以前给她写过信，她寄给我几包衣服和一些钱。生活在逐渐恢复，我已重新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我三姨艾琳的一个亲戚叫马索，是一位在捷克军队服役多年的士兵，当时驻扎在意大利，他寄来了几箱桔子和大米。我和其他亲属把那些好东西都分了，还寄了一些给住在比尔森的波兹娜。

生活中若没有朋友，如同没有阳光一样。我重新和以前学校的一些朋友建立了联系，所有出现的人都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我的伙伴们遍布家乡的角角落落，只要一声呼唤，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一般聚拢在一起。他们是古瑞塔、爱丽丝和爱娃。他们的父母也都不见了，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有太多的相同之处。我们成为一个关系极为密切的团队，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以色列的逾越节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烦恼。我们参加了第一个纪念活动，为死去的亲人祈祷是活动的主要内容。当祈祷者回忆起战争年代时，我们的心都要碎了，泪水从我们的脸上流了下来，很多人呜咽着哭泣，我恨不得马上从地球上消失。是呀，战争创伤的愈合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有些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

然而，从身体上来说，我正在慢慢恢复。尽管我的双脚在晚上要缠上绑带，以便让它们消肿，但也在慢慢好转。头发也长出来了，长得密而且弯曲，甚至还比以前黑了很多。尽管我自己仍然感觉很丑陋，但是穿上我那件和服式的衣服，配上我三姨艾琳从巴勒斯坦给我寄的那双鞋，我就感到有信心了，也经常鼓足了勇气到外面散步。

我恢复了以前的习惯，和朋友沿着多瑙河河畔旁的小路散步。傍晚，静静流淌的多瑙河被照得通红闪亮，真有点童话世界的意境了，仿佛河里马上就会蹦出好些快乐欢腾的小精灵。在市中心闲逛，整整十几年的记忆把我的思绪与那里的一切连接在一起。但我不能完全陶醉于美丽的风光，因为那个城市给我太多的痛楚。脚下行走的街道，几年前我同父母和姐姐经常光临，当时虽然我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但毕竟我的家庭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孤独的人了。我知道，上帝从不创造孤独，我之所以感到孤独是德国纳粹制造的。

姨和姨父他们全家对我的爱使我逐渐摆脱了绝望和孤独。他们是好人，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十分需要他们的帮助。尽管人类的同情心是那样的淡薄和脆弱，但是，惟有同情心、理智和道德准则才能使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过了几天，我又经历了另一件让我吃惊的事。在塞尔德集中营有一位朋友叫雨果·戈斯曼，他突然来找我。在我和母亲乘火车离开塞尔德的那一天，他曾送给我们烤鸭，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过他一定会来看我的。他来了，机械般地伸出手，只经轻轻地一握，脸上的表情就变了，可怜的小伙子已经是不知所措了。见过我之后，他心里立刻后悔了，我当时不是当初他记忆中的1944年在塞尔德时漂亮的姑娘了，他肯定是在看到我之后受到严重的刺激。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消失了，没有一丝的留恋。

后来我知道他离开我的原因后，稍微感到有些别扭。不过，生活的经历告诉我：对一些人有些事感到不可思议时，先从好处想想，不能苛求别人，也不可期望事事完美。他离不离开都不重要了，在那惨绝人寰的年代，有那样一份真挚的感情尘封下来就已经足够了。我时常记得戈斯曼在塞尔德中转营对我的关照，还记得临行前他送给我的烤鸭，我仍然相信当时他脸上的表情是真诚的。

我并不怨恨戈斯曼，环境与时代的更替给予了人性变换的色彩，使人很难深究人性的底蕴，但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他也许不是个坏人，那都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有时环境是抵抗不了的，环境是一个心思诡谲的巫婆，但她的眼光是“实际”。人在这个世界里，又偏偏克服不了“实际”，所以他一转身便不知去向了。感情那个东西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勉强，相信不知去向的戈斯曼也一定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好！

我还到卡利弗镇和塞拉镇外祖母家去看父母的财产和我外祖母的房屋，其结果是，到卡利弗镇的家令我十分失望，而塞拉镇的家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些人看见我时应该不好意思才对，可他们哭丧着麻木的、利欲熏心的脸，见到我像见到仇人似的——那些人真是不可思议。

当初，那些从我的父母处租借财产的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那些财产已经不属于我们家了。他们在前斯洛伐克统治时期就将财产买下了，理由是他们相信我们都死了，没有人会回来认购那些财产，所以他们

举家抢房，鸠占鹊巢。那些自己编排的故事自然都是无稽之谈，我离开了……

在我乘火车去塞拉镇外祖母家的路上，我头脑中充满了对外祖母的幸福回忆。当我到她家时，我几乎不认得了，面目皆非。小时候我们玩游戏的小院当时由祖母伺弄得十分整洁，但当时已经遭到了洗劫，长满了野草。房子已经被炸弹轰炸过了，窗框和门已经被人拆走了，前门被石头堵上了，下面还有很多人屎，我连院子都没有进去。人们把垃圾堆放在那里，除了垃圾那里没剩下别的什么。我外祖母当年被驱逐之后所有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个犹太家庭从此变得一无所有。我感到战前的生活已经一切皆无，一切美好都被反犹太行为、被仇恨、被贪婪所摧毁。

整个城市还处在战乱的恢复时期，人们虽然不用挣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但仇恨与贪欲那些从人类一出现就伴随至今的丑恶现象，仍然漫布在那片土地上。面对着毁灭的家园、惨死的亲人，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人们该如何抉择？如何去看待“生命”和“友情”？究竟什么是“善与恶”？

面对善与恶，我再一次想起几个月来储藏于内心的那几句话：芸芸众生，世界上有波兹娜那样善良的人，我忘不了波兹娜的点点滴滴，她把无私的爱浇灌给你，把生命意义的信息传递给你，把善良对比着贪婪一起呈现给你，在她清清爽爽的妆容下，你能看到她没有心机却有心智的坦然，她善良的外表下是虚怀若谷的柔情。波兹娜明明知道她给予的爱，我是无法回报的，她还是一如既往，她根本就不屑回报，有那样的人做你的朋友是你天大的福份，我愿意用一生的体温去捂热我们之间的情谊。

善良更使我感悟到真正的贪婪。世上最累的人，莫过于靠贪婪过日子的人，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是不可饶恕的行为，它吞噬了那些人本来就少得可怜的人格。贪婪是人生百态的一种，折损着人的本性，使人成为物质的奴隶。在贪婪的背后，是欲望的不断扩张，扼杀了人们的灵魂和道德。

这些都是我成长的那个时代带给我的对善良与贪婪的感悟。关于贪婪，我实在不愿意再想它了，太伤脑筋。我愿意想的是战争的残酷激发了人类心灵中善良的一面，是在那些惨痛经历的背后，人类永恒的爱情、亲情、友谊和理想。正是那些美好的情感让我得以在灭绝人性的杀戮之外看到希望。生活在黑暗年代的人们，虽然生命的步伐匆匆，但是感人的故事始终在历史沉重的帷幕上闪烁着光芒。它就像紫罗兰的花香，轻轻弥漫着，仿佛在说着：请相信，世界是美好的。想到这，我转过身去，走向火车站，乘下一班车回家了。

我想返回学校，重新拾起未完成的学业。已经有四年了，我不能坐在教室里学习。我被学校拒绝了，因为我曾经在一个德语学校里读书。我的朋友格瑞塔也想试一试，她参加了两次考试都没能通过。再清楚不过了，我在布拉迪斯拉发什么都没有了。我家里原来所有的财富和梦想都化为灰烬，对我来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没有前途了。我计划着去巴勒斯坦，但是需要一笔钱，我不得不去找一份工作。

一个装修公司的老板为我提供了一份业余的工作，一天只工作几个小时，薪水也不高，但它也是一份工作，工资还可以维持我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我恢复了工作的信心，但那位已婚的经理对我有不良的企图，他总是指使着我，让我干这干那。他坐在宽敞精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有时他故意用身体接触我，使我感到格外不舒服。我不得不要求一位一起共事的女同事和我一起待在店里，那样我就可以避免和经理两人单独相处。

其实，有教养和风度的男性常常会以风趣、幽默、随和、自然体贴等方式去与女性交流与交往，也因此会获得女性的尊重和喜爱。当然，女性也要明白，无论是公司老板还是其他的男同事，在那方面丢面子的是他不是你，要勇于撕破脸皮，即便是丢了工作，也不要委曲求全出卖人格与尊严。

一找到工作我就在筹划如何去巴勒斯坦，我到布拉迪斯拉发一个负责犹太人移民的办公室打听情况。他们告诉我一个可以移居巴勒斯

坦的办法：同在捷克军队服役的单身军人代理结婚，护照上就有了“新娘”的身份；等他退伍后可以同他一起返回巴勒斯坦。

我想那是一个好办法，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加入了基布兹^[1]社会，要在应许的乐土^[2]上开始新的生活。当时，我身上已经长了一些肉了，头发也长了许多，自我感觉漂亮多了，但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弗瑞达姨催促我尽快去看医生，但她知道我不愿意去。在我心里仍有奥斯威辛“死亡天使”门格尔的影子，特别不愿意去看医生，更不愿意一丝不挂地站在医生面前，我的态度是等待身体自己慢慢恢复。

就在那时又发生了一件影响了我生活的事。战后，人们在全欧洲范围内寻找他们失散的亲人，很多人找来找去，最后不得不放弃，因为他们是家里的唯一幸存者。有一位同样处境的年轻男子叫米奇，是我的女友格瑞塔的哥哥，他参加了英国军队，驻扎在巴勒斯坦，后来到皇家海军服役，他是整个舰队唯一的犹太人军官。他是一位十分称职的电器工程师，来布拉斯迪拉发时，穿着白色的海军军服，特别引人注目。我们计划去参加一场舞会，那使我极为兴奋，要知道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外出活动。

格瑞塔和我忙于制作一件跳舞的正式礼服，她做了一件黄色的，我做了一件粉红色的，两件衣服做得十分考究和漂亮。我们对自己的手工十分满意，穿在身上总算恢复了几分风采。我的表姐朱丝和她的丈夫吉诺是我们的舞伴。舞会是在一个剧院举行的，那是战争结束以来在当地举行的第一个“正式”的舞会。

所有的男士都穿上晚礼服，女士们穿着长长的跳舞的裙子。舞厅布置得格外富丽堂皇，还有一个小乐队在伴奏，气氛很是浪漫。年轻的小伙子们一个个过来向我鞠躬，邀请我跳舞，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那

[1]基布兹：希伯来文，意为“共同屯垦”，是一种独特的乡村共同体，致力于互助与社会正义，是基于财产共有形式、平等以及合作生产、消费、教育等原则的社会经济体制。

[2]应许的乐土：圣经上的话，指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子孙的迦南乐土。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样的场面。

我以前没有跳过舞，两条腿还在发抖。朱丝开始实施她的“计谋”，有意安排我与她朋友艾迪斯的弟弟见面。我对那个人印象一般，不同意在那种场合见面。可那位年轻人吃了闭门羹并没感觉丢面子，相反他信心十足，锲而不舍，提出以后会给打电话邀我出去。

几天后，电话铃声响了，是艾迪斯的弟弟——约翰·霍拉克打来的，邀我去看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坐在一起，一边看足球比赛一边天南海北地聊天。起初我们都有些尴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甚至有几分忐忑不安，一个劲儿低头喝饮料。约翰心情不错，除了小心翼翼地应付所谈的话题，还不痛不痒地评论着比赛。约翰是一位懂礼貌、十分成熟的年轻男子，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我们谈起犹太人的灾难，有不少共同语言。战争期间，他由于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躲藏地而幸免于难，共同的经历使两人产生了说不清的互相同情。时间不久，我们就一见如故了。实际上，他十分幽默，总能逗我开心大笑，与约翰的第一次接触就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

约翰有一个表弟叫奥图，当时正患牙疼病，约翰请他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吃饭。爱情的确是一种缘分，大家在一起十分开心。奥图也忘记了他的牙痛，他在那里结识了我的女友格瑞塔，两个人很快坠入了爱河。经过三个月的接触他们情笃意挚，很快就结成了伴侣。直到现在，他们仍然相亲相爱，那是非常般配的婚姻，两个人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我们这些失去一切、失去家庭的幸存者对待婚姻的态度都十分相似，都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结婚，建立新家庭。我们为什么渴望结婚？为什么渴望家庭？我的回答是理智的：我们人人都是孤儿，人人都希望有人爱，有人疼，有个什么东西管着你，有人保护你。可父母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无法成为保护我们免受人世间种种苦难的可靠屏障，我们想，婚姻和家庭可以。

约翰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细看他的面孔，他的脸型，他的眉毛，长的都极其标准而且生动。尤其是他那一双眼睛清澈见底，超出常人。

他具有孩子般的乐观态度和善良的天性，那种对生活的善待，一般来说就是一名男子丰富内心世界的可靠标志。而像约翰那样的男人，在他的内心里，世界永远如此清新地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周围所有的事物都打上了爱的烙印。在他看来，人应该永远生活在爱的世界里。生活中的失意和痛苦都是难免的，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是不应该将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与生活中的失意作斗争上。和那令人陶醉、芬香的迷人世界比起来，生活中的痛苦是微不足道的。约翰是那样思考，也是那样生活的。

与约翰约会，他滔滔不绝，妙语迭出，使你在不知不觉中已为他所吸引，心如撞鹿，最后无条件地折服。他热衷于组织一些聚会，由他牵头，找上三五个知己，畅谈生活和人生诸种问题。像那样的聊天聚会，约翰无疑每回都成了主角。他凭借出类拔萃的口才和说话时手舞足蹈的表演才华，让在场的人几乎插不上什么话，即使其他朋友里公认口才最好的佼佼者，在他面前也会变得沉默寡言。

两颗年轻的心不需要过多煽情的表达，共同的大屠杀的经历是最好的催化剂，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得更近了。我和约翰相互吸引，心有灵犀地陶醉于花前月下。天下所有的爱情都有一样的开局，除了甜蜜还是甜蜜。我们之间的爱情就那么一天天滋生暗长着，谁也说不清具体是因为哪个话题、哪个眼神、哪一次亲密的接触。如果两颗心之间有着真正的万般柔情，就能够化为丝丝红线，看不见，摸不着，但感觉得到；只要有爱，只要两心相悦，就能把两人牢牢地系在一起。

夜深人静独自一人的时候，我把自己和约翰接触的每一个细节如同放电影一样一幕一幕过堂，真真切切的爱体现在真真切切的接触当中。他是一个饱经战争磨难的青年男子，他向我表达了他心底里所有的爱意。在我面前，他热情似火，呈现出坚定稳重的一面。那样的男人你是抗拒不了的，况且，一个女人要是拒绝那些，那她到底要找什么呢？但我还是要含蓄一点，要等待，等待有一天，他对我说：“我最想牵的是你的手！”

恋爱期间，含蓄的时候越多，激情的时候也就越多。我们尽情地挥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洒着情感和浪漫，流连着当时，憧憬着未来，尽享着爱的霓虹与雨露，幸福是唯一弥漫的空气。最后，一天晚上，他突然提出一个问题：能否嫁给他？于是我感觉到一束灼热的目光，从头顶轻轻而来，显得分外的缠绵。我的脸便像窗外初升的月亮一般偷偷地亮了起来。我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同意了他的求婚。皎洁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在房间里，影像斑驳，光怪陆离。我们就那样依偎在春天的呼吸里，久久地不愿离去。我们都觉得相爱真好，活着真好。

在经过六个月的接触后，我们于1946年9月15日登记，在1947年2月9日结婚。那一段时光，天空是蓝的，河水是满的，日子是甜的。我庆幸那些噩梦般的遭遇没有让我对生活丧失勇气，我真的十分幸福，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曾经有这样一句老话：上天对每个人都很公平，在对一个人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为他打开另外一扇窗！如果说集中营让我失去了幸福的少女生活的话，那么上天让我得到的便是那幸福的婚姻。我就那样算计着自己的婚姻，沉沉地睡着了。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在天上飞，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我们的婚礼安排在犹太教堂里举行，尽管教堂看起来很破旧，婚礼的“喜棚”也不够华丽，但那也不能减少我们两个人的幸福感。我的结婚礼服是一个海军蓝条上衣和裙子，胸前系一条爱斯科式领结，戴上一个蓝色的帽子，手里拿着一束六支百合。婚礼喜棚前有一把老式的椅子，上面有几瓶吉都什^[3]红酒和杯子。简朴的宗教婚礼仪式结束后我们来到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萨幹旅馆，举行了鸡尾酒会，招待参加我们婚礼的亲朋好友。酒会一结束，我们俩人就直奔塔特拉山区度蜜月去了。

塔特拉山是斯洛伐克的象征之一，是喀尔巴阡山脉最短的一组山脉，却使得斯洛伐克被称作“塔特拉山下的国度”。那里有雪山、峡谷、森林、草地、温泉、湖泊，塔特拉山什么都不缺乏。每一张关于塔特拉

[3]吉都什：在节日和安息日前夕举行的祝福仪式。



▲ 1947年2月9日奥尔佳夫妇在新婚仪式上

山的特写都是美的，适合度假、疗养、休闲、发呆、运动。斯洛伐克有幸拥有了绝大部分塔特拉山脉的美景，另一小部分给了山的另一边的波兰。无论夏天、冬天，那里都是天堂。斯洛伐克人结婚之后，一般都要到那去度蜜月，绝不会错过享受塔特拉山美景的机会。

塔特拉山是斯洛伐克的国家公园，也是塔特拉山脉中最为迷人的部分。斯洛伐克著名女诗人玛莎·加丽娅莫娃的那首《启程吧》就是在那里写的，她一定为那里的湖光山色而流连过，因为她的愿望和此地如此贴切：“在我的旅程的终点/有一所小屋/它坐落于湖畔/真正/现实。”她会对着眼前的景色说：“我又可以重返寂静/当灰色的清晨开始微微发亮。”

我爱约翰，那种爱是和自己的生命融在一起的，是一辈子的相依相靠。我们能在平淡生活中把自己活出一朵花来，我想，那样的生活才是一树繁花，都是我们青翠欲滴的日子。有幸福的婚姻点缀人生，用爱充盈人生，有心有灵犀懂你的丈夫相伴，共同走完漫漫的未来的人生岁月，还有比那更惬意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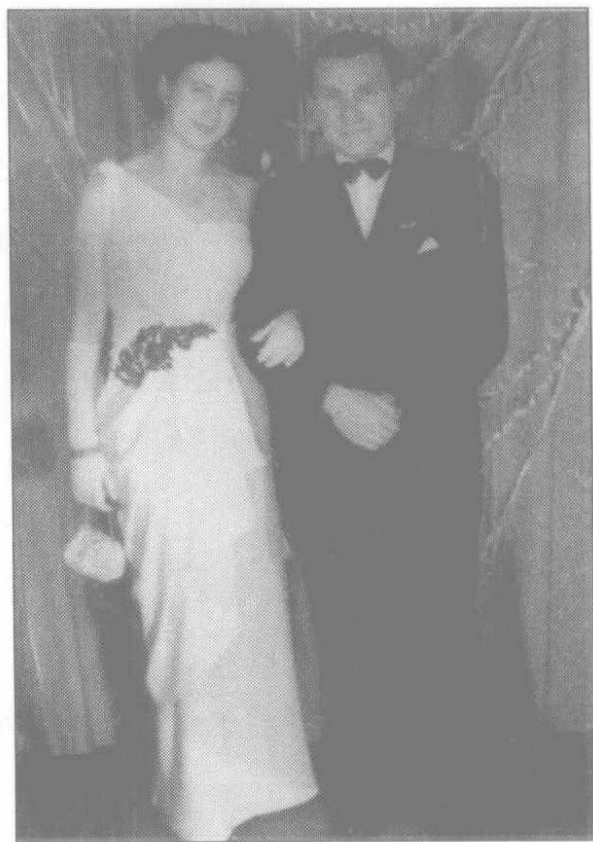
第十章

移民澳大利亚

我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历经多年的磨难之后，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暖暖灯光，它能穿过你的肉体直入你的心灵，使你在困难时见到希望，在黑暗里见到光明。它用一种只有夫妻双方能懂的语言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婚姻让我们有了一份单纯的感情和期待，它给你关爱，给你深情，有倾心相爱的人相伴人生才是幸福的。

我和约翰结婚的日子就是我再生的日子。约翰也是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尽管他没有被驱逐到纳粹的集中营，但是在外边东躲西藏。战争结束后，他返回家乡，和兄弟们在一起做生意。

家庭的责任就是在原有爱的基础上不断地付出，家庭是爱情的组合，也是责任的组合。结婚后，丈夫决定远离欧洲到另外一个国家开辟新的生活。约翰征求我的意见，是留在斯洛伐克，还是去其他国家。其实，那不存在取舍的问题，集中营的经历给我留下太多的痛苦，我们的决心已定，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寻找生命中的方舟……



▲1947年新婚不久的奥尔佳与约翰

由于当时的捷克政治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得到护照很困难。当时只有政府的官员才有资格到西方别的国家去旅行。经过与朋友秘密接触联系，我们申请到了有效的护照，上面有赴瑞士旅游的签证，当时我们开始行动了。

约翰首先和他相识的在边防上工作的朋友取得了联系，相信他能帮助我们。朋友告诉我们他在边防线上值班的具体日期。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约会，但我们还是要冒这个风险。

1948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锁上了房门，径直走到火车站，搭乘一辆去匈牙利布达佩斯的火车。

我们到达边防线是当天半夜，火车一停，边防的士兵就把我们围住了。他们到每节车厢检查证件和行李，看到那阵势我们十分害怕又万分着急，但确信我们能见到我们的好朋友，然而，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样。幸运的是约翰有朋友，幸运的是约翰想起了朋友，更幸运的是约翰的朋友还真够朋友。那位好朋友是年轻士兵们的头，他让其他士兵到其它车厢里检查，他自己检查了我们的护照和其他人的证件。他粗略地看了看我们的行李，和我们紧紧拥抱，还握了握我们的手，两眼含泪地祝福我们好运。那是一个十分感人的瞬间。我们知道闯过了那一关。

我们成功地穿越了边防线，几个小时之后到达了布达佩斯。几年前，我的全家曾经在此避难，但我们当时无暇欣赏多瑙河两岸美丽的风光，在那里只逗留了一天，然后继续我们的旅途，来到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在维也纳也只待了一天，又继续我们的移民之路抵达瑞士，最后来到了苏黎世。一路上，提心吊胆，风尘仆仆，我们身心疲惫，好在那里有约翰的姐姐、姐夫和他们的孩子彼德来接我们。他们是在三周前逃到这里的，当时我们幸福地会合了一起。

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旅游签证到期了，我们又遇到麻烦。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解释我们待在瑞士是在等能够移民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有效文件。我们没有认识到那是一个毫无希望的计划，那两个国家为捷克人颁发签证一般要等四至五年。

从
奥
斯
威
辛
集
中
营
到
澳
大
利
亚

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度，但我们已经不是旅游观光者了，在那里待着也高兴不起来。手里只有有限的资金，用不了多长时间。在那里不允许工作，我们只能待着。我们在那里滞留的十个月里交了不少当地好朋友，但是令我们伤心的是我们必须离开他们。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目标要一个一个地实现。在苏黎世滞留了差不多一年，我们决定离开。约翰的姐姐和她的家庭已经安排好了移民澳大利亚。我们也长时间地寻找新家，最后也把目标锁定在澳大利亚。其实，当时我们一点都不了解“遥远的澳大利亚”。当然我们听说过袋鼠，也在学校里学过那里有美利奴绵羊^[1]以及充足的光照和宜人的气候，但也仅此而已。那是一个挑战，但我们也只能义无反顾了。我和先期到达墨尔本的小姑的儿子、堂哥马克斯取得了联系，请他帮忙，堂哥一口答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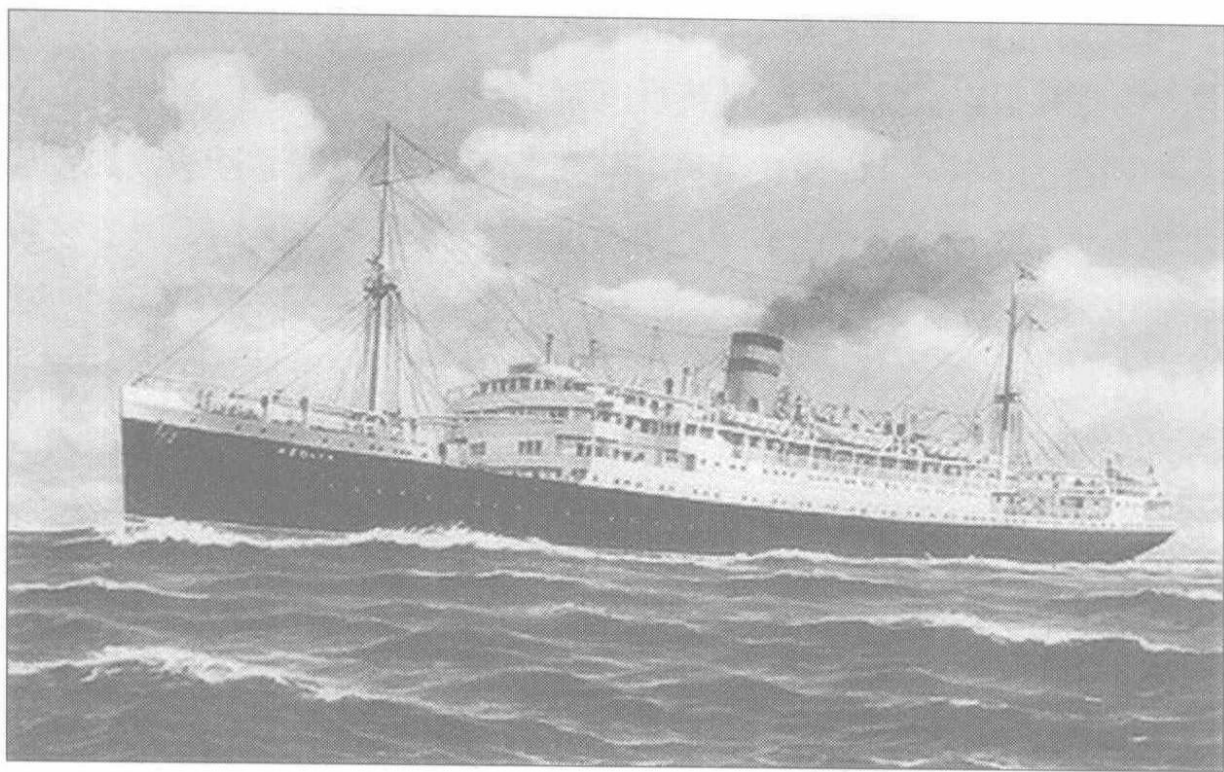
我们是年轻、幸福，已经踏上婚姻殿堂的夫妇，没有什么东西能动摇我们的决心。我们都是遭受过大屠杀磨难的人，超越自我乃人生的真正意义所在。不论任何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一直坚持那样一个信念：无论选择了哪条路，无论发生了多少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事，你自己都要坚定地走下去，因为拨开乌云就会看见明月，因为未来真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为迎接那次长途旅行，我们准备了好几个星期，我们还剩有足够的钱，购买了两张船票登上了一艘希腊客轮，开始了我们冒险的旅行。带着复杂的心情于1949年8月离开了苏黎世到意大利，在热那亚，我们搭上了一艘希腊客轮昔兰尼号^[2]。

昔兰尼号像一个锈蚀的旧水桶，不过适合在海上航行。那艘船严

[1]美利奴绵羊。广袤的澳洲大地气候宜人，水草丰茂，适于养殖绵羊。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锲而不舍的努力，美利奴羊在澳大利亚不断繁育、改良、发展，养羊业成为澳大利亚的一大支柱产业。澳大利亚是名副其实的“美利奴绵羊王国”。

[2]昔兰尼号。20世纪40年代晚期至50年代，昔兰尼号运载了数以万计希腊和意大利移民到澳大利亚。



▲ 1949年奥尔佳夫妇乘希腊客轮昔兰尼号移民到澳大利亚

重超载，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同我们一样，他们期待着在遥远异国开始新的生活。那是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季，船上没有空调设备，显然它不是一艘豪华客轮。炎热的天气令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我们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苍蝇和蚊子群魔乱舞。尽管甲板上的空间不是很充足，但条件还不算太坏。船上的乘客大部分晕船，船舱里气味恶臭。我有些晕船，但是约翰的身体比较强壮，他克服了困难。

在船上度过了32天之后，昔兰尼号到达了澳大利亚的费里曼特尔港，我们到达了自己的新家园，感到很兴奋。身在澳大利亚，高兴不已，望着窗外的天空，心中的那股希望之火徐徐升腾。那时候，我有一种“我真的自由了”的感觉，那种感觉横贯灵魂。我安坐在船舱内，对丈夫说：“我们真的自由了？”我静静地坐着想了许久，自己对自己肯定地回答：是的。

自由，宁静，飘逸，安详，在阳光之下的澳大利亚，我想起逃生到匈牙利时那位男士为母亲看手相时所说的那番话。生活中那类难解之谜不多见，他的预见真是太神奇了！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我们同几位刚刚在船上认识的朋友很快地上了岸，然后乘火车去珀斯。我原来很自信能够听、说英语，但是令我失望的是，现实并不是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容易。澳式英语十分难懂，我们经常要通过唇读加手势才能弄懂对方的意思。许多澳洲男士说话，语音像是受了几重压迫之后释放出来的。据说，澳洲最初苍蝇太多，为了避免让苍蝇飞进嘴里，所以人们尽量少说话，尽量说得又短又快，而且嘴唇也尽量把关把得严些。后来，澳洲苍蝇少了，但这种口音却传了下来。有时，如果听到浓重的口音，就觉得那些话混沌得好像全是说给他自己的心来听的。同英语、美语相比，澳洲的口音既不油滑，也不肃穆，非常朴实大方。那口音的特点是，首先很多元音都被重新打造了一遍，变得淳厚起来。我们在珀斯只待了几个小时，然后离开费里曼特尔港前往墨尔本，那里才是我们航行的最后一站。

1949年9月16日昔兰尼号到达了墨尔本。移民都十分疲倦，也很焦虑，我看见很多行李和包裹用绳子捆着，被吊车从货舱里运出来，还有一些行李由于吊运不小心而掉到水里，根本无法捞上来，那种场面让人看起来十分遗憾。那里正是春季，天气很暖和，阳光充足。

我的堂哥马克斯正在码头上迎接我们，堂哥是小姑的大儿子，也出生于布拉迪斯拉发市。他在姑父的熏陶下12岁就开始集邮，后来到奥地利维也纳读书。德国纳粹入侵捷克后，为了逃脱纳粹的魔爪，他的两个弟弟被送到英格兰寄宿到英国人家庭。

他们全家曾经几次逃脱德国纳粹的搜捕，后来也是由于邻居的出卖被德国纳粹将其全家分别遣送到奥斯威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3]。姑父和姑姑、马克斯的祖母和两个弟弟、叔叔在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当天就被送进了毒气室，惨遭德国纳粹杀害。1945年4月马克斯和几万名

[3]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位于德国首都柏林附近，是二战期间所有德国占领区纳粹集中营的指挥总部所在地。从1936年到1945年，那里先后关押过22万名包括德国战俘和犹太平民在内的囚犯，其中有10万人惨遭杀害或死于劳累与疾病。

犹太囚犯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转移，踏上了“死亡行军”之路。由于长期饥饿和过度疲劳，马克斯实在坚持不住了，打算一了百了，走出队列让纳粹党卫军给枪毙了算了，那样他就可以从痛苦中彻底解脱了。他的一位囚友奥斯卡用胳膊架住他，十分关爱地对他说：“要振作精神，再坚持一天”。他听了这话，挣扎着站了起来，那就是精神的魔力，继续前行。死亡行军路上的经历，之所以能够夺人心魄，是因为那是生与死的悲歌。

有时候，一个人的精神可以击败很多厄运，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不是活在物质里，而是活在自己的精神里。如果精神垮了，没人能救得了你，上帝也不能。在生活中，当死神逼近的时候，给人以关爱是一种崇高的人性，那种人性就是谁离死神最近，谁就是被关爱的焦点。马克斯后来被苏联红军救了，在饥饿、疾病、恐惧的折磨中他熬到了德国纳粹投降。

1948年马克斯和堂嫂爱娃移居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日子里，经过他个人的努力达到了他集邮事业的顶峰。很多年以后，在澳大利亚事业发达、子孙兴旺的马克斯还常常怀疑：“到底是我活在过去的梦中，还是过去的我活在现在的梦中？”



▲ 1983年马克斯（中）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在巴西举行的国际集邮联大会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我们从多瑙河之滨飘洋过海来到了澳大利亚，马克斯驾车载着我们去他在市区的家，我们在欢声笑语中一路前行。约翰把脸贴在车窗上，兴奋地询问很多看到的景象。澳大利亚的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新奇的。马克斯请我们品尝澳大利亚的巧克力，那纯美的感觉和滋味在唇齿间融化，我们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小时的颠簸让我们有些昏昏欲睡。我也把身边的窗帘稍稍拉下些，靠在椅背上休息，但根本睡不着，心里流动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甜蜜和期待。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可我却难以抑制那甜蜜的预感。我悄悄回头望着约翰，他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厚厚的唇角竟带着一丝神秘的笑意。窗外明媚的阳光透过窗帘照在他轮廓分明的脸上，那样柔和，犹如我温柔的心情。同马克斯家人一起在墨尔本度过了两天之后，我们乘夜车来到了悉尼。同约翰的姐姐、姐夫、外甥彼德再次相聚，那家人太好了，我们特别喜欢他们。

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特定地域的人民传承自有文明的语言、宗教、科学和艺术的总和。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成功的因素错综复杂，移民到澳大利亚，融入、礼貌、合作、改变，是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全貌。

由于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大都在中欧度过，从来没有接触过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的勤劳、朴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澳大利亚的生活与我们习惯的中欧生活十分不同，我们必须逐渐适应。一开始我们对一些事情感觉很奇怪，逐渐就习以为常了。我们必须学会融入，不能坚持我们原来对澳大利亚的看法。

澳大利亚人有非常好的礼仪，答应对方的邀请后如果临时有事要迟到甚至取消约会，必须事先通知对方。赴会时稍迟是可以接受的，但若超过十五分钟便会给对方不重视约会的坏印象。赴约时尽量不要带太多随身物，先购物后约会显然是不适当的安排。来到座位后，毋须第一时间拉椅就座，因为对方可能已准备好为你拉开椅子，你就给他一个表现绅士风度的机会。

生活是一个个故事，而故事又在阐释着生活。欧洲与澳洲是两个世

界,在小事上也是两个天地了。我们这些“新澳大利亚人”之间的握手,在欧洲人看来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交往方式,但澳大利亚人不这样做。欧洲男人的发型绝不在中间分开,澳大利亚男人多数穿着自家织的毛衣,分头上扣着一顶帽子。有趣的是,早上天上有云,男人戴帽而行,到中午丽日在天,男人仍顶着帽子。那是习惯,习惯真的就是在不需要戴帽子的时候仍然戴着帽子。

澳大利亚人与人之间都十分友善,在汽车和火车上陌生人之间都会十分亲和地谈话,妇女会在长途旅行中静静地织着毛衣。很多事情、很多方法对我们来讲很陌生,我们认识到就连月亮照射的角度都不同。我们喜欢这里的气候,并不完全在乎炎热的天气;我们羡慕种满奇特鲜花的绿园子,很多鲜花以前我们根本没见过;我们羡慕神奇的港湾大桥,我们愿意到美丽的海滩散步,沉浸在阳光下,远离喧嚣的人群。

一次陪同一位澳大利亚朋友到一家中餐馆吃饭,中国人做的“八宝粥”使我顿开茅塞。厨师把难以煮烂的豆类、花生先煮,然后放进大米、小米、糯米等慢慢熬,最后加入核桃仁、松子仁、红枣等均匀地搅拌,不一会儿,它们就被小火完全征服了,从心灵深处到表面都是那么的柔软饱满,散发着朴实纯正的香气。原本独立的豆类、大米、小米等融为一体,就那样在锅里演绎着自己短暂的人生,和其它同样命运的花生、桃仁相溶交汇,相拥相携,成为人类可以裹腹的营养美食。“八宝粥”浓浓的香气回荡在空气中,散发着诱人的味道,让人忍不住想马上放到口中品尝回味。人生如同煮“八宝粥”,要学会融入!

由于悉尼对外出租的公寓十分短缺,很难找到一个适合居住的房子搬进去住。不久我们搬进了一幢两家合居的公寓。但是感觉十分拥挤,经过努力我们才搬进一个独居的公寓。我快乐地度过每一天: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重新闭上眼感觉那纯净的白色,喜欢静静地一个人思考,任思绪轻舞飞扬漫无边际;上午给阳台上的花草浇浇水,闻闻它们的香味儿;坐在窗前读一本令人感动的书,在别人的故事里欢笑、悲伤,流自己的眼泪;下午坐在摇椅上呼吸、冥想,晒着温暖的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太阳，品味一杯醇香的咖啡，听着如高山流水的旋律；黄昏煮一锅又鲜又香的家乡饭，等外出找工作回来的丈夫一起吃。做饭的嗜好是女人的天性，能够给心爱的人做一辈子的美食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情。如果只是自己做给自己吃，无人分享，即便是山珍海味吃起来也是寡淡无味。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晚上，我们喜欢在寂寥的漫漫长夜里，伴着柔和的灯光写日记，用心灵之笔记录下平凡真实的自己。

安顿下来后，我们开始考虑应该干点什么的了，到考虑自己未来的时候了。将来我们凭什么撑起自己头上的一片天空，一双手，还是一张嘴？无所事事会使人心智生锈，我们都是二战集中营及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又来到了自由的国度澳大利亚，灾难已经过去，而生活是自己的、现实的。既然灾难已经过去了，还应勇敢地面对生活，你那样做了，灾难就成为自己的养料；否则，回避现实就会萎靡不振。

改变和维持现状虽然都是当事人的心态，但心境却迥异。改变者心境就回到了自我，在自己发现的新天地里流连忘返，悠然自得，内心是激情而充实的；维持者找不到自我，只好依然在熟识的世界里东抓西摸，无所事事，内心是烦乱而浑浊的。

漫无目的的生活就像出海航行而没有指南针，我当时要考虑：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人生，达观地看待人生，成功地把握人生，幸福地享受人生呢？生活有时是一场大型交响乐，有时又是很单纯的小提琴独奏；生活有时是激越的，但大多数时间则是像小河一样静静地流淌。改变现实，会让人们用心真正感受眼前的生活。尽管眼前的生活不如戏剧般跌宕起伏，也不如陈酿般香醇诱人，但经过改变之后，它却真实确切，发人深省。

经与丈夫商量，我们决定从事我们自己熟悉或喜爱的工作。离开瑞士苏黎世之前，我购买了一台可以折叠的“婴儿歌手”牌缝纫机，当时我想它可能有一天会派上用场。我是一个年轻的妇女，也多次学过剪裁，尽管我离一个合格服装设计师的要求还有距离，但我以前没有接受过其它方面的培训。我是一个不断改进自己、努力提高的人，喜欢时装、

愿意设计时装就为我的改变现状奠定了基础。

要学会选择，学会审时度势，学会扬长避短。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做自己该做的事。当时的现状让我缝制西装和比较复杂的衣服还有一定的难度。我还是决定制作女式成衣，我相信自己能够成功进入服装制作的上层领域。

天上从来不掉馅饼，就是掉下来也不一定砸在我头上。但我知道，在主动与被动之间，我选择主动，那是我的天性。主动与被动，其实只在一念之间。一个被主动改变的未来是一个未来，一个被动的未来也是一个未来，而被主动改变的未来很可能是一个更有境界的未来。选择服装制作，就是选择了我新的人生之路，选择了充满荆棘之路，将来能否干出点名堂来，全看个人的修行和造化了。

意志和方法是成功者的两翼，有了那一对翅膀，再加上一点点运气，相信一切美梦都将成真！约克大街是市里服装制作业的中心，约翰的姐夫成为我们的生意合作伙伴，他和约翰到处寻找合适的成衣布料。不久，他们就找到了十种质地优良的丝棉材料，十种最新款式的衣服诞生了。

当时，我们还没有车间，就把布料铺在起居室光秃秃的地板上，衣服也没有纸样，我们就用一个大号的剪子进行粗略的剪裁。后来我自学了设计纸样，可以保证我们设计的套装的质量。就那样我们的生意初具规模，我的丈夫也热爱那一行业。早期移民过来的约翰的姐夫与约翰合作，他们都任公司的经理，我是服装设计师。我们到悉尼两周后所选择从事的那项生意，一直持续了22年。

后来，我们又租了厂房，那是我丈夫朋友的建议，他是我们作坊的一位技术工程师。就那样，一个服装作坊建立起来了。我一头扎在服装设计里，展开隐形的翅膀，如同鱼儿落进水里一般。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订单。别看约翰的模样平时随和，但片刻之间就能从那颗聪明的脑袋里蹦出一个妙主意，那一点连澳大利亚人也不得不佩服。他以专业的眼光管理着生产，结果我们在制衣行业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及许多的客户。有一句澳大利亚谚语说得好：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 1954年奥尔佳在剪裁服装

时，整个世界也将为之让路。几年过后，我们积累了一些资本，将原来的服装作坊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服装工厂。

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改变人生，既需要我们有辽阔浩瀚的眼界，也需要我们有脚踏实地的实践。每当接到订单，我们几个人就在一起讨论，每个人都得动脑子，用什么样的材料，设计什么款式，大家都提意见，最后由我定夺。我在服装设计上追求完美，总渴望以完美的姿态示人，设计出来的款式总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成功的含义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你在那个奋斗的起点走了多远。在那样一种氛围下，我的工作幸福而又崇高，而且充满乐趣。日程表排得满满的，永远有做不完的活，这时便会觉得时间以逼人之势驱赶着自己，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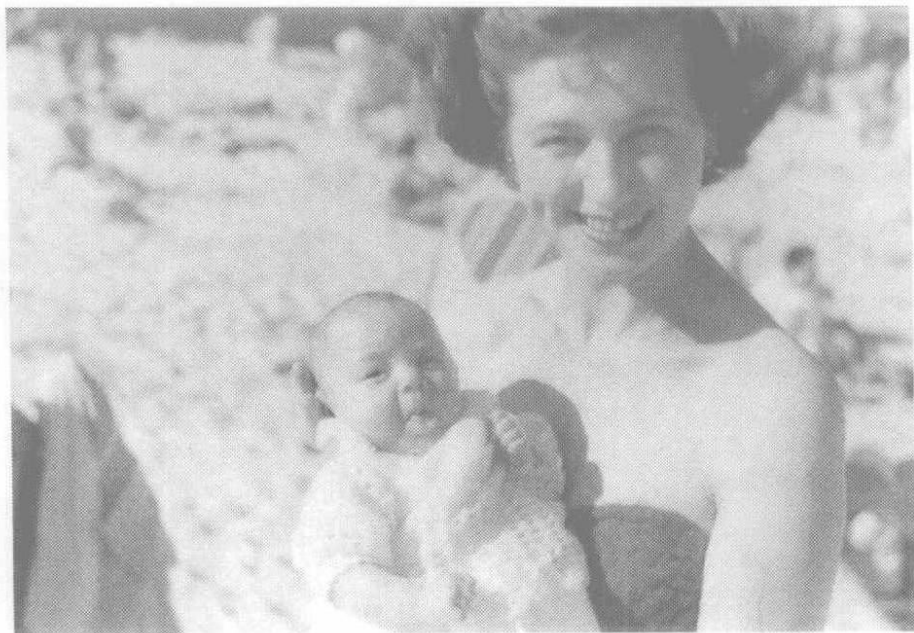


▲ 1956年位于悉尼的服装作坊

爱情是一切感情的基础，没有了爱情的结合，其他一切情感也就无从谈起；爱情更是亲情的前奏，爱情一旦步入婚姻也便成为了亲情。我从来不把夫妻双方的感情看作成一种简单的爱情，经过组建家庭、长时间的一起生活，就会有连结双方血脉的桥梁——孩子的出世。

我的大女儿出生在1950年，我不得不脱产抚养她，为了照顾好她花费了我很多精力。母亲都是从女儿走过来的，有女儿的感觉非常丰富，三言两语说不清楚。我仔细端详我可爱、漂亮的孩子，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用一双白生生的小手拍打着我的脸颊，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我摸着女儿的小脸，这里碰碰，那里拍拍。我们一起说：

“脸颊、嘴巴、耳朵。”然后脸碰脸，鼻子碰鼻子。一对可爱的母女，快乐、满足。我充分享受生活，享受和女儿在一起的快乐，整天乐乐呵呵的她无时不在感染着我，我也用快乐和关怀回报给她。



▲ 1950年奥尔佳与刚出生二个月的大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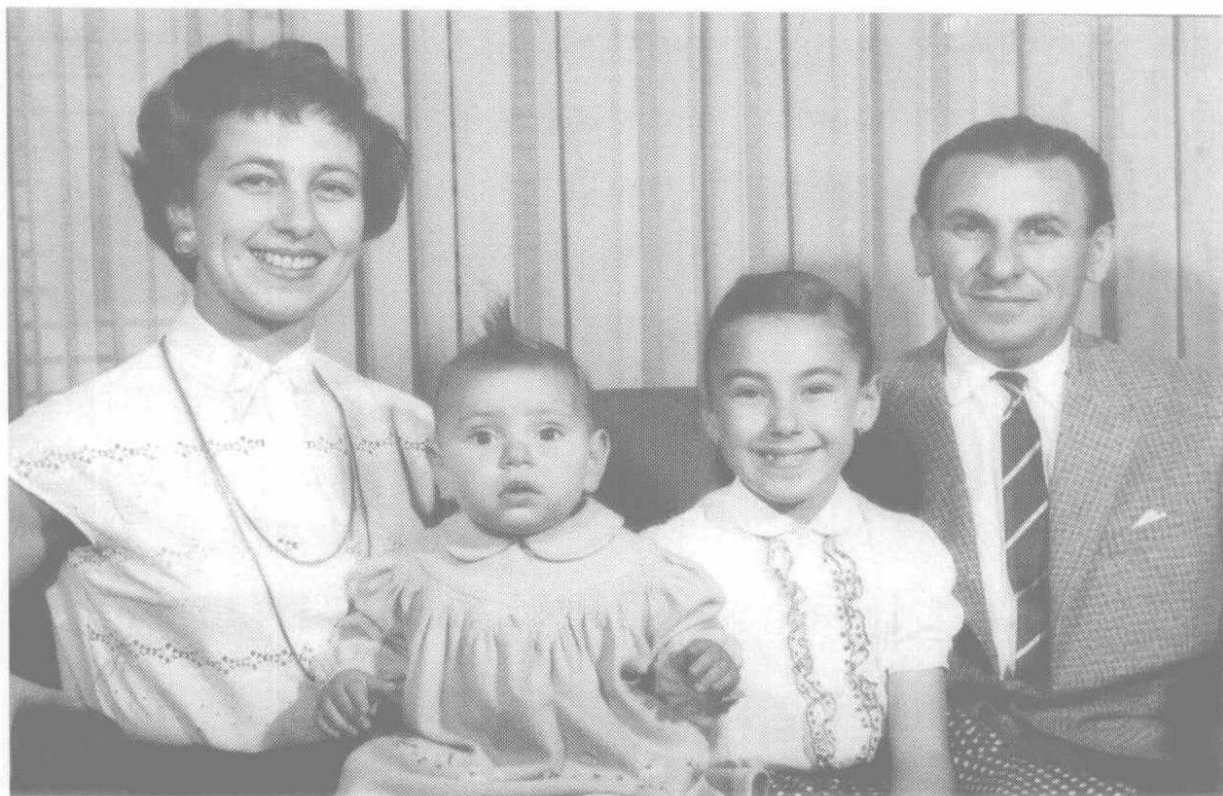
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孩子，因为我脱产的时间不能太长，我还是要出去工作。保姆是一位个子很高、心地善良的澳大利亚女人。她非常可靠，对我们的孩子十分疼爱。孩子长大了叫她姑姑，她是我们家庭的外来成员。

我不知道事业与家庭是否有某种关联，如果有，也是互相促进的。后来我们自己买了房子。约翰同一些年轻的大学生一起学英语，我则通过阅读来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

我们的家庭状况同澳大利亚人相比有很大区别，家庭中的对话也不相同。人家都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等家庭成员，那是我们很难向自己的孩子解释清楚的话题。我的第二个女儿于1957年降生，从此我生命中又多了一个快乐的伙伴。她和姐姐长得十分相似，小脸胖嘟嘟的，和姐姐在一起，犹如一朵红玫瑰旁边盛开一小朵红蔷薇，我们再一次享受到孩子降生带给家庭的快乐，再一次成为母亲是一件令人幸福的事。

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每一步都值得细细品尝的温馨旅程。孩子都入校学习了，她们都有了一个幸福的环境，穿着学校校服，戴着草帽和手套，笔挺的领子上系着蝴蝶领结，显得十分招人喜爱。我也学会了

为她们做上学吃的午餐，学会了做澳大利亚三明治。三明治选用从市场上买来的雪白的面包，上面涂上威吉麦特^[4]酱料、花生酱。没事的时候我喜欢伺弄自己种在花盆里的植物，它们不开花，却永远绿着。



▲ 1958年奥尔佳夫妇与两个女儿

抉择时的深思熟虑和抉择后的义无反顾是我面对人生始终追求的境界。我们夜以继日地在工厂里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生产的衣服很快就成为非常出名的抢手货。那是我们艰苦的工作与不懈努力的结果，我丈夫约翰对我们的工厂投入了全部的精力。

人生有多种轨迹，人生有多种机遇，人生的每一条路都必须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偶然的机会加上一些必然的因素，我十分庆幸：一个特定时代的平凡女子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发现自己的人生选择是多么的正确，现实的生活跟编织的生活真的比翼齐飞了。年轻是我们唯一

[4]威吉麦特酱料。全部用蔬菜做成的非常有营养的黑色酱料，含维生素B，热量和脂肪都相对低。它以独特的醇味深入人心，一直是澳大利亚男女老幼的早餐必备食品。

拥有权利去编织梦想的时光。我对当时的生活极为满足，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

我知道不要害怕学习，知识没有重量，它是你随时可以获取又随时可以携带的宝藏。我需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我，我感觉到学习与提高对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想它是我能够得到的一种幸福之一。当时孩子们已经上学了，我也有时间上学来提高自我了。我在东悉尼技术大学报了名，第一次因为有名额的限制没能报上名，但第二次学校允许我参加澳大利亚著名的雕塑家林登·达杜斯韦尔^[5]开设的的雕塑作品课。我被讲课内容深深地吸引，特别爱去上课。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后来又参加了一个由约翰·欧格本画室举办的绘画班，约翰·欧格本是悉尼一位十分有才华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激情四射、有鼓动才能的老师。出乎我的意料，在作画时，我总觉得是在画骨瘦如柴、骷髅般的人体素描，当我画鲜花素描时，它们马上变成黑色背景上的头颅。我



▲ 1959年奥尔佳在自己的服装展示室里

[5]林登·达杜斯韦尔。澳大利亚著名的雕塑家，被任命为二战战争雕塑艺术家。

的思维还会游离，集中营的暴行与杀戮又会一幕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内心还强烈地受到那场灾难的刺激，那种记忆在我的作品中有直接的反映。

在初到澳大利亚后大约四五年的时间里，我试图用一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安抚曾经在心灵深处留下的一道深深的伤口。但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时，总是禁不住想起一幅幅梦魇般灭绝人性的惨象。当时，很多人说纳粹的暴行已经结束，因此我们不必追究过去。但对于我们这些亲临过那种暴行的受害者来说，那场经历将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一世。

我希望有事做、有人爱，那就是幸福。我的第一个生命是父母给的，第二个生命是靠自己努力得到的。服装制作的成功是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章，但绝非是全部。

1995年全世界开展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活动，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大屠杀的许多幸存者也一起来纪念。我们不仅要庆祝战争的结束，同时还要庆祝“解放”。事实是我们还不能充分享受胜利的喜悦，对于二战的受害者来说，解放来得太晚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没能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1995年5月7日，悉尼犹太人博物馆馆长、赞助人约翰·桑德斯在悉尼大剧院安排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他写道：博物馆讲述的故事发生在50多年前，随着希特勒的出现，导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大屠杀，反人类的罪恶必须永志不忘。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性体现在几个方面：教导种族融合，确保过去的罪恶不再重复，作为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为被杀害的近六百万犹太人和几百万非犹太人树立纪念碑，它也告诉人们有关犹太人在澳大利亚的历史，并通过显示犹太人的传统来展现其丰富的人生。我应约参加了那一次活动，站在歌剧院的大舞台上，没有人能想象得出我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向与会者简要讲述了我在德国纳粹集中营及大屠杀中遭受的磨难，向解放者表示感谢。



▲ 1992年奥尔佳在悉尼犹太人博物馆，展示她在集中营用过的毯子

在我说来，回忆自己的经历，是因为我不相信自由和人类精神是可以被毁灭的。我受了许多苦，包括生理和心理上的苦，有时候，我想我活不下去了，但爱拯救了我的生命，给了我信心和希望。我来这里，是庆祝生命的意志战胜了悲剧以及大屠杀，征服了病痛、考验以及瓦斯毒气；我来这里，是要证明屠杀不能战胜希望。我只希望大家记住战争的悲剧，以便可以做一些事，来阻止战争和杀戮。当我说完简短而感人的话后，与会代表全都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眼中噙着泪水。我发现我讲过之后，我的精神上的痛苦得到了释放，那对我非常有帮助。

主办方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尊贵的来宾参加活动，他们当中有英国的胡韦公爵，有美国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有前苏联的前任外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博士，有澳大利亚二战期间参加解放欧洲战斗的保罗·席勒少将^[6]。他们都发表了让人难以忘怀的讲话，那是

[6] 保罗·席勒少将。在二战中，有近100万澳大利亚人参加战争或从事支援战争及救助活动，有4万名澳大利亚军人在战争中阵亡。

The Division of Analytical Laboratories

Director of DAL

Dr L. J. Kennedy
1900-1901-1902Department of Analytical Laboratorie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2008-2009-2010-2011
1911-1912-1913-1914-1915Telephone: 02 9845 1234
Fax: 02 9845 1234

REF: FS 97/638

RE: Private Case

I, Robert John GOETZ,

hereby certify as follows:

- (1) My scientific qualifications are Bachelor of Science (Honou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 (2) The following item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matter was received on the thirtieth day of June, 1907, from Jane WESLEY.
 1. Section of blanket
- (3) This item has been examined with the following results:
 - The item examined consisted of a mix of mainly animal and human hairs.

Biologist's signature: R. GoetzDate: 30/7/07

1/1

WESTERN SYDNEY AREA HEALTH SERVICE

▲ 澳大利亚医学研究所的化验报告证实：毯子是由动物毛与人发混和编织的



▲ 年迈的奥尔佳夫妇在澳大利亚子孙满堂，拍摄于1999年

一次令人难忘的纪念活动。

德国纳粹的丑陋，在于它发动了灭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带给全人类无尽的灾难，每一场灾难都是纳粹精心设计，每一个设计都构成了其最恶毒的罪恶，每一桩罪恶都令其他魔鬼自愧弗如。死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和世界犹太人大会估算，为570万人；犹太人的财产损失，最保守的估计约为120亿美元。

我十分骄傲地恢复了我原来的宗教信仰，作为一名犹太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自愿参加讲解活动，但内心深处大屠杀留在心灵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合。

经常有人问我，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我参加揭露纳粹分子的活动，我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相信人死后灵魂不灭。当我们今后到了九泉之下时，我们会面对数百万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如果他们问我们：“你做了些什么？”那个问题会有很多答案。你会说：“我成了一名服装设计师。”另一人可能会说：“我一直在努力工作。”还有人会说：“我一直生活得很好。”但是我会说：“我没有忘记你

们。”这是我如同反刍一般咀嚼了几十年的一句话：我不愿总是伴随着仇恨生活，如果你期盼明天，那么也请你拥抱昨天。20世纪的仇恨是一个丑陋的东西，带给我们太多的灾难。你可以用爱得到全世界，你也可以用恨失去全世界。

在澳大利亚，我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每到一座城市，都会在酒吧、酒店或其它什么地方，取上几张免费的明信片，选出几张，写上几句所见所想的温馨话语，贴上邮票，找个邮筒塞进去，寄给自己，或是当时想起来又知道地址的朋友。给朋友寄明信片是一份念想，最能体现关爱。

坐在桌子前，写到了本书的最后一章。看着窗外，能够看到阳光，看到蓝蓝的天空，认识到我是多么的幸运，有机会活着，要衷心感谢全能的上帝！

附录一

家族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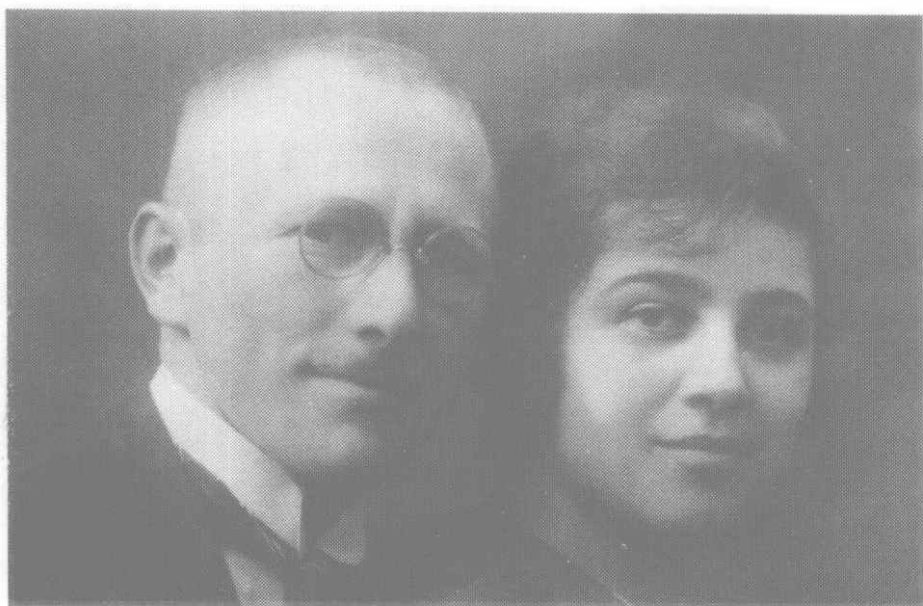
母亲家族

我的外祖父母——伊格纳兹和伊拉娜住在瓦哈河畔的塞拉瓦胡姆镇，该镇在布拉迪斯拉发东南不远的地方。那个家族多年从事零售生意，主要经营缝纫用品、棉布、现成的女式服装和男士外套。伊格纳兹和伊拉娜有6个孩子，包括5个女儿（阿姆卡尔、塞纳、普鲁斯卡、艾琳和内莉）、1个儿子（提瓦达）。我母亲普鲁斯卡生于1905年2月12日。

外祖母家坐落在镇广场附近，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建筑，四周被树木、修剪漂亮的园子所环绕。水果树、草莓树使整个园子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公园。小路旁种着栗子树和葡萄，一直延伸到预示着无尽财富的波士万湖。外祖父母家有七间大房子，所有的房子都有一个大阳台。此外，家里还有两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和一间保姆住的房间。

外祖父在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死在维也纳的一次手术中。外祖母继续照看着家庭和生意。她是一个很有激情而且十分聪慧的妇女，深谙经营之道，积累了很多财富，还贷款盖了一处房子，当然舅舅提瓦达给了她很大的帮助。

每年暑假，全家人都回到外祖母塞拉镇的家，整个家里充满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外祖母对孩子们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每个孩子都要享受到很好的教育。她安排所有的孩子都住在布拉迪斯拉发，在那儿上高中。20世纪初，家长为自己的女儿安排婚事也是一种习惯，要为女儿找到门当户对的人家。外祖母四处托人为自己的女儿介绍男朋友，同时也为每个女儿准备好了嫁妆——一份不错的彩礼。她的大女儿阿姆卡尔



▲ 1924年父母的新婚照

嫁给了雅各布·威斯博士；二女儿塞纳嫁给了林伯特·汉斯；三女儿普鲁斯卡嫁给了雨果·罗斯博格；四女儿艾琳嫁给了卡尔·罗森，五女儿内莉嫁给了约瑟夫·霍鲁泽。大姨、母亲和三姨婚后定居在布拉迪斯拉发，二姨和小姨婚后定居在匈牙利。几个姐妹经常到塞拉镇的外祖母家聚会。当她们随着自己的丈夫到外地度假时，就把自己的孩子寄放在外祖母家，由外祖母和家中的保姆帮忙看管。

老舅提瓦达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也是家里指定的财产继承人。他很长时间一直是单身，带着他的摄影机跑遍了很多国家。每当他从外地远行归来，都要在外祖母家里组织电影晚会，邀请家族成员、邻居家的小孩观看。他的片子大都是在巴基斯坦拍摄的，反映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生活。当然，更受欢迎的还有当时卓别林的影片。提瓦达后来娶了卡拉·福斯特为妻，生了两个儿子——艾果和里斯利。老舅和他的全家都和外祖母生活在一起，他们都居住在塞拉镇。

1923年父亲雨果陪着他的兄弟到塞拉镇谈生意，他们被邀请到大姨父家参加一个宴会。据家里人讲，当父亲经过园子走进房间时对别人说：“如果这家的姑娘有长得像这个园子一样漂亮的，我就要娶她为妻。”那天晚上，他遇到了普鲁斯卡。一年后他们结婚了，婚后定居在布拉迪斯拉发。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普鲁斯卡结婚后不久，就离开塞拉镇来到布拉迪斯拉发。家族中有3个姐妹——阿摩尔、普鲁斯卡和艾琳居住在那个城市。姐妹间走动得十分频繁，她们之间的谈话有自己的语言，有时可以在电话里谈上好几个小时，她们之间的谈话没有人能听得懂，谈话的速度非常快。

外祖母家的每位女儿都可以得到大约25万克朗的嫁妆。普鲁斯卡用她的那份嫁妆在布拉迪斯拉发以北30公里的特尔纳瓦附近的塞法买了0.5平方公里的土地，然后把使用权租给了一位名叫库拉玛的当地斯洛伐克农民。每年秋收季节，库拉玛一家都要给我们送几袋面粉，然后举行一个庆祝丰收的仪式。库拉玛一家都穿上节日盛装，他们的女儿玛丽·库拉玛给我们唱当地民歌，她的歌声悦耳动听，有绕梁三日之感。

我们家与库拉玛一家的关系非常好。20世纪30年代末期，玛丽来到布拉迪斯拉发学习声乐，她爱上了当地邮局的一位邮差，不久就怀了孩子。青年人谈恋爱期间同居、未婚先孕是极不明智的。且不说那样做有碍社会风气，仅就自身身心健康及优生优育角度来讲，也是贻害匪浅的。首先，未婚就怀孕，相当一部分女青年面对舆论的指责或嘲笑，整日处于惶恐不安的精神压力之中，对腹中的胎儿十分不利。长期忧郁、焦虑、紧张和不安，都会通过神经和内分泌系统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有损胎儿的健康发育。其次，未婚先孕，大多数女青年为避人耳目，采取束腰、裹腹等土办法，试图加以掩盖，使胎儿受到挤压，导致胎儿缺血、缺氧，生长发育不良，或造成胎位不正。

他们不得不马上结婚，也邀请我们参加了婚礼。父亲带着我们开着他的太脱拉牌^[1]敞篷汽车去参加了婚礼。玛丽穿着她们民族的服装，宽大的衣服掩饰了她已经略微隆起的腹部。村庄的牧师主持了婚礼，一对新人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还好，不久玛丽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事

[1]太脱拉牌汽车。在欧洲的版图上，老牌的汽车厂似乎集中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其实不然，在中欧也有历史悠久的著名厂家，其中坐落在捷克的太脱拉公司就是有一百五十年历史的汽车厂，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卡车制造厂。



▲ 1924年，母亲（后排左二）和亲属参加她二姐的婚礼

实上，我们对参加天主教的结婚仪式感到十分舒服，库拉玛一家对两家维持十分友好的关系也感到十分幸福，两家都十分珍惜当时共度的美好时光。

到1944年，外祖母一直同他的儿子居住在塞拉镇。他们平静的生活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伴随着一群匈牙利纳粹的闯入而结束。那一天，全家人正准备吃晚饭，安息日的蜡烛还在桌子上燃烧，法西斯分子在抓捕他们之前掠走了家中的所有财产。外祖母和舅舅一家全部在纳粹的大屠杀中丧生。

在母亲的家族中只有三姨艾琳一家逃过了德国纳粹的杀戮。1939年，三姨艾琳、姨夫卡尔和他们的3个女儿——玛瑞、迪塔和埃娃移民到了巴勒斯坦。1948年他们在特拉维夫又生了一个儿子兹瓦。艾琳于1988年过世，她丈夫也于1989年随她而去。外祖母家族的其他成员中逃脱了纳粹魔爪的还有一个侄女艾利卡·布鲁姆格德，她后来全家移居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还有些亲属移民到加拿大生活。

父亲家族

祖父马库斯和祖母玛瑞·罗斯博格居住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祖母玛瑞出生在摩拉维亚省的波多温，在家里大家都称呼她为“玛丽妈妈”。我父亲雨果出生于1894年4月13日，在家里排行老六，是第五个儿子，他上面的哥哥是大伯阿道夫、二伯西格蒙德、三伯朱利叶斯、大姑付瑞达（大姑和三伯是双胞胎）、四伯威廉姆以及小叔大卫和小姑塞玛。

罗斯博格一家在当地以经营牲畜闻名。祖父是一个成功的牲畜饲养员，在当地有自己的农场，这个农场在城外10公里处的梅泽霍夫·罗森海姆的郊区。那是一个生产牛奶的农场，主要饲养奶牛。有一位经理和他的妻子、小孩住在农场里，农舍前种植了许多鲜花，农场饲养着1000多头牛。

他们种植西瓜、水果、甜菜作为饲养奶牛的主要饲料。阿道夫、威廉姆和大卫帮助祖父从事牲畜的贸易。二伯西格蒙德娶了罗莎·费瑟尔为妻，他加入了老丈人家的纺织生意。父亲雨果一开始在一家酿酒厂工作，后来成了酿酒厂的一个小头儿。由于祖父马库斯过早去世，父亲不得不回到家里从事家里的生意，那还是他结婚前的事。

那个农场培育了中欧最好的奶牛，在每年一度的农业博览会上，我们家饲养的牲畜多次赢得了一等奖。祖父去世后，家里组建了一个公司，生意主要由父亲和他的兄弟阿道夫、威廉姆和大卫来经营。三伯朱利叶斯是这个家庭中的“害群之马”，他喜欢赌博，对自己的妻子马莎和两个小孩马克斯、埃娃不管不问。奶奶和伯父、叔叔们照顾着三伯的家庭，那些本来应由丈夫与父亲做的工作不得不由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来做。

祖父是一位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工作就是督促他的犹太伙伴们在非犹太区中奉行犹太人的“道德标准”。例如，他的一项工作就是为州医院建立为犹太患者服务的食堂，那家医院是1890年在布拉迪斯拉发建立的。医院食堂的卫生是由一些营养专家和医务人员进行监督的。

不久,其他医院也提出为他们的犹太患者建立那样的食堂,为此成立了有800人参加的为建立食堂和殡仪馆提供资金的委员会。祖父是得到布拉迪斯拉发医院管理层高度赞扬的人士之一。

祖父家有一套很大的房子,坐落在在乌拉卡大街16号至45号,地下室可以用作防空掩体,院子里还有一个牛棚是用来饲养“样板牛”的。那些“样板牛”作为样品从那里运送到其他地区。牛棚的四壁都涂上了白颜色,配有冷热水,由身穿白色工作服的佣人打扫牛棚。



▲ 罗斯博格家的餐厅

祖母是一位伟大的“老太太”,她的孩子们和布拉迪斯拉发人对她都极为尊敬。她长得十分漂亮:白皙、蓝眼睛、身材修长。她是一位虔诚的教徒,乌黑的头发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了灰白色。她总是精心地打扮自己,穿高领毛衣,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遮挡住已经有一些皱纹的脖颈。她的衣服大都是黑色或灰色的,有的在上面印着暗格,所有的衣服都熨烫得服服帖帖。尽管她的年事已高,但是她走起路来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她的头脑像水晶一样清晰。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祖父去世后，祖母掌管了全家。每年安息日的下午，她的所有子女和29个孙辈都要到她的家里，排着队亲吻她的双手。大家都热爱、崇拜我们的祖母！

祖母以她的博爱赢得了那个城市的尊敬，她经常给予穷人一些食物，无论他们是在什么时候登门造访。家里农场生产的牛奶如有富裕就分别送到当地的医院和孤儿院，她从不将它们藏起来。祖母经常同看管牛圈的工友聊天，询问母牛生产情况。她还经常就生意上的一些问题同经理们一起探讨，她的儿子们也愿意就生意上的问题征询她的建议。她的建议他们都能迅速采纳。当德国纳粹抓住祖母时，她已经年近80岁了。她没能终老天年，和全家人被死亡列车直接送到奥斯威辛，此后她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家。

雨果和普罗斯卡·罗斯博格

父母结婚后，他们居住在布拉迪斯拉发市医院街50号一个出租的公寓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朱迪思生于1925年4月12日，我出生于1926年8月11日，比姐姐晚16个月。

我家有一位同我们居住在一起的保姆马塞拉，她负责照看我们姐妹俩，家中还有另外一个保姆负责做家务。不久，我们又搬到了乌拉卡大街16号至45号，祖母和我们住在一幢楼里，她在一层。我们的公寓很大，法国式的门刷上了白漆，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的孩提时代的经历还留在脑海中。姐姐朱迪思作为家中第一个孩子，根据当时的习惯，对任何事情都有第一选择权。我们俩看起来像一对双胞胎，个头差不了多少，胖瘦也不相上下，穿着一样的难以分辨的衣服。朱迪思有一头棕发，笔直地垂在肩上，深褐色的眼睛配着圆脸和惹人喜爱的桃红色的双颊。我有一头卷曲的金发，也是淡褐色的双眼，有着瓜子脸和白净的皮肤。我是一个十分脆弱的小女孩，经常会得上各种各样的疾病。我和姐姐都得过百日咳。我家的保姆经常带着我们姐妹俩在离家不远的煤气厂外面散步，在那里可以呼吸到煤气厂的煤气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据说那



▲ 母亲（后排右一）与她的姐妹们，奥尔佳、朱迪思（前排右二、右一）

种煤气味对人身体有好处。

母亲几乎每天都和她的姐妹们见面，这是她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她们很少到咖啡店里坐，几乎不打牌，而那两种活动在当时的妇女群体中十分流行。母亲是一位十分聪慧又喜欢读书的女性，她经常从当地的图书馆借许多书来读。她也是当地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妇女联合会的成员，经常参加联合会的一些会议。

我对父亲的记忆十分独特，他很有绅士风度，是个善良的人，我十分尊敬他。我是父亲的小女儿，经常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他的大腿上，手里拿着纸和铅笔，时刻准备着画他的肖像。父亲十分骄傲地举着他女儿的绘画作品向他身边的人显摆。父亲的身材很高大，有一双蓝灰色的眼睛、金色的短发和修饰得十分整洁的胡子，他还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同母亲一样，父亲也十分愿意装扮自己，周六外出的时候，他总是穿着一件皮大衣，工作时他总戴一顶皮毡帽，穿一双小羊皮靴，那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汽车里没有取暖设备的缘故。母亲也用一件黑色的皮货改制了一件皮衣。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父亲还是一位十分有幽默感的男人，随时都显露他的幽默。对于祖母他是一位忠实孝顺的儿子，对于母亲他是一位富有爱心的丈夫，对于我和姐姐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那就是父亲在我心中的图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20世纪初期，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人，对犹太教十分虔诚。每周五晚上，他从教堂回到家里，都会对我们说，上帝保佑我和朱迪思平安。我至今仍然记得他用希伯来语^[2]对我们的祝福。那时，祖母每个安息日都和我们一起度过，她总是自备两面都烤的面包，那让我们感到很奇怪。她在吃饭时只吃新鲜的奶酪。后来我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她喜欢吃松软的面包，因为她是一口假牙。

父亲每天起来得很早，他每天抽很多烟，非常乐意驾驶着他的灰色的太脱拉牌汽车到梅泽霍夫去照看那里的500多头牛的产奶工作。然后，他和经理们谈论每天的工作安排。他还要经常和兽医见面，因为牲畜要保证得到日常的防病护理。当时条件有限，只有生长得最好的牲畜才能放到牛棚里饲养，那些好品种的牛每年都要参加多瑙河牲畜博览会，很多牛获得过一等奖。获奖的牛能出口到瑞士、荷兰和丹麦等国家，可以卖上很好的价钱。我记得当地有两个屠夫，他们与父亲保持了多年的业务联系。罗斯博格家族的牛肉在布拉迪斯拉发人的餐桌上是上等的牛肉，受到了一致的好评。同时父亲在他的雇员的心中也是一个好心肠、慈悲老板。

由于生意的需要，父亲要到欧洲许多地方出差。一次，父亲从巴黎回来，他忘记了为母亲买礼物。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在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里，他看见一个鳄鱼皮包。他果断地将这个皮包买下，没有注意到那个皮包已经有些退色了，因为它在那家商店的橱窗里摆放很久了。父亲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可母亲注意到了。父亲承认了带回来的礼物是本地的产品，并非是从法国巴黎购买回来的礼物。母亲立即原谅了父

[2]希伯来语。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母语。对一个犹太人来说，在以色列使用神圣的希伯来语是他们追求的最崇高的境界。

亲，她还去那家商店将父亲购买的皮包换回了一个更便宜的手包。

当大伯阿道夫和他的全家从家中老房子里搬出，居住到那个城市的其他地方后，父母毫不犹豫地搬到了祖母身边。母亲决定要将房子粉刷一新，于是房子变得更大更明亮了。洗漱间变得更为现代，还更换了里面的卫生设施，壁炉贴上了瓷砖，地面铺上了木条镶花地板。

朱迪思和我同住一个卧室，我们都为共享一个房间而高兴。随着我们年龄与身高的增长，我们需要一个略为大一些的衣帽间。我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长靠椅，它非常实用，到了晚上我们把它放成双人床。我们的房间看上去喜气洋洋，屋里的家具漆得油光锃亮。

父母的卧室也十分漂亮，家具十分精致。他们的床头是用樱桃木雕刻的，床头和床脚雕有月季花的图案，地上还铺了一大块松软的波斯地毯。

父亲的书房很别致，里面的家具是黑檀木的，在咖啡桌旁有一对扶手椅，墙角处有一个大写字台，一个高高的书架靠在墙角，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书架上许多摆放整齐的书籍。我就生长在那个充满温暖、友爱、幸福的大家庭中。

教育与上学

姐姐和我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一所讲德语的犹太小学上学。在那里学习了五年后，曾在两所寄宿高中上学，一所是讲斯洛伐克语的预科学校，另一所是讲德语的专门为犹太子女开设的特别女子高中。我们姐妹俩都通过了两所学校的入学考试，后来家里让我们到女子高中就读。那所学校有严



▲ 奥尔佳（左）与姐姐朱迪思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厉的校规。我们没有穿学校的校服，而是穿着蓝衬衫。

那所女子高中的教学楼有三层，楼里面有电梯，可乘电梯到不同的楼层。进入教室前我们要将鞋脱下，换上鞋底软软的拖鞋，因为教室里面铺的是地板。我们的老师十分严厉，所有的老师都是教授。我们的班主任年纪很大了，她是一位十分慈祥的妇女。我记得乌拉奇夫人教我们数学。我在学校学习并不十分努力，但成绩很好。我可以毫不费力地做完功课，因为我的记忆力特别好。朱迪思各门功课都很棒，但她不喜欢艺术课，我就为她做艺术课作业。父母知道我喜欢艺术，就送我到一位教授家学习，那也是比较早的家教吧。

我们学习家庭科学、烹调、打字和速记。体育课在当时也十分重要。由于当时我们的学校没有自己的健身房，我们每周两次到另外一所学校上体育课。

下课后我们同法语课的辅导老师交往比较密切，法语老师是库梅尔太太，她的丈夫是一位著名的雕刻家。她只能讲几句德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只能用法语。他们两口子从法国的阿尔萨斯搬到布拉迪斯拉发居住。他们的家离学校不远，我就和姐姐到她家里上法语课。他们夫妇没有小孩，但有一只十分聪明伶俐的宠物猴。我们的注意力被那只猴子深深地吸引了，它端坐在梳妆台上，模仿着它的“妈妈”。它会往自己的脸上“扑粉”，十分乖巧，身高不到一米，看上去很像人。

我们还同怀特先生学习英语，他是一位在牛津大学深造过的教授。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学习希伯来语，所学的教材是由当地的一个犹太组织提供的。我们还一起到一所舞蹈学校的训练馆练习体操。总之，我们的课余生活安排得十分饱满。

体育锻炼是我们的必修课，夏天我们经常去游泳，冬天去滑冰。离我们家不远就有一个室内的游泳馆，进泳池之前要先洗一个淋浴。在我家对面就是一个滑冰场，平时那是一个大公园，滑冰场里有许多训练场。母亲经常同我们一起去游泳，她十分喜爱这项运动。尽管我们都是那个滑冰场俱乐部的会员，但我们没有去上滑冰课，而是凭着我们的童

趣在滑冰场上嬉戏。

布拉迪斯拉发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城市，被群山和森林所环绕。人们可以到冠利巴滑雪，而不用跑到很远的高山上和滑雪度假村去滑雪。城外十公里处是兹里兹纳·苏台德国家公园。静谧而又未加雕琢的自然风光，为热爱大自然和体验运动的人提供了理想的娱乐和休闲环境，自然赐予斯洛伐克的造化，使其成为登山健儿的天堂，我们家经常到那里去野餐。我们租一艘独木舟，父亲教我们如何正确使用木桨。我们有时在树林湖边的草地上吃我们自备的午餐，有时到露天的餐馆去吃饭。我们一边品尝着当地的食物，喝着当地的啤酒，一边听着手风琴弹奏民歌。人们跳着波尔卡舞和玛祖卡舞，优美的舞姿使得餐馆内弥漫着幸福的空气，人们从中得到极大的放松。

在市中心是友谊公园，公园修剪得十分整洁干净。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带着空竹和铁圈到那里玩耍。多瑙河岸边是遛弯的好去处，也是人们集会的地方。1937年当姐姐朱迪思12岁生日的时候，父母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牌子是“女行者”，黑色镀铬的。那也是她12岁生日庆祝仪式上的礼物，当然父母也让姐姐和我共同使用那辆车的意思。姐姐特别喜欢这辆车，大部分时间是她骑着那辆车，我根本就没有机会骑，那使我十分沮丧。幸运的是父母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也给我买了同样的自行车，当时我还不到12岁。外祖母给我和姐姐一人一个珍贵的戒指，但因我们年龄太小，父母不允许我们戴那样贵重的首饰。

节假日我们都是到塞拉镇与祖母共同度过的，那使得父母有时间到卡尔斯巴德、马里昂巴德、卢哈科维奇、特任西安斯克·塔比历斯等温泉疗养院去疗养。斯洛伐克温泉疗养地的优势在于其高水准的保健服务，一流的水疗或者泥疗治疗溃疡和消化不良等疾病，使人们的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恢复健康活力。欧洲许多名流和富贾都云集于此，在许多疗养院里盖了很多豪华旅馆。客人们数小时地在公园里散步，用吸管慢慢地品尝着“魔水”，那里的魔水有加快排尿的作用，喝过之后不久就要找地方方便。因此，此地到处都是厕所。父亲经常到约希姆斯托温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泉疗养院治疗，他饱受风湿病折磨，在那里他可以通过浸泡在含有铀的水中得到治疗。

我们也在塞拉镇同外祖母度过节假日，她的家里有许多令我们称奇的东西。她在家里养了许多鸽子，高高的鸽子笼摆放在院子中央。她经常爬上梯子通过通风口瞭望鸽子的孵化。我们很喜欢采摘黑草莓，不过摘到篮子里的草莓比进入我们嘴里和粘在脸上的还少。在院子的尽头有一个湖，冬天我们和邻村的孩子一起在上面滑冰。在塞拉镇我的许多小朋友中，有个小孩，他的父亲是镇秘书——齐美尔博士，他们也是犹太人，最后全家惨死在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之中。

我们依然记得在塞拉镇与外祖母度过的那些犹太传统节日，全家人都在外祖母家聚齐，一起庆祝逾越节。我现在依然记得鸡汤的特殊味道，那好吃的斯洛伐克饺子，多层的没有经过发酵的面包，巨大的奶油蛋糕。对于我们孩子来讲，生活一点都不枯燥！

逾越节我们是到外祖母家过，但帐篷节^[3]我们要到祖母家过。过节也是一种积蓄，一种期待，一种追求，一种寄托。节，既是终点也是起点。节日带给人们最显著的改变是人性的回归：随着全身心的放松，人们对亲情、友情的渴求也达到了高峰。人们被一种令人陶醉的幸福感围绕着，并因此燃起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期盼。

帐篷节期间，每个家庭都要在自己家里搭起木制帐篷。我们在里面装饰真苹果，画上胡桃以及其他有绿叶的植物。家中的姑姑、婶婶都拿出自己看家的烹调本事，做出一道道好菜让全家人品尝。在她们之中母亲是最好的厨师。

战前最后一次全家聚会是为堂姐、大伯的女儿罗丝·罗斯博格举办的婚礼，她于1938年结婚。姐姐朱迪思和我在婚礼中充当花童的角色。

[3]以色列帐篷节。以色列人七大节期的最后一个，最初意义是纪念农民在秋收时节住在野外的帐篷内以便及时收获成熟的庄稼。节日期间，有的犹太人吃住都在郊外的帐篷内，有的只是象征性地每天在其中住留一会儿，念诵有关的经文和祷文。

当牧师宣布新人入场时，我们两个花童每人手提一个装满花瓣的小花篮站在红地毯前，带领新郎新娘缓缓踏上红地毯……1939年9月，我们被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所震惊，我们的邻国奥地利已经有了同样的命运，我们见证了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人被驱逐，见证了由蒂索任所谓“总统”的傀儡政府。对于我们来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附录二

斯洛伐克简史

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它西南与奥地利接壤，西北与捷克相连，东北临波兰，南接匈牙利，东接乌克兰。斯洛伐克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点，多瑙河是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自然国界。塔特拉山与喀尔巴阡山脉将它与波兰分开，摩拉瓦河、瓦赫河将它与捷克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分开。

欧洲国家的首都大家一般都耳熟能详，读起来朗朗上口，但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却是一个因为人们不大熟悉而显得格外拗口的名字，需要反复默念才能念顺溜。

布拉迪斯拉发也是多瑙河上的主要港埠，距离维也纳60公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铁器时代，见证了几千年来人类在那里定居的过程。在那一地区定居的，有来自前封建时期的欧洲移民，其中凯尔特人到达那里的时间是公元前500—前100年。他们和早期的日耳曼人部落就是最初的居民。当时的多瑙河就是他们的边境。公元6世纪，日耳曼人部落遭到阿提拉匈奴人的驱逐、排挤；最后在公元5—7世纪，随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大批斯洛伐克人从东维斯瓦河乘船到达那里，同后来的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创立了布拉迪斯拉发文化。

理想的地理位置，使得坐落在多瑙河畔的布拉迪斯拉发逐步成为贸易重镇。13世纪的社会与经济改革使得布拉迪斯拉发受到了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来自欧洲的手工业者云集在此，意大利人、德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来此地做生意，在他们之中不乏犹太人，使得那

个地区成为世界大都市。据市志记载，在那个没有什么特征的中欧地区，当时的人口适中，供人居住的房屋密度也不大，花园与葡萄园紧紧包围着小喀尔巴阡山坡上的那座城市。

12世纪布拉迪斯拉发成为一个匈牙利皇家城市。罗马教皇对此享有特权，由他来任命市长及地方行政长官。布拉迪斯拉发城堡位于多瑙河岸边的一座丘陵上，在丘陵之上为女皇来访修建了皇家住宅。15世纪初，奥地利皇帝查理四世的儿子、卢森堡公爵西吉斯蒙德将旧城堡拆毁，建立一座气势恢宏的歌特式新城堡，可惜的是城堡还没建成他就去世了。现在那座城堡成为布迪拉斯拉发市的地标，从很远处就可以看见。

布拉迪斯拉发的建筑，乍看之下给人简朴的印象。然而倘若在城里稍微多转一会儿，那些以古典主义风格建造、缀以巴洛克风格装饰的房子所规划成的街道，就会令人心生欢喜。而看起来简简单单、不事修饰的小广场，却也往往别有一种质朴可爱的情趣。

布拉迪斯拉发最大的殊荣是在1563—1830年，共有11位哈布斯堡王朝的国王和9位王后在圣马丁大教堂和圣方济会教堂中接受加冕，其中包括玛丽亚·特瑞莎女皇。那是一位在全斯洛伐克境内常常会听到的名字，是一位被人们尊称为奥地利国母的了不起的女性，她曾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圣马丁穹顶大教堂内举行加冕典礼。

布拉迪斯拉发是斯洛伐克惟一一个经历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地区，这使得罗马教、东正教在斯洛伐克的城市地区占有优势，同时也使得在1945年以前宗教矛盾在那一地区一直十分紧张。

大批犹太人于17世纪迁移到布拉迪斯拉发，此时的犹太人已经遍布欧洲各城市，从事各种行业，尤以经商居多。

1683年，随着强大的土耳其人被彻底击败，解除了他们对欧洲300年的威胁，中欧出现久违的和平与繁荣，布拉迪斯拉发也随之进入了发展时期。18世纪布拉迪斯拉发出现了一些巴洛克式建筑，特瑞莎女皇下令在市内建设一批威尼斯式的民房和公共建筑，围绕城区的

从
奥
斯
威
辛
集
中
营
到
澳
大
利
亚

新郊区一直延伸到原先的乡下。18世纪后期，女皇还建了一座当时流行的洛可可风格的城堡，那座城堡于1811年遭遇一场大火被烧毁，直到1950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又在遗址建立一座新城堡。目前它是斯洛伐克国家议会和斯洛伐克国家博物馆的所在地。

1780年女皇去世后，哈布斯堡王朝将皇宫移到布达。1848年匈牙利国会也搬到布达。工业重镇取代了原来的政治、经济首府的位置。1840年第一条铁路在布拉迪斯拉发和特尔纳瓦之间建成，不过当时的火车是用马拉着车厢。后来在多瑙河畔的那座城市与欧洲其他城市之间出现了蒸汽火车，火车的出现使得布拉迪斯拉发成为巴尔干、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波兰之间贸易的重要转运点。

1867年，奥地利与匈牙利将统一的奥地利帝国改组为二元制的奥匈帝国。斯洛伐克成为匈牙利的一部分，同时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斯洛伐克人对奥匈帝国的统治不满，一直寻找独立的机会，期间大约有3万斯洛伐克人移民。

一战结束后，奥匈帝国瓦解，不过关于斯洛伐克寻求独立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许多斯洛伐克人希望能从匈牙利人的统治下独立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斯洛伐克国。但那一希望一直未能实现。1919年，根据巴黎和中的规定，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联盟。

捷克斯洛伐克1920-1938年

1918年，斯洛伐克被吸收到捷克-斯洛伐克联盟之中，其要求独立的梦想破灭。斯洛伐克人缺少政治经验，奥匈帝国解体后，大部分匈牙利政府官员返回家乡。而填补那些职位空缺的是来自布拉格的政府官员，他们对斯洛伐克人的要求与需求缺乏了解。

此时，新兴的捷克-斯洛伐克联盟的民主制度是比照美国设立的。当时，捷克族、斯洛伐克族占全国人口的65%，其他的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等为少数民族。在这个新兴国家中犹太人大约有356830人，其中136739人居住在斯洛伐克。

20世纪2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联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是当时欧洲各国的榜样。在马萨里克政府的领导下，公路、铁路得以扩建，工人、病人、退休人员的权利得到保护。教育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大约在1925年前后，捷克斯洛伐克是当时世界上文盲率最低、教育制度最好的国家。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世界上的“民主样板”。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稳定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30-1934年“经济大萧条”的到来，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着经济大灾难的影响和来自北方的第三帝国的威胁。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心，不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军事工业发达，矿产资源丰富，德国对它早就垂涎三尺。1937年11月5日下午，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德国未来的政策。参加那次会议的除了国家元首希特勒外，其他成员大都是军人，有作战部长勃洛姆堡元帅、陆军总司令弗立契上将、海军总司令雷德尔上将、空军总司令戈林上将，此外就是外交部长牛赖特。此时，纳粹上台已有五年时间。希特勒认为，在那五年中，德国的实力和军备都已经取得了在欧洲大陆的领先地位。但是，德国的未来不能靠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方法，也不能用增加在世界工商业中份额的办法来保证，关键是地域问题，是争取德国“生存空间”的问题。因此，解决的方法就是要扩张德意志帝国的疆界。

会议的结论是，扩张的第一步就要立即调整大德意志帝国，使其扩张到中欧。从那里，德国就能够取得粮食供应、原料和人力，作为进一步向东——向波兰和乌克兰富饶的土地进行军事远征的准备。因此必须把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弄到手，作为更大征服的前提。

捷克境内有300万日耳曼人，大多居住在苏台德区。希特勒侵略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利用民族问题占领苏台德区。1933年，希特勒在苏台德区扶植纳粹分子康拉德·汉莱因建立了一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希特勒指使汉莱因不断地对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所不能接受的要求，让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保持紧张局势，以便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为他制造入侵的借口。1938年9月29-30日，在慕尼黑举行了英、法、德、意四国首脑会议。苏联未被邀请，当事国捷克斯洛伐克亦没有代表参加，而是处于被裁决的地位。9月30日凌晨，四国通过了以意大利建议为基础的协定——《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原则上将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区以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连同上述地区的一切建筑和设施移交给德国。1938年10月1日，德军开始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和其他住有日耳曼人的地区。

《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不到一个月，布拉格允许由天主教牧师蒂索领导的斯洛伐克政府自治，而蒂索遇到的第一个危机就是匈牙利与波兰对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蒂索寻求欧洲霸主为其裁决，意大利、德国则偏袒匈牙利，要求蒂索放弃自己的国土。就这样，匈牙利占领了南斯洛伐克一大块地区，波兰获得了特斯申地区和捷克西里西亚地区的一部分，而德国吞并了多瑙河的港口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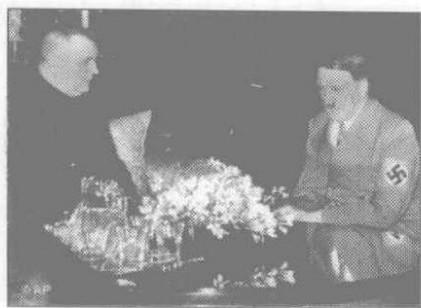
在1938年11月斯洛伐克大选后民主就在那里消失了，蒂索解散了除自己的斯洛伐克全国团结党及党卫军斯洛伐克人民党之外的所有党派。犹太人对此有理由担忧，因为党卫军斯洛伐克人民党中最有权力的机构就是该党的臭名昭著的党卫军卫队，他们对犹太人有着深仇大恨。

斯洛伐克1939-1945年

《慕尼黑协定》之后，斯洛伐克从捷克斯洛伐克中获得自治。但斯洛伐克过分依赖于纳粹德国，依据1939年3月23日签署的所谓“保护条约”，斯洛伐克的外交、军事和经济政策要服从于德意志帝国。条约的签订意味着斯洛伐克加入轴心国，并对波兰、苏联、英国和美国宣战。不过，当时除了与德国边境接壤的一小条地带外，斯洛伐克大部分地区没有德国占领军。

由德国纳粹支持的蒂索政府实际上是个傀儡，也就是说斯洛伐克是个“傀儡国家”，蒂索是位“傀儡总统”。二战初期，斯洛伐克

一开始还想保持中立，但是希特勒马上对蒂索政府施加压力。在压力下，蒂索解除了政府中温和派阁员的职务，加强了与纳粹德国的密切联系。德国纳粹则投桃报李，支持蒂索在斯洛伐克以“元首”自称。



▲傀儡总统蒂索与希特勒密谋驱犹行动

在蒂索的心中，犹太人在斯洛伐克社会中的地位过于强大，应该加以限制。1941年9月斯洛伐克通过的《犹太法典》，这时一部类似于《纽伦堡种族法》的法律，该法要求犹太人戴上黄色臂章，被禁止与其他种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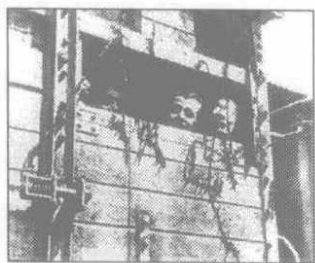
通婚、就业。1941年10月，斯洛伐克对其境内的9万犹太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党卫队开始攻击犹太人，1.5万犹太人被逐出布拉迪斯拉市，许多人被送往劳动营。

斯洛伐克和最终解决方案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意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而愿意驱逐犹太人的几个国家之一。1940年，斯洛伐克的排犹行动开始升级，同年4月犹太人的农场被迫关闭，犹太人的商贸公司被“雅利安化”。不久，斯洛伐克通过了一系列的排犹法律。为了帮助斯洛伐克执行那些法律，柏林派出两名顾问，一个是维斯里塞尼，他后来被调回柏林负责海外的驱逐犹太人活动；另一个是艾希曼。他们来到斯洛伐克之后，要求犹太人必须配戴大卫章，1万至1.5万名居住在布拉迪斯拉发的犹太人被驱逐。1941年10月，名为“东方安置行动”的驱逐指令发出，在此之前的7月，斯洛伐克的一些官员已经到上西里西亚的几个集中营、劳役营考察过了。第一批被驱逐的2万名犹太人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其余的犹太人大都死于索比堡集中营。

更加残忍的驱犹行动发生在1942年的3-10月。第一批是999名女孩，她们是被送到劳动营中去“劳动”。斯洛伐克的纳粹分子对此并不高兴，他们要求那些女孩要和她们的家庭一起驱逐，那样可以解决

他们留下的亲属为政府当局带来的麻烦。此外，整家驱逐还可减少驱逐者中途逃跑。为了逃避当局的迫害，1942年春，大约7000—800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逃往邻国匈牙利。在他们之中就有雨果、普鲁斯卡和他们的小女儿奥尔佳，他们的大女儿朱迪思已随第一批被驱逐的犹太人遣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



▲ 1944年，一辆满载着犹太人的火车驶往集中营

1943年1月，德国纳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遭受重创，盟军在意大利登陆，苏联红军已靠近喀尔巴阡山和罗马尼亚。但德国纳粹并没有停止他们的驱犹计划，艾希曼决定启动第二轮的驱逐行动，他派他的得力助手阿洛伊斯·布鲁诺到斯洛伐克亲自督战。布鲁诺计划将所有的斯洛伐克犹太人驱除出去。1944年初至1945年3月，十一批共11532名犹太人被遣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在他们之中有一位年轻的犹太姑娘——奥尔佳。

死亡行军

德国纳粹屠犹期间，尤其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随着集中营的解散，出于安置、转移囚犯的需要，纳粹多次组织在集中营中已被他们折磨得半死的囚犯进行死亡行军。死亡行军是囚犯在不堪忍受的条件下所做的长距离、强迫性的转移。囚犯们要以行军的速度前行，行进途中受到随行纳粹党卫军士兵的虐待，并常常遇害。“死亡行军”一词最初由纳粹集中营里的囚犯使用，后为研究纳粹屠犹的历史学家采用。

大部分死亡行军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1944年夏，由于同盟国从西面、苏联从东面发起进攻，德国纳粹开始认真清除集中营。首批清除的营地位于波兰东部、中部以及波罗的海诸国。

1944年冬到1945年，德国纳粹感到大势已去，遂开始解散波兰的集中营，强迫囚犯前往德国。犹太人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时常生活在可

能遇害的恐惧之中，因为德国纳粹不再需要他们劳动了。

1945年1月18日，奥斯威辛及其附属营的解散开始了。约6万名囚犯，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在那里被装进拥挤不堪的货运车厢，运往其他更西部的集中营，如罗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和毛特豪森。在那次特别的死亡行军中，至少有1.5万人死亡。

在整个1945年3月和4月，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纳粹从各营地逐一撤出，将70万集中营囚犯中的至少25万人被送上死亡行军之旅，其中犹太人占1/3。有些行军持续了数周，囚犯们常常步行一段路，然后挤进火车，挤进70人一节的车厢，那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在他们之中就有年轻的犹太姑娘——奥尔佳和她的母亲普鲁斯卡。

后记

这本书早已译好，由于我个人的疏忽，错过了在2005年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出版发行。2005年底，我索性将书稿改了一个书名——《一位大屠杀幸存少女的记忆》，放到一个叫“不错书屋”的网站上了。2006年3月，由于我调到中国邮政广告公司工作，工作一忙，出版的事情就搁置下来了。不知不觉中，本书译稿在我的办公桌里沉睡了4年多。不过，几年间，我所经历的两件事让我对这本书一直挂念着。

2008年12月的一天，我在因特网上搜索一条信息，无意之间发现一则有五位中国人在奥地利的纳粹集中营遇害的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二战期间有中国同胞在德国纳粹集中营中遇害。报道是这样写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修建于1938年，是德国纳粹在奥地利迫害犹太人、反法西斯人士及无辜平民的主要集中营。2002年11月毛特豪森集中营管理委员会在查阅集中营保存的资料时发现5名来自中国浙江、福建等地的遇难同胞。2003年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用中国政府拨发的专门款项制作了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镌刻着‘纪念在此集中营遇难的中国同胞’的中德文字样大理石碑。”

另一件事发生在2009年1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话后才知道是中央电视台《小



▲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在遇难同胞纪念碑前讲话

崔说事》栏目的编辑张明巍打来的。我与小张素昧平生，相互根本不认识。电话的大意是奥斯威辛解放65周年纪念日快要到了，他们的栏目准备在2009年举办一个纪念活动，对我几年前翻译的一本书《我的邮票生涯》中的主人公——马克斯的经历十分感兴趣，想通过我联系作者马克斯到北京做一期节目。

连续发生的两件事使我想到了手头还有一本书没有出版呢，感觉有些对不住本书作者奥尔佳老人。我突然想到应该到“不错书屋”网站看看网友们对本书的反应，打开一看，令我十分震惊，几年内居然有几千人阅读过这本书，很多人在留言中希望能尽快将此书出版。激动之余，我赶紧与本书作者奥尔佳老人联系，介绍了想在近期将此书在中国出版的设想。不久，老人回函说：“同意这一安排，愿以此书在中国出版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5周年！”收到老人的信后，我忙里偷闲带着书稿找到人民邮电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出版社的几位编辑看到译稿后，欣然同意在2010年1月出版，同时也提出一个要求，由我写一篇后记。

原本不想写什么“后记”，我以前出书写过的“后记”大都是无病呻吟，没什么实质内容，但在此书翻译过程中经历的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我想把它写出来，记在最后，权作“后记”了。

偶得这本书是2005年年初的事了，为了赶时间能让这本书尽快出版，我不得不加班加点，把2005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几个黄金周的假期也搭上了。全书的译文都写在一个大笔记本上，到了10月初这本书已基本成型，只要再加上一些译者注打印出来，就可以交给出版社了。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译出12万字左右的作品实属不易。我的感觉是翻译和种地一样艰辛——耕耘、播种、间苗、除草、呵护，汗里雨里才是果实，此书确系我心血之作。

2005年10月中旬，我到辽宁沈阳出差，临行前顺手将还没来得及打印的译稿塞到旅行包里，想利用出差的空隙对译稿进行修改。那时还没有动车组，我坐的是夕发朝至的快车。火车刚刚离开北京站，列

从
奥
斯
威
辛
集
中
营
到
澳
大
利
亚

车员就来到各车厢登记乘客的身份证号码。此时我正要准备睡觉，轮到登记我的身份证号码，我从行李包里掏出身份证交给了列车员。时间不长，列车员又回来了，他态度很客气，说要“劳您大驾”，请带着行李包到餐车谈点事情。

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睡意全无，只好拎着行李包跟着列车员来到了餐车。此时的餐车除列车长之外，还端坐着一位乘警，他神情专注，表情严肃。与乘警表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车长，他满脸堆笑，十分和气地对我说：“同志，对不住，刚才我们列车员在登记乘客的身份证号码时，发现您的包里有个大盒子，他向我做了汇报，实话实说，我们怀疑您携带了易燃易爆物品上车，要检查一下行李包，请您协助。”即使是实话实说，我也觉得可笑，但十二万分真诚地对列车长说：“我这个人爱喝茶，这是一个大茶叶盒。”列车长不置可否，只是双手一摊，对我笑了笑，画外音：还是要坚持检查。

面对那张笑脸，我无奈地把手中的行李包递过去。列车长把包里的东西倒出来，对里边的物品进行了认真检查，结果大家肯定能猜出来，没找到易燃易爆品。列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分客气地对我说：“对不起，打扰了。”我更加无奈，把倒出来的东西匆匆塞进包里，向他们苦笑了一下，返回车厢，睡觉去了。

令我郁闷的并不是这件事，排除疑点，配合列车员的工作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意想不到的，到了沈阳，竟然发现我的译稿不见了，回忆一下，肯定是在收拾行李包的过程中遗落在餐车里了。译稿丢了，那是我半年多的心血呀！我后悔不迭，捶胸顿足，怨自己粗心大意。可是于事无补，没有办法，只能自认倒霉。

出差回来后，我抱着“有枣没枣打一杆子”的心态给车组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如果捡到了我的译稿，请务必寄还于我。信是发出去了，可我对此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毕竟事过境迁，信能不能寄到列车组都是个问题，我只好听天由命了！

还真是万幸，两个月后的12月下旬，就在我准备重新翻译这本

书的时候，收到了沈阳列车段寄给我的包裹。我屏住呼吸，打开包裹，喜出望外，一看正是我丢失的笔记本。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眼前一亮的感觉。熟悉的笔记本使我强烈地感受到“劫后余生”的愉悦，突如其来的幸福使我全身千窍百孔都轻松自如地呼吸着。

包裹里面还附了一封列车长写给我的信。我不经意地拆开信封，可是读过信后，我的心在一股温暖的感动中流泪。请允许我把那封信抄录在这里：

高老师：

您好！请允许我这样称呼您。

我们在列车上只是一面之交，也请您原谅那天的唐突，不过没有办法，那是安全规定，相信您能理解。首先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铁道学院2000年毕业的一名大学生，现在沈阳铁路段工作。您的来信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收到了，真是对不起，您的译稿是餐车服务员在列车到站后打扫餐车时发现的，当时我就猜想是您遗失的，因无法联系您，只好由我保管起来。我知道这个笔记本对您很重要，在妥善保管之余总想和您联系上。

一天，闲来无事，我翻开笔记本，想从笔记本里发现您的个人或单位联系的信息，可是令我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我能联系您的线索。一翻开，看到密密麻麻的文字，才知道这是一本书的译稿。好奇心使我有兴趣读了下去，没读几页，就被主人公的命运深深吸引住了。我知道这是一本好书，一口气将它读完。

读了它，任谁都不会怀疑故事的真实。书中不仅有历史和时间、地点、背景的真实，还有细节的真实。那个年代生活的残酷、人生命运的苦难、德国纳粹之残暴，达到了那样的程度，让人们已经哭不出来了，没有眼泪可流了。人们只是庆幸，庆幸历史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已经告别或远离了那黑暗的日子。不过，那些苦难与残暴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世界各民族的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集体记忆，尽管它们已经淡出人们现实生活的视野。

作为本书的中国“第一位”读者（其实您应该是第一位读者），读过本书后，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压抑在胸口，想谈一下读后的感想。首先，主人公对生活独到的见解与追求、生命力超凡的韧性与顽强，她的乐观与豁达、她的观察与思考，她的文采与逻辑……不仅是对那不堪回首往事的追忆，更是对今世的震撼与启迪。家破人亡、九死一生之人，仍能直面过去，直面人生，笑迎未来，迸发出如此的生命力、创造力，在我来说，此前真是闻所未闻，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读这样的作品，是对心灵的净化、洗礼。

其次，主人公对生的渴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杀人如麻的集中营中，还是在灾难深重的“死亡行军”的路上，她从来没有放弃过求生的信念。她知道，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山穷未必水尽，逆水也可行舟，自己眼中的世间万象也许在瞬间就可以改变，内心所具备的那份执着就是力量。只要有信念，有坚强的意志，人求生的欲望就永远不会挫败。

再其次，是作者对待灾难的态度。灾难深化着主人公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她在书中除了谈论那些生存与死亡、命运与选择、希望与失望、勇气与恐惧等宏大主题外，那些富于波折的悲惨的故事也颇为引人入胜：她避过了集中营中的屠杀，忍受了纳粹党卫军没有人性的羞辱，熬过了“死亡行军”中饥寒的极限，战胜了疾病的折磨，经受了失去双亲和姐姐的痛苦，终于历经艰辛、九死一生地回到了家乡，为读者留住了一个又一个奥尔佳的瞬间。

第四，是主人公对生活的热爱。人生经历中的苦难，对于经历者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变得冷漠、自私、残忍，内心充满仇恨，也可以使一个人的心灵充满温暖和阳光，同情、善良，对他人充满关怀与热爱。奥尔佳的笔下之所以充满了生命和心灵的热力，就是她并没有在大灾大难中失去对于社会和人性的肯定，在直面悲剧的人生苦难时，并没有回避，甚至刻意维护了人性的善，人与人之间的关

怀与爱。本书描述的几位人物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主人公的母亲是传播了大爱，主人公的好友波兹娜的关爱是人性的闪现，那么主人公的丈夫约翰的爱就是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所以，本书既是一曲低沉哀婉的挽歌，又是一首暖意融融的爱的赞曲。

当然，令人怦然心动的还有书中那耐人寻味的思想火花的闪现，她的思想是生存挣扎的果实，是严冬绽放的花朵，是辛酸血泪的结晶，是冲破阴翳的音符，是一个生命灵魂中最深刻、最具震撼力的本质袒露。只有当自己的身心遭受巨大摧残时，才会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才会产生石破天惊、震撼他人心灵的思想火花。这颗博大、深沉而又朴实、单纯的心灵，真切地体现了人类最重要的思想本质，那就是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不是将来，不是过去，而是此时此刻。

此外，令人感动的还有悲怆的“库尔茨巴赫之歌”。面对失去自由的境况，囚犯们的眼睛不再是清澈如水般的明亮，而是浑浊灰暗的无神，在已经或将要遭遇的羞辱、饥饿、恐怖和杀戮之中，他们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们变得焦虑、不安和苦闷，精神几近崩溃，但他们知道获得自由的最好的办法是用承受来面对它。存在决定意识，面对无可逃避的厄运和灾难，就要有勇敢承受命运的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本书不仅是一部抗拒遗忘，以细节和人的命运方面补充和丰富正史的书，也是一部歌颂和肯定人性光明的书。它给当今人们留下的不只是痛苦和反省，还有灵魂的洗涤和提升。

无巧不成书，今年春节我和新婚妻子随旅行团到欧洲旅游，就参观过位于慕尼黑附近的达豪集中营故址。现在的达豪集中营故址，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原貌。集中营为长方形，四周有通电的铁丝网和壕沟环绕，每隔十几米就有一座高高的炮楼，上面装有探照灯和机关枪，日夜监视着全营的每个角落。

集中营分为3部分，中间是关押犯人的简易棚式营房，一端是管理处，管理处与营房之间是操场，那是每日点名和集体处罚犯人的地方，另一端是行刑焚尸院。犯人居住的棚式营房，是一种用厚木板钉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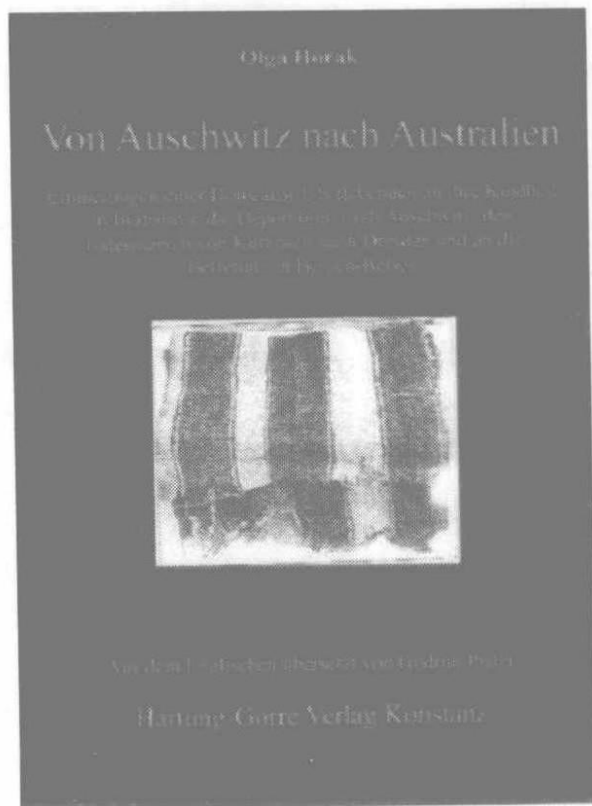
成的方框框，床铺分为3层，第三层几乎接近牢房顶的顶柱，空间十分狭小，只能爬着上床。床与床之间的距离仅可下脚，看上去就像一口口棺材搁在那里。

达豪集中营博物馆内仅有黑白两种色调，除展品外无任何装饰，给观众的感觉更加灰暗悲惨。一座简朴的纪念碑旁摆满了各国观众敬献的鲜花，碑文上写着：“悼念死者，警戒后世。”当参观者从那令人窒息、充满血腥与残暴的黑黝黝的集中营里走出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时，每个人的心中都回响着一个声音：决不能让法西斯的残暴的种族灭绝重演！看来亲身感受和没有感受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据讲解员介绍，德国电视二台和《世界报》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近半数的德国青年不了解二战期间纳粹残害犹太人的历史。德国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境内的大部分集中营都对外开放的原因。

中华民族的复兴呼唤历史教育的春天，唤醒我们民族的人文理想、提升我们民族的人文素养离不开历史教育，对于振兴历史教育我们责无旁贷。看到您的书稿，我为中国有人翻译介绍集中营及大屠杀方面的书籍而感到高兴。这本书不仅史记文化含量高，而且译得别致不俗，颇有文采。书乃好书，文亦妙文，捧读再三，不忍释手。

《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澳大利亚》一书同我少年时代读过的德国籍犹太姑娘所著的《安妮的日记》相比或许成不了经典，但确实是一部描写集中营及大屠杀难得一见的传记。向您提出一个



▲ 2007年本书德文版在德国发行

要求，您的书出版之后，祈望得到一本。

余不一一，顺颂安好！

看过信后，我被那位朋友超凡的认识和朴实的要求所感动。他对集中营、大屠杀和本书的认识远远超过了我这个译者，我深感白愧不如，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就是没看见他的名字出现在信封或信纸的任何角落。时间过去4年多了，虽然由于书稿丢失耽误了本书在2005年年底出版，错过了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的机会，但我一直在寻找机会让它与中国读者见面。尽管“丢书门”事件已经过去若干年了，可我始终没有忘记那位偶然相遇的列车长。他的长相由于我们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我已经记不住了，可他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我愿意借本书出版之机把那件事写出来，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后记。

高山

2009年11月16日

版权声明

Auschwitz to Australia—A Holocaust Survivor's Memoir by Olga Horak.

Authorized Simplified Chinese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Proprietor.

ISBN: 0 7318 0958 0

Copyright © Olga Horak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2000 by Kangaroo Press.

Printed in China by POSTS & TELECOM PRESS under arrangement with Olga Horak.

本书简体中文版和繁体中文版由Olga Horak授权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5LuO5aWl5pav5aiB6L6b6ZuG5Lit6JCl5Yiw5r6z5aSn5Yip5LqaiCDkulDkvY3nurPnsrnlpKflsaDmnYDlubjlrZjogIXnmoTorrDlv4ZfMTI1NDIxNjguemlw",
  "filename_decoded": "\u4ece\u5965\u65af\u5a01\u8f9b\u96c6\u4e2d\u8425\u5230\u6fb3\u5927\u5229\u4e9a\u4e00\u4f4d\u7eb3\u7cb9\u5927\u5c60\u6740\u5e78\u5b58\u8005\u7684\u8bb0\u5fc6_12542168.zip",
  "filesize": 31137398,
  "md5": "629fe538b9d41fd009391de035074ce2",
  "header_md5": "5e1a6002d9b839af2dd06f401383f2df",
  "sha1": "676ff8f814d01aa5008bde935c1e604372a25091",
  "sha256": "918d53d2981dd64468d22316d149075ff29b64205153aa9e541fd4dcae1255cb",
  "crc32": 564191255,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1033246,
  "pdg_dir_name": "\u2524\u2559\u2591\u252c\u2566\u2563\u2550\u25a0\u2568\u2534\u255d\u00bb\u2553\u2568\u2559\u00ac\u2561\u255c\u2591\u2500\u2524\u2264\u2514\u221a\u2564\u255f\u2565\u2557\u256c\u2557\u2500\u2554\u2524\u0393\u2524\u2264\u2550\u2514\u2554\u2592\u2568\u2565\u2524\u00b5\u2552\u2580\u2561\u2500\u255d\u255f\u2565\u03a3_12542168",
  "pdg_main_pages_found": 164,
  "pdg_main_pages_max": 164,
  "total_pages": 178,
  "total_pixels": 71932833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